



# 我不一樣的人生

| 黃崑巖◎著 |



成大 \*1904135\* 醫圖

幾年前我在台南機場遇到一位在台灣醫學界頗有名氣的人物，那時臺南與台北之間並沒有比飛機更快的交通工具，故在臺南機場遇到這位熟人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們倆早一步進入安全檢查後的候機室，所以便聊了起來。當話題轉到我們最近的主要工作時，我提到我正想著手寫自傳，他意外地說：「你寫自傳太早了一點，自傳通常是一生的最後一段旅程才寫的，你還沒有到那一段人生！」顯然我當時還沒有進入人生最後一段旅程。

其實，當時我沒有真正寫一本自傳的計畫，我想到我好友何曼德院士的父親何鳳山先生寫了一本他外交生活的回憶錄，光是外交生活他就寫了五十萬字。我不是什麼人物，自然不配寫類似的一本自傳，換句話說，我並沒有任何值得讓讀者學習的經歷。我早一點的時候，倒是覺得成大醫學中

心的創設有別人沒有的經歷，於是我就開始寫的回憶錄是創立成大醫學中心的經過。等我寫完這本回憶錄，出版商的一位朋友對我有率直的書評，他說：「你這一本回憶錄並不算回憶錄，是一本散文集而已。所謂回憶錄，是一生的回憶，是從家譜到人生最後一段旅程的記錄。」這句率直的話使我很氣餒，因為這本書裡記錄著只有我才有的經歷，書名也叫《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如果它不是一本回憶錄，那是什麼書呢？

但經驗是不會編出一片謊言的，那兩位總編輯的意見是寶貴的經驗累積下來的雋言，我很誠懇地接受。

最近看了日人福澤諭吉的自傳，也重讀了佛萊斯納（Abraham Flexner）的回憶錄，看了這些自傳後我有了新的領悟，對寫自傳的要領也有所得益。福澤諭吉在十九世紀就創設了慶應大學的前身慶應義塾，對明治維新時日本的富國強兵政策貢獻很大，現在在日本社會流通的一萬元紙鈔上面印的就是他的肖像。佛萊斯納是在二十世紀的早期，由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調查美國當時的醫學教育於十九世紀後葉及二十世紀初葉落後於歐洲的原因，結果他提出的解決方案一夜之間就把美國的醫學推上世界王國的地位，他的第一個改革是醫學院的考生要有一定的入學準備

（preparedness），也成為主張成立學士後醫學系的世界第一人。比起他們，我的生涯是平凡多了。

除了這些閱讀之外，我內人和女兒們也鼓勵我現在寫自傳並不算太早，經過她們的一番加油，我下了決心寫這自傳。開始寫的時候，第一件要素是先把骨架弄好，當我寫下要提的事情時，才發現我一生中遇到的奇談特別多，是值得寫的一生。

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林載爵先生來看我時，特別叮嚀要多寫一些日據時代的事，他說這是因為台灣的年輕人對日據時代的台灣很感興趣。我事前並沒有這種觀察，但如年輕人對日據時代的台灣有強烈的好奇心，一方面是因為日本的台灣殖民政策表面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則是台灣有一些call-in節目對這一點有特別渲染的直接效果。

我要提醒讀者諸君，日本在台灣的建設再成功，台灣的現代化再快，日本對整個台灣的治理原則還是殖民地政策，企圖將台灣建設成日本南進的基地。當然，在做這些建設當中，台灣受惠不少，但我們千萬不能忘掉，台灣還是在甲午戰爭後因為「馬關條約」而變成日本的一塊殖民地，就是受歌頌的後藤新平也是一個殖民者。這種眼光，在日人矢內原忠雄的書裡表現得很透徹。

我要強調我回成大的時候是我一生年華的顛峰，是成就最高的時候。那段時候的回憶，就如上

文所說，另有一本書可循。所以我在這一本自傳裡，就把這一段故事挑出，不再記述。如果讀者諸君對它有興趣，可參考《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

我寫這自傳，除了對家人的感謝之外，還要感謝我的人生典範、兄弟姊妹、朋友們，其中特別對我的成長有所貢獻的是楊憲桂、陳克孝、張步良，以及最近兩年對我的理論打開了一扇門的彭榮次先生。彭先生提升了我對政治的看法，他有犀利的政治眼光，在政界的面識廣闊，分析事情有他的條理，是一個學習的好對象。因為他，我一生的最後一段有了不同的面貌。其他，有數不清的朋友塑造了我的生涯，我也在此一併致謝。

## 序

### 第一部 兒時憶事

1 家庭教育……

2 就讀日本小學……

3 轟炸帶來的一段奇緣……

4 戰爭下的童年……

5	二戰結束.....
6	新竹中學.....
7	學習，沒有國界.....
8	人生典範.....
9	二二八事件.....

## 第一部 醫學之路

10	踏入醫界.....
11	醫預科的口子.....
12	萌生放棄的念頭.....
13	軍訓預官第八期.....
14	第一個離開外科的人.....
15	初抵美國.....

16	成爲美國公務員.....
17	喬大任教.....
18	入黑名單之列.....
19	訪問中國大陸.....
20	台大醫學院院長.....
21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22	與網球結下不解之緣.....
23	蒙塔尼耶教授.....
24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 第二部 教職與學界發展

246	241	225	222	214	204	192	187	172	159	143	130	120	115	105	096	089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0	127	112	105	054	044	036
國家衛生研究院.....	文樹德與哈利·溫斯頓.....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蒙塔尼耶教授.....	與網球結下不解之緣.....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台大醫學院院長.....	訪問中國大陸.....	入黑名單之列.....	喬大任教.....	成爲美國公務員.....	初抵美國.....	第一個離開外科的人.....	軍訓預官第八期.....	萌生放棄的念頭.....	醫預科的口子.....	踏入醫界.....	二戰結束.....



# 第一部 兒時憶事

黃崑巖自傳

第四部 與寫作結緣	256
參考書目	289
結語	281
30 談教養	277
29 開始寫作	273
28 龍應台與陳之藩	271



筆者父親。

我的父親叫做黃亨吉，是只受過小學程度（日據時代叫國語學校）教育的公務員。但他一口流利的日語是否只靠國語學校訓練的，始終是一個謎，因為他的日語講得太好了。他出生於現在的苗栗縣後龍鄉南龍里，俗稱石堤腳的地方，日本政府的住址是新竹州竹南郡後龍庄後龍字後龍三三百廿八番地，可能應該位於現在的北龍里。後龍雖然在苗栗

縣，但屬於海線的後龍、通宵等地都是道地的閩南人，所以我們不講客家話。這證明了過去移民的辛酸史，客家的少數民族因為較晚到台灣，好的耕地被先到的閩南人佔有，他們只能到閩南人尚未佔據的地方。因此，苗栗縣的

海岸線是閩南族群，少數民族客家人只能到山中的苗栗、銅鑼、三義一帶。

雖然父親自己沒有受過像樣的教育，但對白我的要求嚴謹，對子女的教育也很積極，庭訓甚嚴，而家人之間相處頗為嚴肅，較少大夥兒開玩笑取樂的場面。他寫一手很漂亮的毛筆字，家譜上的毛筆字都是真跡，是一件他留下來給後世很好的見證。家父不但精通三種語言，而且吟詩、漢學樣樣都稱得上是名列前茅。我懂事時，他是日本警察組織的基層翻譯，負責將台語口供譯成日文，方便日本警察辦案，但這也給他利用職權袒護無辜同胞的機會。那時的社會治安特別好，像現在媒體每日充滿社會案件的情況並未見過，也沒有聽我的兄弟姊妹或雙親提過這類社會新聞。

父親最偉大的地方是不管公私，行為表裡一致，這類公務員現在已頗為少見，有人對這一點甚至覺得他有點固執。我常常聽到父親下班回家後，發現不知情的母親收下不明來歷的涉案人帶來的物品因而發脾氣。他會馬上又帶著東西，哪怕是活雞也好，或盒裝的禮物也好，三更半夜就送回饋贈名家裡。

父親對微薄的收入似乎很在意，每天晚上都要整理，記錄家裡當日的支出以及餘額，而且是鎰銖必較，每一分錢都要弄個水落石出。為了這事，父親有他的一本簿子。我知道母親對這事很不重視，甚至感到很厭煩。可能是這種性格遺傳到我自己的女兒，我長女岫清曾告訴我她美國支票的餘額從未差過分文。

我的祖父叫黃文珍，是小小的地主，但我不认识他，因為他很早就辭世了，他所擁有的那一塊小土地也在三七五減租時變得很不值錢。倒是我八十幾歲的祖母，雖然裹足但有挺拔的身材，只記得她最後仙逝時患了有腹水的病。

我父親有一位兄長，叫黃元吉，記得他也是一位嚴肅少言的人，就像他的弟弟。他有兩房太太且兒女成群，二房所生的長子名黃炳耀，是我伯父衆多的子女中有最成功生涯的人，不但念了新竹中學（那時念竹中就像從台灣到東京念第一高級學校一樣難），後來還赴日習醫於昭和醫專，二次大戰結束後落腳左營，成為開業醫生，開了一診所叫「德安醫院」。但他成功的影子下有家父的幫忙。因為他家住後龍，上竹中（新竹中學的簡稱）要住在新竹比較方便，這時父親就毫不遲



德安醫院。



筆者母親。



楊連青先生，筆者母親的兄長。

疑地收容他住在我家。黃炳耀與我大哥同歲，這兩巨頭住在一起引起了很多無謂的爭執，俗語也說一山不容二虎，倆人的不合一直到家父辭世為止。他們的不合表現在很多方面，譬如說，我大哥有晚上早一點上床，清晨起床念書的習慣，所以他會調好鬧鐘來叫自己起床。但炳耀兄就故意把這鬧鐘按掉，打亂我大哥的時間調整，由這類小事即可看出他倆人的不合。

我出生在新竹，未在後龍出生，也未在後龍住過，但我常常到伯父在後龍的家。那是一個寬敞的家，伯父以交易鰻魚為生。我不喜歡到後龍只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的名字用日語發音猶如用台語在說「這柚子好吃」，每回後龍時，大伯的兒女們總喜歡以此取笑我，使我心裡有點毛毛的，覺得裏足不

前。我只記得當時的後龍溪水清澈見底，是我們常去玩水的地方。

我的母親是未受任何教育的女性，她出身於後龍附近本名大庄的鄉鎮裡的楊家。她的哥哥名楊連青，是日本的文官，為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因此在附近很吃得開。母親雖然耐性稍差，但生性溫和，是一位好母親。她給我最重要的建言是：瞭解一位人士，知道對方的品性與性格就好，不必太爭，一切就會顯得可以容忍，她特別舉的例子就是三哥。她雖沒受過任何教育，但知道勤儉是美德，也在生活中落實這個理念。

## 老公的榜樣

母親一共生了九位子女，有一男童夭折，所以實際上只剩八位，我排行老公。老公有老公的好處與壞處，但不管如何，老公負擔著上面所有子女們未實現的父母的美夢，這些夢想最後都落在老公的肩上，老公的責任從這一點來看是很大的。而且，這責任隨時會變，要全看上面的子女怎樣決定前途而定。

大姊大我十四歲，名叫黃錦鑾。在童年的記憶裡大姊是一位美人位後來嫁給

蔡嵩濤的男

士。她一心想要一個小孩，於是平找了鄰近的新竹省立醫院婦產科的日本醫師看診，想知道結婚多年未能懷孕的原因。醫師後來找出她有所謂的子宮後屈症，這種病名現在已經不用了，它也不算是一種病，但在當時的日本卻是很流行的一個病名。開刀矯正之後，因為順開刀之便割除闌尾，而在無抗生素之環境下併發敗血症往生。記得大姊過世的那幾天，母親為此事傷心得死去活來，整個人都變了樣子。姊夫蔡先生在我姊姊辭世後，遠渡廈門另找維生機會，而且在那裡娶了一位名叫玉梅的女子，我們兩家至今還有往來。



二姊黃錦鑾。

我二姊名黃錦鑾，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但小學後卻靠著自學而成功。她就像我們家裡所有人一樣，寫得一手好字，而且看的雜誌與書籍程度都很高。因為她點子特別多，只要參加團體旅遊，每每都無意中當起領導者之一。

她從還在童年的我看來，是高攀不上的存在。

她對我們兄弟姊妹們教育與成長有長遠的影響，因為父親子女多，而且整日身繫上班處所而不能脫身，只有她能代表父親，也彌補未受過完整教育的母親，為我們一家出席家長會。因為她，我們家才上得了台面，比得上別人。她從新竹嫁到台北後還經常從台北南下新竹，等我們兄弟長大成年之後，這擔子才從她肩上卸下。

我對三姊的記憶不多，只記得她名叫黃錦蓮。因為她在年少就因母親連生了三個女孩，三姊就由祖母作主過戶給後龍蔡家。其實蔡家對她是不錯的，但不幸的是她到蔡家後據稱因為跌倒，脊椎骨折變形而引起嚴重的駝背，從此上半身變短，個子顯得很矮，呈現身障者的形象。

大哥名叫黃崑耀，是弟弟們的典範人物，在我們這一群未成年的弟弟們來看是一位完人。他畢業於聞名全島的新竹中學，我們弟妹們也很尊敬他。中學畢業之後，父親向台灣銀行舉債送他到河南的高等工業學校（現在成功大學的前身），在該校電機系念書。據他的口述，他陪著台灣銀行負責貸款的日本人去看我們家裡提供抵押的土地時，這位日本人一邊走一邊問我哥哥舉債的用途，當他知道舉債是我父親要用來當學費時，他就說：「這筆債成交了！」而抵押的土地也隨便看看就結束。可惜大哥雖然念完成大，但畢業時染上了肺結核而讓就職晚了二年左右，後來找到新竹中學

的數學教職，勉強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很多當時的高工校友，如楊金欖等人都有順利的工作生涯，他卻在家養病，這使他忐忑不安。

我還記得有一段時期，只要他在家，就會每天看報紙上連載的日人吉川英治所寫的《三國誌》。《三國誌》是西元三年的事，小小的我，坐在哥哥及鄰居的孩子們之間，領教大哥侃侃而談劉備、孔明、關羽、張飛、曹操、趙雲等人的大眾化故事，是深入我們腦海裡的記憶之一。如此這般，大哥對我們的影響不亞於二姊，而且是替弟妹們把外界的知識與資訊注入我們腦子裡的一扇窗，幫助弟妹們加速開化的動力。

大哥下來是我的四姊黃錦梅，她是嚴肅的家庭訓練裡長大的唯一樂觀者。她的交遊很廣，記憶力超人，遇到事情，有她大事化小事的本領，故能經常保持愉快的心情，這一點，比起我好多了。她也是家裡女生當中唯一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在那封建的中日混合社會裡，以一

個女性能在教育領域上走到這個地步，是難能可貴的事，也顯得我父母親以及二姊的眼光之遠。這也彰顯祖母在家裡的影響力，四姊長大時，祖母已經辭世，她重男輕女的影響力在我家裡就日漸式微，因此四姊就沒有重蹈二姊的命運。她也像自學的二姊一樣寫得一手好字，使我羨慕不已。

二哥黃崑河是小學老師，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在新竹南門的新興國小執教鞭多年。新興國小也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東門國小所轉念的學校。

三哥名叫黃崑煌，是一個天才。我有一個新竹中學的朋友名叫周宜旋，他曾跟我說：「你在



與姊姊、哥哥、嫂嫂合照，中間抱小孩者為四姊黃錦梅。



大哥黃崑耀。



三哥黃崑璽。

新竹中學時的表現是秀才，但你哥哥黃崑璽是天才！」

這是我第一次聽別人說天才與秀才的差別。三哥大我

兩歲，生於一九三一年，他在新竹中學時樣樣都好，

功課、繪畫、游泳、田徑……什麼都是全校第一或第

二，替竹中創下不少的紀錄。讀者由此可以瞭解我繼

大哥之後有什麼樣的兄長做典範。

本來我們的家人都希望三哥能學醫，而他似乎也這樣下了決心，只是沒有坦承地說出口而已。但不知怎地，在大約高二那時，他改變了決心，決定學經濟並貢獻於台灣社會。從此他在私底下所看的書籍愈來愈左傾，包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記得在白色恐怖風聲鶴唳的一天，我父親決心把我三哥所看的書統統在後院裡焚毀了事，我也目擊了這些書變成灰燼。從此三哥看的書經常引起父親的操心。後來三哥考入了台大經濟系，畢業後在華南銀行數鈔票時，他這才覺醒，當時考經濟系的美夢完全幻滅；他瞭解到救這個社會也要有適當的人脈與裙帶關係，經濟系裡所說的理論的確與數鈔票沒有直接的關係，這些鈔票有的還是殺豬的屠宰業者送來，鈔票上還沾著肉屑呢！

希望幻滅的三哥後來萌生了赴日留學的念頭，那時我已經在台大醫學系，他常到我的學生宿舍找我談這事。他結婚不久之後，決定赴日本念早稻田大學的經濟系，並同時在附近知名的千葉大學學醫。早稻田大學念了一年之後，就考入東京大學研究所（日人稱大學院）。那時國內有法律規定，在國內學哪一行，出國就只能學那行，所以三哥才想到這種複雜的迂迴操作。奈何這種迂迴操作為日本政府所發覺，因為日本政府有規定，留學生在日本不能有兩個學籍，逼得三哥在東京學完醫學之後，非得立即離開日本不可，那時我已在美國，他畢業後能立即到美國是我協助辦理的。這也就是三哥雖學醫出身，又是東大畢業，但未能在台灣醫界成名的原因。他現在是一位精神科的醫師，退休之後已回日本。他的記性超人，比起我四姊更好過幾倍，看書奇快，是別人所不及的，而且他的長處是各國文化的浸淫頗深。

身為老公的我呢？老公的角色很容易扮演，我很早就知道老公要能模仿家裡的長輩，而且要有幽默感。至於前者，我早就學了一手好字，我雖不像三哥是天才型的人，但也多少有繪畫的天分、創新的技能。童年的幼稚、與母親以及二姊的關係，都是值得回憶的事情。

我還記得第一次體會到自己不及三哥聰明的打擊。上文說過，我三哥是表現型的優等生，他念

的是日本人念的學校——新竹小學（現在的東門國小）所附設的幼稚園。我到了學齡之後，被二姊帶著去新竹小學考該校的幼稚園，考後滿心以為我可以像三哥一樣順利進入幼稚園，考試以後的幾天，我每天都在窗邊等著郵差送來入學的通知，但這通知卻遲遲不來，最後終於寄到的並非入學證，而是不錄取的通告。學校當局以人數過多為由，判我幼稚園落第，但倒是保證小學一年級的入學權益。這使我相當失望，好在還有一年級的入學保證當靠山，不然的話只好去念據稱程度比較差的小學了。就如此這般，一年後，我以新生的身分進入新竹小學就讀。

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歲時，當時還是所謂的日據時代，我念的是本來為日本人所設立的小學校，所以對鄰居日本人的動向很熟悉。日本人把小學分成日人子弟念的所謂小學校，以及台灣當地的台灣子弟念的所謂公學校。但日本人當時是和台灣人雜居的，我們的鄰居日本人也蠻多的。公學校畢業不見得就能成為人才，但小學校與公學校程度顯然有些差距。三哥在日期間曾前赴日本國會參觀已經解密的秘密文件，這些文件裡把在台灣的教育政策寫得有所保留或一文不值，有名的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局長後藤新平骨子裡也是如此。這些殖民態度，台灣一些討論日本時代殖民話題的call-in節目都忽略了，變得反而有點歌頌日本殖民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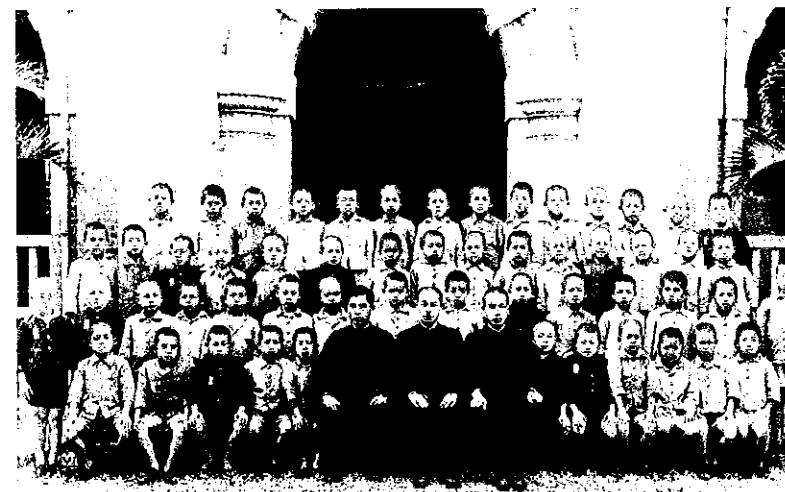
我在新竹小學的表現意外的好，全班約五十個人，台灣人只有五、六個，但競爭就學生的立場

來看是公平的，不因身爲台灣人而受歧視。那時的新竹小學都是木造的，我只能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該校有教室及大禮堂，更有校園及兩百公尺的運動場、相撲場（日人叫土俵）、擺放明治天皇所頒的教育刺語（語錄）的房間，後來還添加了游泳池。據稱幾年前去世的昭和天皇（裕仁）在他還是太子時曾經來台訪問蒞校參觀，是新竹小學的一大光榮，在新竹小學的歷史上寫下很重要的一筆。想不到這一位天皇後來成爲日本軍國主義的魁首。

我大概很早就以寫字很美而有名，小學二年級時，有一次班導師因病請假而該課變成自習，自習一定會有寫在黑板上的白習工作，我就受命寫這些工作在黑板上給全班同學看。以後有人需要找人

在黑板寫字，我一定是被找的人。又記得我每年夏天一定參加習字會，所謂習字會是學校請一位日本有名的書法家來教學生寫書法，每一年都是同樣那一位。在大禮堂裡幾百個人靜坐寫老師教我們寫的字，因爲人多難教，這位老師寫字都是喊口號的，他把每個字都分解成幾個筆畫來教，而且大聲喊：「一、二、三——四、五」，下面就照著他的指示一筆畫一筆畫地寫。現在回想起，這些夏天的習字會對我的書法有著很大的影響。

我也特別喜歡劍道，並不是嚮往武士道，而是喜歡劍道訓練的紀律鍛鍊，這種功夫在李登輝寫的《武士道解題》一書中有所敘述。爲了加入劍道社，早上還得四點鐘就到學校換制服，那制服與成



日本小學校三年級的全班合照，後排左邊數來第四個為筆者。



日本小學校二年級的全班合照，筆者站於左上角高峰上。

人的制服一模一樣，只是小很多，看起來很可愛。換了劍道制服以後，大夥都要以日本跪坐方式靜坐二十分鐘，然後穿上面具與腹部的保護用具，靜待自己的名字被呼喚上賽場，在衆目睽睽之下與對手比武術，並受指導員之指示與教導。我每日都在期盼著練習日的來臨，因為它是我愛好的運動之一。

當然人人幾乎都有膽怯的缺點，我不像三哥，他會樣樣都做得好，膽怯這個字在他字典裡似乎找不到。我小學時最怕的是水，所以游泳池是我的最恨，每次體育課都找藉口躲開，在新竹小學四年多，從來沒有與同學游過水，學游泳是到了新竹中學以後的事。我念小學時體罰也很盛行，但似乎限於罰站、摑巴掌而已。有一次，我經過教員辦公室的走廊，邊走邊吹口哨，吹的是日本的軍歌，結果有一個姓草野的老師叫住了我，說：「別吹口哨的命令聽見了嗎？」我說沒有，結果兩個巴掌像雨一般地落下來，使我覺得很慚愧。

日本的各級學校、尤其是小學，最有名而殘酷的是學生在校欺壓同學，欺壓的壓力來自集體，往往是由少數人選定對象欺壓，很多人就跟著這一黨人走。這種欺壓日語叫做「いじめ」，而英文叫『bullying』。這使被欺壓的學生對上學怯步，嚴重的還會導致自殺，是造成日本自殺率居高不下的一大因素。當時，欺壓在新竹小學並不是問題，我也沒有被欺壓的經驗，但就因為有一些學生見我是台灣人，讓我在四年之中有一、兩次無緣無故被打的經驗。其中有 一位很難纏的學生叫內田巖，他之前還出席在日本舉行的同學會，我從未提起他曾經無緣無故打我幾拳的事，而他似乎早已忘了。我不拿手的運動就是相撲，如果我是相撲的能手，內田可能也不會找我麻煩。

我們的小學同學會一年一次在日本舉行，地點每年更換，但都是溫泉旅館，參加的同學幾乎都是日本人。有一次一群人到九州指宿一家叫「白水館」的旅館，指宿是一個地名，幾乎位於九州的南端。我們一夥兒第二天坐了專車參觀位於知覽地區附近的神風特攻隊基地，日本軍方之所以會選知覽為神風隊的基地，顯然是因為它近沖繩的緣故，是二次大戰最後困獸掙扎的象徵。神風特攻隊的隊員都是不甘願而死的，最近這真相由東京都市長石原慎太郎拍成電影，還聽說相當賣座，對此我很難理解。

我及三哥從來沒有因為功課而麻煩了父親及兄姊，每天努力地學習作息，早上一大早就起來念書充實自己。懂事以後，父母親擔心的事沒有別的，好像只有要我們早一點上床休息。這一段時候，日軍在中國大陸的為非作歹，台灣根本無從獲得消息，因位在台灣的日本人一般都是台灣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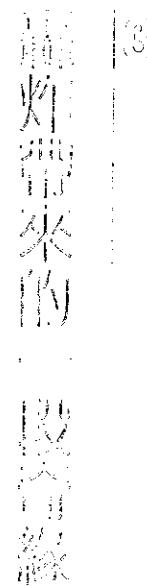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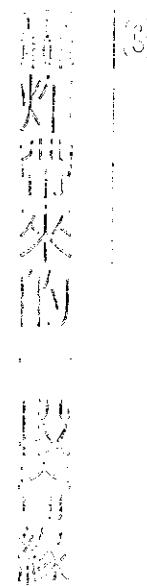
我回成大之後，有一次李國鼎先生被邀來成大醫學中心在該期畢業生典禮上致辭。節目中有一項是畢業校友贈送紀念品給母校，李先生因而知道我的毛筆字有特別的風格，因為該期畢業生所送母校的紀念品是我講的、我寫的話的複製品。等他回台北之後過了一個多禮拜，寄來了右圖的一首詩，是他的朋友在他退休時描述他一生而寫的。李先生要我以毛筆寫下這首詩，然後好讓他收藏。後來我發現他把它掛在他辦公室的入口，可見他對我寫的字的珍視。現收藏在他的遺物中。

名成身未老立言得上道靜者意有餘  
富貴非所好君夷舊相識功業玉山顯  
同年廿六人惟君申懷抱力侔少社稷  
復漢仗師保海外小蓬萊十年歲豐饒  
萬竟中興功神賜恤恆春草三傑君獨健  
天下為君詩

國公策政雅屬壬申年夏晚黃亮巖書

人曾於一九八〇年代拜訪過她。金澤有一大學，地處於日本的能登半島，是文化水準很高的地區，前陣子因為地震的關係受了一點損失。

好鄰居，駐紮在台灣的日本軍隊紀律也很好。我記得有一戶姓櫻谷的一家對我們如自己親人，還有一家叫森本的，一九四五年回到日本之後在面向日本海的金澤附近開了一家溫泉旅店，我與內



父親每天早上照常起床，配合收音機做早操已成了習慣，當時這成為他們的全民運動之一，以收音機體操著稱。一九四一年有一天，父親照樣早起做收音機體操，突然收音機的音樂停了而有以下的重要插播：「日軍於十二月八日，當地時間十二月七日，與美軍進入戰鬥狀態。」就這幾句話，台灣也捲入了因珍珠港事件而掀起的二次大戰。

戰爭的氣氛沒有馬上瀰漫到台灣，因為戰爭一開始，盟軍措手不及，日軍處處傳捷，是二次大戰時日本的蜜月期。日本在北方領土、南太平洋各地、菲律賓、香港以及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皆勢如破竹，都有斬獲。當時鞋子是一種奢侈品，記得新加坡被日軍攻陷時每人就發了一雙橡皮鞋子，又日本的潛艇成功地擊沈美軍的列克辛頓號（Lexington）航空母艦時，我們都放了一天假，這都是

當學生的我們所歡迎的決定。但不久，日本海陸軍的補給線變得過長，美國重整軍力並在南太平洋諸島採取了跳島戰術的反攻，使得日軍無法阻擋。這種反攻，讓台灣開始也有了盟軍的「照顧」，最早受災的是故鄉的新竹。但偶爾盟軍的空襲也會留下以下的插曲，就因為新竹被炸，我與白修德(Theodore White)搭上了書信來往的奇遇。

那時我才九歲，那是一個陰霾濕冷的十一月風城新竹之晨，我因小時的關節宿疾發作請假在家，正想翻書閱讀，突聞遠處爆炸聲四起，我立即把書闔上全神傾聽，爆炸聲裡摻雜著飛機俯衝與爬高時的引擎聲，這如果不是日軍的實彈演習，分明是一個更嚴重的事態。我央求恰好回來娘家的二姊扶我出去，站在舊日新竹醫院旁的馬路，那裡已有一群表情肅穆、面顯焦慮的路人正引頸往西觀望。原來從市區往西幾公里、位於海邊的機場是日本軍用的，約莫在機場的地點正有幾團黑煙湧向天空，黑煙與白雲之間則有好幾架飛機穿梭盤旋，看似忙於搜尋地上獵物的鷹群，其中有幾架機體極具特徵的美軍洛克休P-38戰鬥攔截機。男生比起女生對軍機武器的好奇心本來就要來得強烈，我雖不算精通，卻能判斷這是美軍來襲，拉著二姊連跑帶滾地跑回家裡。轟炸的消息雖然被全面封鎖，但市井流言盛傳日本軍機皆來不及升空應戰，泰半被炸毀在地上。時一九四三年，只是我不記

得那是該月的何日。司馬遼太郎在他的《台灣紀行》中提到，據他考據，盟軍飛機第一次來襲台灣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轟炸新營的一次，這實為一錯誤。

童年易逝，不少記憶也逐漸朦朧，但那陰冷的早晨風城被炸的記憶，卻總是異常明晰。可能是一份畸異的傲情在做祟，認為僅有幾萬人口的故鄉，居然會被美軍青睞成為台灣第一個轟炸目標，其中必有值得驕傲的緣由。但一九七九年白修德的一本巨著《歷史的追尋》(*In Search of History*)問世，卻為新竹的奇襲提供了幕後的真相。白修德是有名的新聞工作者、歷史家、作家，他是「一九一五年生於波士頓的猶太人，學東方歷史於哈佛，畢業時已能操華語。一九三八年間開始其世界之旅，次年四月十日抵達了當時的抗日首都重慶，愛上那裡每日上演的抗日大後方以及國共暗鬥的政治史劇，落腳一留就是六年；期間為維生計成為《時代周刊》的報導員，直到日軍投降。戰後寫了處女作《中國的暴風雨》(*Thunder Out of China*)一書預告共黨革命的來臨，也因此舉成名，後來每次的總統大選記幾乎都是他的傑作。一九七九年這本巨著《歷史的追尋》可算是他的自傳，白修德在書裡以兩頁篇幅詳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群飛虎隊隊員在昆明獲得情報，指稱海岸近在咫尺的新竹日軍機場有準備轉進南太平洋的四十架轟炸機及六十架戰鬥機。對門志高昂的飛虎隊

隊員來說，這是讓人垂涎的獵物，他們等不及上級命令，要求提早吃完感恩節大餐，於感恩節的二十五日清晨調度幾架P-38及B-25低空掠越台灣海峽奇襲新竹。白修德恭逢其事，成了報導那次作戰的記者。

我九歲時根本不懂何謂感恩節，負笈北美才知是每年十一月的第四個週四，等我念完白修德的這本書，一下子空襲的記憶幾乎成了全新拷貝，有了正確日期配上，在我腦際重映，益顯得生動。他兩頁篇幅鉅細靡遺地記述從空中鳥瞰的轟炸經過，和在我地上所見的互相印證，更是帶給我拼圖遊戲終於完成的喜悅與震撼，甚至彷彿我感受到白修德坐在正俯衝而下的機艙裡的真實感。我不是一個麻木到對這種「奇遇」會毫無感觸的人，試想，一個當時的清靜新竹小市，被載有聞名四海的歷史家的飛機轟炸，而九歲的我竟然有幸在地上觀賞了大半過程，這事豈可不寫封信和白修德談個明白可以了事？但每日忙碌，又怕如收不到白修德的回音會帶來受不了的挫折，在躊躇之間只得任憑時光不斷流去。

不意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與哈佛的史華慈教授在上海錦江飯店邂逅，為我與白修德魚雁帶來了玄機。那是我結束在上海第一醫學院（現改名為上海醫科大學，併入復旦大學）講學一個月

啓程返美的前一天，那天早上我想吃早餐，前往飯廳卻發現已經客滿，只剩下有一對洋人老夫婦正在進餐的大桌可以同席，我只好接受了建議。就座後我自我介紹寒暄，老先生則說他是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史華慈是哈佛漢學家泰斗教授，著有《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的興起》等成名作，於一九八七年曾應邀來台。史華慈當時正在講學旅行途中，來到上海住在錦江，和我謀面是極為偶然的事。他既是猶太人，又來自波士頓，我就問他認不認識白修德，他答曰：「當然，他是我的好友。」我趕忙把童年故事約略描述，並說我準備去函白修德。為提高能收到回信的可能，我問他可否在信中提及我在上海和他有過面識。史華慈對我的故事稱奇之餘，滿口答應並對我鼓勵有加。

於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去函紐約出版商轉白修德一封私函，寄出前還請擅長寫作的長女看了一遍，長女認為那是很動人心弦的一封書翰。裡面除了摘述事情始末之外，強調這一樁事對我來說是人生一大奇遇，我深信他和我倆人的人生旅途，明明是在新竹上空與地上之間擦身而過幾乎交集了。我說，這感受之深我如不予以抒盡，有違我個人珍重際遇的人生哲理。

屏息以待兩週過去，白修德的回信來了，他同意這是少見的奇緣。他說當天奇襲，本來預計會

有半數人機回不了基地，結果卻是突襲成功全員安返，連在地上觀賞的九歲的我也安然無恙並已成了華府喬大的教授，猶如傳奇。當他們返回基地後覺得整個過程既刺激又好玩，但他說：「這就是戰爭的問題所在，生存者慶生，而受害者呻吟。」信末並說他下次來華府將會找我痛飲，害得我立即急告我的地址與電話。但這夢終未成真，他於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悄然逝世。

我素來喜歡寫信，卻從未夢想過有一天會以寫作為樂，所以當時與這位聞名的作家有書翰來往，已夠使我躊躇滿志，他的信自然也就成了我們的家寶。我把我的原函及他的覆函影印本裱框展示在我華府喬大、台灣成大院長室以及現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辦公室牆上，許多好奇的外賓仔細看過後都不停稱奇，不少外國女賓讀後還會感動得流淚。一九九一年我尚是成大醫學院院長時，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來了一位史教授 (Jack Spengler)，他讀後以嚴肅的表情問我要兩函的影本帶回波士頓。原來史教授的父親有一好友是白修德的弟弟，名叫羅伯·懷特 (Robert White) 要把這影本寄給他。史教授回美約莫是一月，當年十二月，我從懷特博士那裡收到了一封措辭溫馨的私函，這才發現他是美國工程學術院院長，等於是工程學域的中央研究院院長。信函內容大致說他正在蒐集哥哥白修德生前的書信，將彙集成書，我的兩封信是錦上添花，並且說：「史教授的父親是我的

朋友，曾擔任美國氣象學學會執行長長達四十年。史教授遠到台灣的台南，在您的辦公室碰巧拜讀了您為五十年前的一件事寫給家兄的十年前的老信，事情終於牽到我身上，這不是人間奇緣奇事而是什麼？」當我唸完這封信，眼前不禁一片模糊，未知淚水弄濕了信紙。

我當然也認為這是難以置信的傳奇性佚事，我已經在四個不同的地方以「豐潤生活的小點滴」為題把這事向不少聽眾講演。但說實話 我心裡不覺得這是小點滴，小點滴才不會引起延綿數十年還蕩漾在生活的這些漣漪。如果不熱愛生活，不珍惜經歷，或不屑與別人分享感觸，這種漣漪怎能蕩得起？再說，沒有這種漣漪，生命對我來說會像是一灘死水 不會有閃爍的光彩，也不會是一幅活潑的動畫。

類似白修德的轟炸故事，後來在新竹重演不輟。有一次我的書法在新竹州比賽中脫穎而出，獲了獎，定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明治天皇的誕辰頒獎，地點在新竹州政府新竹市的圖書館。明治天皇的生日現在在日本叫文化節，是一個大節日。當時在典禮開始時突然空襲警報大作，新竹市陷入空防規定的程序裡，而我們這些小學生都爬入圖書館的桌子底下避險，心裡直覺好玩呢！

這樣的事愈來愈頻繁，表示新竹市也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們於是跟別人一樣疏散到比較安全的鄉下去。這種動作當時的政府命名為「疏開」，也就是疏散，這是必要的一個動作，為的是家人的安全。那時美軍的轟炸已經成了上班時刻的例行公事，早上八點鐘就有美軍的轟炸機光顧，這樣的事愈來愈頻繁，表示新竹市也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們於是跟別人一樣疏散到比較安全的鄉下去。這種動作當時的政府命名為「疏開」，也就是疏散，這是必要的一個動作，為的是家人的安全。那時美軍的轟炸已經成了上班時刻的例行公事，早上八點鐘就有美軍的轟炸機光顧，這樣的事愈來愈頻繁，表示新竹市也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們於是跟別人一樣疏散到比較安全的鄉下去。這種動作當時的政府命名為「疏開」，也就是疏散，這是必要的一個動作，為的是家人的安全。那時美軍的轟炸已經成了上班時刻的例行公事，早上八點鐘就有美軍的轟炸機光顧，

下午五點鐘就全部下班飛走。這種現象在所謂的美軍機動部隊（Task Force）「來訪」駐紮花蓮外海時尤其明顯。這時上班的轟炸是連續不斷的三、四天，有時還更久，全看該機動部隊的補給夠不夠支撐來決定。弄得我們上學不像上學，因為上學後被空襲打斷的機會蠻大的。

父親因為經常利用職權暗中幫助台灣同胞，因此到處都有準備拔刀相助的鄉親們，也就不難找到願意接受我們一家的鄉佬。我們找到的是當時在芎林當甲長的陳家（甲是居民的最小單位，所以甲長等於現在的鄰長）。現在的芎林是一片現代化的房子，當時那一帶卻是安靜而翠綠的田野之地。所借住的是一個房間斗室而已，一點都沒有奢侈可言，附近有一整列的高壓電塔一直通到新埔。位在一座山頂突出地方的鐵塔下有一塊平地，如果找地方坐下，可把新竹市被盟軍B-24轟炸的情形盡收眼底，是我們小時候成群常去的地方。這看起來無辜的芎林，山雨發怒時也是不好惹的，而那成列的高壓電塔更成了芎林恐怖的象徵。

## —老農夫的恩情—

那是一九四五年初夏下午的事，當時美軍連日轟炸日軍位於附近軍用機場，我們疏開的地方確定叫做犁頭山，我那時還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因為疏散至鄉下，學籍也就隨之轉往由犁頭山徒步三十來分鐘方可到達的六家國小。當時的上課情況頗受空襲影響，有不少的課是在防空洞裡打發掉的。但是，六家國小的經驗卻不容忽視，學校要求學生要捲起袖子或換裝去下田、除草，樣樣都來，對小時候的我來說是難得的經驗。

犁頭山上的生活對我來說很新鮮，屋主姓陳，是客家人，並且如上文所說是當時所謂的甲長。我的客家話是當時與鄰居的小朋友相混而學會的，故當時與客家小孩一樣講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在醫學系畢業之後，即一九五九年，我還能以客家話看病，但現已淡忘了。這一點，我同意何曼德院士在他《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書裡的意見相同：「小時學外語比成人快，但學會的語言忘得也比成人快。」

陳先生的家孤獨地位於叢林密布的山腹中，附近還有一排高壓線，由山底爬上屋後的山頂直向北走，而我們租的只是四米四方的一個房間。陳先生務農，勤儉耐勞，家境小康，為人極為和藹。他有數個年紀和我相近的孫子，不上學時我和他們打著赤腳在陳家附近到處探險搜秘，捉蟋蟀、蜻蜓、蝴蝶、蝌蚪以及趕鴨、養雞，樣樣都來，怕的只是經常在附近出沒的蛇。有時候大夥兒下山到山腳處一條十公尺寬的山溪游泳，那時沒聽說過「環境污染」這四個字，山溪的水清澈見底，魚群悠游水中，周圍陪襯著翠綠的山景，與橫跨溪上寬約三十公分的簡陋木板橋，映在我童年的眼裡，倒也是一幅明媚的南國情畫。我卻沒料到這條我們常去戲水的小溪，當它怒吼時會多麼可怕與無情。

有一天下午六家與芎林一帶忽然黑雲密布，一片山雨欲來的模樣，學校一下課我就帶著書包往犁頭山跑。那時沒有柏油鋪面的公路，只有石頭鋪蓋的鄉間小徑，步行不易，我在路上使勁向前走，不到十分鐘，天色越來越暗，閃電與雨水以排山倒海之勢從山區衝下來。我心裡一意要回山腹的家，低頭彎腰抱著書包、淋著雨向前推進。那時的對電所知不多，最畏懼的是那一排高壓電塔冷酷無言地矗立在烏雲底下，似乎在暗示橫在我前面的逆境。突然間，我看到一道閃電打到前不遠的

電塔頂上，火花四濺，嚇得我裹足不前。當時我沒有手錶這種奢侈品，不知是下午何時，好不容易到達由大路轉入通往犁頭山腳的小徑，天色已經很黑。我順利越過了一條約五公尺寬的小溪，全身溼透，沿著田埂，冒著越來越猛的雨勢，終於來到了位於山腳常來戲水的小溪。但橫臥在我前面的不再是那翠綠的山間川流，而是一道洶湧怒吼的濁水，平常在兩岸觸目可及、被溪水洗得淨白的石頭，都被波濤淹在水底，水面高到離站在岸邊的我腳下約一尺半的地方，我唯一賴以回家的木板橋早已不見蹤影。我心想回家無望，就趕忙掉頭想走回六家的老師家裡過夜，但走到先前那條小溪時，發現因山洪而暴漲的溪水把那塊小木板也沖走了。斯時的恐懼與不知所措真不知如何形容，但一味想返家的念頭又促使我回到山腳的大溪。溪旁有一座土塊砌成，大概是附近農民存放農具用的「土角厝」，我就蹲在簷下發呆，心跳卻一直悸動著。夜幕徐徐低垂，想家的念頭與不知如何是好的徬徨心情，使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不禁嚎啕大哭了起來。

哭了好一陣子，突然旁邊出現了一位老農夫，穿著棕櫚葉編成的蓑衣，肩上荷著一把鋤子，顯然是在雨中做當天最後一次巡視田間的工作。他操著客家語問我是誰？住在哪裡？是怎一回事？我也操著客家話邊哭邊把來龍去脈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他知道我是疏散到陳甲長家裡的城裡人，就說：「不要哭，晚上就在我家過夜。」猶記得他牽著我的手在蜿蜒的田埂上走了十來分鐘才到他家。

比起陳先生的家，這是一座很簡陋的農舍，牆是土磚砌成的，地板就是一片裸露的硬土。屋裡顯得很陰暗，只有兩盞電燈，房內空空盪盪的，沒有幾件像樣的東西。除了農夫與妻子之外，我不記得他家裡有小孩。婦人馬上燒了一桶熱水幫我沐浴，給了我一套成人衣服換上，並與他們共進晚餐。我一直跟他們談了很多話，告訴他們在新竹城裡的生活，家有幾個兄弟姊妹，父親做什麼……等等。他倆也說了一些農人的生活與作息讓我聽。現在回憶，當時席間我和他們已經有了一座心橋。知道我想家的心情，老農夫答應一早就帶我回家。那時候電視當然還沒問世，鄉間夜晚泰半無事可做，吃完飯就上床就寢。屋外還是傾盆大雨，但我至少有一張乾燥的床。心裡雖然一直焦躁，但農夫的忠厚與關照使我覺得滿心溫馨，一下子就入睡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了，迫不及待地衝到外面觀看，陰暗的雲層依舊低垂，但雨已停歇。老農夫婦說不吃早餐不能走，我只好狼吞虎嚥地吃下了早餐，換上自己仍舊潮濕的衣服，我鄭重告別了農夫的妻子，農夫就帶我走向山腳的河溪。溪流水勢仍然湍急，但比起昨晚已平靜得多。走到被沖走的木板橋原地，突然見到母親與兄姊在對岸焦急地觀望著，顯得面對溪流束手無策的樣子。我不由

得蹦蹦大跳並且大聲叫了起來，他們見到我出現也雀躍地招手直喚我的小名。農夫告訴我溪流又深又急，所以我不能徒步過河，然後他就揹著我，小心翼翼地走入溪中，走到河心，水還淹到他的胸部，但他終於安然地揹我到了對岸，把我帶回到家人的手裡。家人對農夫的感謝與對我生還的慶幸自不可言喻，父母親在物質匱乏的當時，還準備了厚禮去答謝了農夫夫婦。

我那夜的遭遇與家人整夜未眠找我的故事兩相對比，是家裡百提不厭的話題。後來，成家立業之後，我自己的三個女兒對於我這段童年故事也幾乎是百聽不厭。而我一直到現在，還清晰記得那一對雖然貧窮，但憐憫之心與人情味不亞於任何人的老農夫婦，也忘不了騎在他背上時所嗅到的、他為我流的汗水的味道；那昏黃電燈底下三人進餐的情景，在我的記憶裡更是依舊鮮活，彷彿是一幅不朽的名畫。不知他們如今在何處，但料想已不在人間。

住在陳家的那段時間，我還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童，當時令我最雀躍的一天，就是「全副武裝」回去看新竹的老家。那是一日式的房子，日式的房子治安設備堪慮，但我記得日據時代的社會安全是很值得歌頌的。那時台灣沒有電冰箱這種高貴的電器，母親得天天到市場買一些日用品及當天要用的食物，但她就像其他與市場老闆熟識的顧客，並不必拎著所買的東西回家，店家會幫忙送來。

家門沒上鎖，就開門放在門內玄關，如果家門鎖著，東西就放在門旁。晚上睡覺如果太熱，就大開門窗躺在窗旁睡起大覺，也不怕宵小與樑上君子光顧。所以住在日式房子，人就算已經「疏開」了也無憂無慮，偶爾回去拿拿郵件就夠了，我最雀躍的就是這一天。陳家離新竹約一到兩個鐘頭的距離，老實說，那時的公共交通不多，僅有的幾條路線，包括台鐵，是又高級又準時的。陳家到新竹沒有公共交通可以搭，只好徒步來回。這種行程，一定要穿好準備能快速躲起來的衣服，以便為隨時都有可能來的空襲做準備，雙腳則要綁上「腳綁」，活像一小兵，像我喜歡的劍道一般，是我最嚮往的一天之一。

有一天，駐在新竹機場的日軍航空隊打下了一架美軍飛機，飛機殘骸在新竹圖書館附近展示，可憐的飛行員則在新竹市街被拖著示眾。他的最後命運不知如何，預料沒有好下場，因為日軍對付戰俘是不守「日內瓦協定」的，就像希特勒的納粹德軍一樣，如何苛刻，只有當事人才曉得。這一回顧，看看菲律賓巴當之役以後美軍俘虜所經驗的死的行軍，或英軍領導人在新加坡當地淪陷後被日軍給俘虜、帶到台灣東部的境遇就可見一斑。電影中所呈現日軍對待盟軍俘虜的情景，難免有一些以票房為目的的戲劇化，但離事實不遠。

我父親不一定每天回到疏散的芎林家，但回家時總會帶一點山珍海味，等他回家，全家都會很快樂，不然每天就只好是吃高麗菜粥，吃得每一個人都厭倦了，可見當時（戰爭末期）物質缺乏的程度。

有一天父親一副焦躁的樣子回來，告訴家人戰爭結束了，美國發明並投下了兩個炸彈，一個投在廣島、一個在長崎，都在八月的上旬。這兩枚炸彈的威力大到廣島與長崎幾十年間生物無法生存等等，後來才知道這是誇大其詞。台灣的前途呢？台灣將交還中國，而在台灣的日本人將分批送回日本。當時芎林一帶沒有內容充實的報紙，消息的流傳多靠口述傳言，但父親所言恐怕不是扭曲或捏造。

戰後很久，手上有了一本麥帥的傳記，麥帥是太平洋盟軍地面軍隊的最高統帥，而當時美國海軍的最高統帥是尼米茲將軍。前者是蔣介石的好朋友，知道盟軍戰勝後台灣會「還」給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軍，故反對登陸台灣，怕這一登陸會大舉破壞台灣，怕交給好朋友蔣介石的台灣只是一片需大舉重建的焦土。但尼米茲將軍則力主登陸台灣而不要登陸沖繩，因為沖繩的守備完固，美國需付出的代價很高。兩人在羅斯福總統前激辯之後，最後麥帥勝利，羅斯福決定不登陸台灣而改攻打沖繩，派往中國戰場有名的史迪威將軍在中國戰場解職後也參加了沖繩戰役。我手頭上也蒐集了一些沖繩戰役時美國大兵救沖繩小孩的照片，最近日本教科書扭曲了史實是遺憾的事，我相信沖繩的平民跳崖自殺，無疑是有日軍幕後的慫恿或強迫。

## ——台灣變天的開始——

這是台灣變天的開始。

我們家人和其他人一樣，樂見台灣回到中國的懷抱。家譜裡寫的我們的祖籍在泉州府同安縣

十四都盛明鄉安仁里連厝保上店社，所以我們祖先來自中國沿岸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而我們是第八代的移民。但我們也得承認，經過幾代人獨自經營之後，不同的社會會產生不同的文化，交通的不發達會使得這種文化的差異愈大，這是難免的社會文化演變。就以語言而說，現在全世界據估計有六千種方言，而其中三百三十六種已經瀕臨消失之命運，也是這種演變的後果。現在全世界都在講全球化，此趨勢最後必定滲透到語言層面，這是交通發達的一種自然結果，而英文已經漸漸變成世界公語了。我們家人很歡迎盟軍的勝利與中國的勝利，心裡迫不及待、也很好奇地等日本人的全面撤退。光想這是一個新的局勢，不管結果會如何，就夠使人有所期待。

社會安全情況既已改善，我們就告別了芎林的陳家而搬到竹北面向縱貫道路的一棟房子。為什麼我們家裡要繞這個彎兒我現在已經說不清楚，家裡也沒人知道詳情而向我解釋，只記得那時的竹北是很吵雜的地方，使我每天生活過得很不慣，思念新竹老家的情緒愈是強烈。不久，我們終於搬回了新竹省立醫院隔鄰的老家。

戰後，社會有了驟然的改變，新竹市區的日本人都在準備回日本，他們把所有搬不回去的東西堆在路邊擺攤子賣，那時日本人擺的攤子到處都是。在日據時代有不少台灣人受日本人欺壓的個案，有人就趁這個機會報復，報復的對象除日本人外，也包括身為日據時代的公務員。但父親為人正直而受民衆愛戴，很多人圍上來保護父親，根本沒聽說過受人威脅的事。

大家一心一意等待接受日軍投降的中國軍隊終於在一九四五年秋天到達基隆，接著散開到台灣各地，我們小孩（那時我才十一、二歲）及大人皆沿街排隊歡迎這軍隊。那時派台的國民政府軍據稱是陳儀手下的七十軍，程度之差，比起日本的軍隊差一大截；主要的缺點是軍紀散漫，很多七十九歲的軍人好像也沒見過現代化的設備，交通規則對他們而言則根本聽都沒聽過，自來水、電燈壓根兒見都沒見過的比比皆是。這分明是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時的失策之一。派來接收日本軍隊的國軍居然有紙傘、大鍋等一般家庭的裝備，不像現代的軍隊，如果派來的軍隊是由青年軍等知識水準較高的部隊，後來的演變可能不同。

社會驟變也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觀察，日本人遣返的第二天開始，本來可以生飲的學校自來水突然公布不能生飲，表示自來水的處理發生了問題，至今，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恢復。通貨膨脹是另外一個問題，一隻冰棒賣到快一百塊錢，日本投降一年以後從新竹到高雄旅行居然要二十五萬台幣。社會治安也明顯地惡化，民衆開始為自己的住所裝鎖、鐵窗、鐵門，這些在台灣都是第一次出

現。而台鐵不但品質變差，貨車代替了幾輛客車，班次的準時也根本談不上了。

雖說這些是戰後紊亂、兵荒馬亂的當然結果，而且有人說這種亂象是戰後的當然現象。但究竟它還是戰勝國「君臨」台灣接收的先遣榜樣，政府應有未雨綢繆的沙盤推演才對。

## —戰後的台灣小學—

失望歸失望，該做的事還是非做不可。父親的漢學本來就很好，這時還預期不到後來的演變，而雀躍於他所擅長的技能有用的一天終於到了。我們留在家的兄弟姊妹晚餐後都圍在以父親為中心的小圈子唸起《三字經》，每天晚上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開始。現在想起這《三字經》有多少用處，是個大問題。根據十九世紀的生物演化論，即達爾文的理論，幾百萬年前的人類來自野獸——猩猩，這些猩猩都有類似的獸性。後來就像馬克·吐溫所說，人類是因為新皮質把蠻居在含有獸性的舊皮質蓋住了，把人本來就有的獸性也一併蓋住。蓋住的程度因人而異，因此才有所謂不同的倫理、虛心、利他……等人類特有的性格出現。這從外蓋住的力量不是遺傳，就是

是教育，即馬克·吐溫所說的外力，這外力可以教育的力量加強。但禍到臨頭，被逼到牆角、千鈞一髮之際，每個人舊皮質的獸性會一一顯現。所以我現在是一個堅信「人性本惡」的信徒，並不贊成孟子的人性本善說，現今媒體報不完的社會新聞，哪一件不是在人性的盡頭，而獸性露臉的結果。不過在一九四五年當時，父親怎樣教，我們就怎麼學。

我讀的小學也換了，一九四五年我被分配到南門新興國小念完剩餘的小學年限。那時，台灣的經濟蕭條，通貨膨脹厲害，大部分學生都無鞋子可穿而打赤腳上學，我為了要與別人相同，故多半的時候也打赤腳上學。但我在新興小學也受了不少氣，那時有一批台灣人對大陸來的人已經開始產生了厭惡之感，故把他們稱做「四腳」，意思即指在地上爬的豬，這種思考在小學生之間也蔓延了開來；而日據時代與日本人親近過的人，像我，戰後才分配到一般小學念書的叫「三腳」，是從四腳演變過來的新名詞，我在校內便是以三腳出名。但後來知道，在學校要出人頭地、保持一個人存在的尊嚴，不是別的，靠的還是學業的表現。

上新興國小留在我記憶的是上學時會經過的南門街一家米店，米店的小開是現已名聞全國的洪星程，他完全是靠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成功而出名的。每天早上我還會到這家在附近也小有

名氣的米店邀洪同學一起走到學校去，洪同學後來也到新竹中學受教育，之後考入了台大經濟系。

在學校所學的除了算術有點像樣

以外，國文的ㄉㄉㄇㄈ簡直是簡單到像在開玩笑，所念的大部分是「貓追老鼠，老鼠跑」一類的文章，根本談不上什麼國學。在十九世紀東瀛的明治維新時代，創立慶應大學前身的福澤諭吉在其自傳裡說：「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全國的所謂學問就是漢學，有學問的人是學優秀漢學學儒。」我現在寫起文章有魚目混珠的感覺就是這



與陳添德（右一）、楊建澤（右二）、周應龍（右三）、洪星程（右四）等人合影。

個原因，因為我沒紮實的中國文字基礎，而台語及台灣的文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頗深也是事實。日人不掩飾這點而公開地承認，影響他們國家最深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朱熹、王陽明兩人，看以前源義經等人寫的毛筆字之漂亮即知其來有自。



新竹市空照衛星圖，箭頭指處為東山街，東山街的盡頭就是竹中，連跑道都看得清楚。

新竹中學

045

新竹中學是新竹地區人人所嚮往的學府，它的辦學一向嚴謹，在日據時代就很出名。日據時代，台灣有一所高等學校，高等學校等於數十年前美國的準備學校（preparatory school），是念大學前必經的過程。日據時代新竹出了不少台灣高等學校的畢業生，而那時的新竹中學就有一定的名聲。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後，教育部派了廣東省出生的辛志平先生來領導新竹中學，使新竹中學的名校風氣與聲望得以保持。

我是一九四六年考入新竹中學的，入學考試與新興國小的經驗差不多，算術比較難答，但國文很簡單。我記得當時國文考試要應考生寫的是「三民主義」以及類似名詞的注音符號，另外頂多就是「貓追老鼠，老鼠跑」程度的文章解說而已，與小學所念的沒有兩樣。現在看起來是幼稚得可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044

笑，但當時這麼簡單的試題也分得出考生知識的高低，真是奇蹟！

新竹中學當時在很冷僻的鄉間，從有名的新竹公園約走過幾百公尺木麻黃樹點綴兩旁的一條大

路就到，這條路叫東山街像兩點之間畫

一條線一般。我們每天上學走的是東山街，小時候和長大後的那把尺不同，當時以為東山街有一公里長，前一陣子到了竹中，在校的老師才向我透露東

山街只有數百公尺。新竹中學蓋在山坡上，如果坐在高三教室的窗邊可以把東山街盡收眼底。因為

土地寬廣，運動場特別大，田徑場地約有四百公尺長，另有大禮堂一座、武道館一座（當時為圖書

室）初高中兼備，每年級只有三班學生，因為地大校小，所以草地

很多，不像今天的竹中，到處都是水泥地。竹中客家人特別多，約佔學生總人口的三到四成，所以

我們從小就習慣於兩個族群的相處，閩南和客家並沒有相處不良的故事。

## —通學—

新竹中學在我剛進去的時候是省立的，而且是初中與高中兩部構成，可能剛開始只辦高中，但



初中時的照片。

在我的記憶當中是一片白紙，任何讀者有興趣可以查查校史即可明白。只記得竹中因升學率極高、推行五育並進而名震四海，其教育品質當時即可與建國中學、台中一中、台南一中及高雄中學等一爭長短。因為學校名聞遠播，故「通學」的同學很多。所謂通學，有廣義及狹義的解釋，廣義的通學是指凡是不住校的同學，都是通學生，哪怕是走路上學也都算。而狹義的通學，是指北由中壢或桃園以南，南到苗栗一帶，東自竹東起，每天搭火車或公車上學的同學而言。這些同學一方面是避免宿舍的昂貴費用，一方面宿舍的確容納不下這麼多同學而使他們被迫要通學，據估計當時有七分之一到六分一的學生是狹義的通學生。

但通學生有通學的危險性，我記得有一同學叫林思明，家住後龍，有一天趕火車趕不上，車開始啓動後他才追上，但跳上車時不慎沒抓緊把手，整個人掉入車子與月台間的橫溝，後來併發破傷風而逝世在新竹的河間診所。

## —辛校長的作風—

辛校長的作風，我想得到的可歸納成幾個主要的特色，第一是他聘請老師特別小心，且選人的視野特廣。我念竹中初中時正逢白色恐怖，國軍在大陸節節敗退，共產黨繼之崛起，隨時有國軍分批撤退到台。最大的一次是舟山撤退，我們竹中還得暫時搬家到省立新竹女中，以便騰出空間給這些所謂轉進的部隊暫駐。民間學者更有不少妻離子散或舉家逃台的，這些人一到台灣，因為當時島內並無這麼多高等教育機關，他們只好委屈求全而屈就成為中學教員，在竹中這類老師特別多。這些老師有的是共黨同情人，他們吸收同黨常用的手法是組織讀書會，有些同學碰到這樣的老師而上鉤參加，等機密敗露後就會受了連累，他們多半被送到綠島或在台灣入獄。這些人很多是高中時才考入竹中的新竹縣立中學的學生，他們都是特別優秀的學生。很少人知道白色恐怖的厲害程度，我目擊過情治人員乘坐吉普車，從東山街直衝至學生正在上課的教室裡捉人的情景呢！白色恐怖如何地侵入校園，現在的學生老師很少人了解。但不管是共黨同情人，這些老師之中後來不少都成為大專院校的教授，可見他們在當中學教員期間的委屈與大材小用。也有些老師在學期中，因為上



辛志平校長。

面的「指示」而突然失蹤的，料想是共產黨的第五縱隊角色（共黨潛伏在教育機關的同路人）任務已變的緣故。而我們當時的這一批學生，是這樣的老師們身教言教並陶冶出來的。

辛校長的第二個特色是承襲日本教育的制度，就是高

年級生管低年級生，而且接受高年級生可以因低年級生不守校規而教訓對方的權力，當然這種奇怪的制度猶如小學的欺壓(guyling)而常被濫用。我初二時，有一次在東山街上看到發生類似的事件，當時某個低年級生見到高年級生忘了敬禮，而受了高年級生的制裁。第二天朝會時辛校長發表了訓話，公開支持打人的高年級生，因而引起了整個初級部學生的寵課，這寵課一連持續了三天。這在白色恐怖進入成熟階段的當時，是一個奇聞。

第三個特色是他與夫人皆有一嗜好——游泳。因為喜歡游泳，所以他規定，凡新竹中學的學生都必須要能游二十五公尺才能畢業。但竹中沒有游泳池，有一次新竹縣立游泳池在晚春開放，開放前一定要把泳池洗刷一番，這是個不大不小的工程，但卻是歷年的工作。點子不少的辛校長去縣政

府把這工作包下來，出動同學利用體育課前去清理，換來全校免費在縣立游泳池上體育課的條件。

台大的農學院有一位竹中畢業的楊建澤教授，曾陪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彥士去蘇澳港參觀政府的十大建設，結果不幸在港內翻了船。楊教授每次碰到我，都提起當時上竹中時如果沒有辛校長要每一位同學都要能游二十五公尺才能畢業的話，恐怕那時他就得魂斷蘇澳港的水中而赴黃泉了。

辛校長的第四個特色是要求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的校隊同學，一律與普通同學一般看待，絕對沒有任何「優待」。如果必須離開學校的那幾天正好落在考試日期，就得先考完再走，或回來再考。這使竹中增加了許多「全能」——功課好、體能也好的學生，這是五育並進的一環。

辛校長的第五個特色是容許日語的存在，這考慮有兩個原因：一是竹中的學生有一半是客人，一半是閩南人，這兩種人在一起要有共同的語言才能溝通。第二，在竹中的前幾年是講普通話講得很彆扭的時候，普通話只是過渡時期的語言，日語才稱得上是永久的。這是竹中與臺南一中等校不同的地方，也是辛校長犀利的眼光看出的一個盲點。

辛校長還有一個特色是會全校放假帶去看電影，目的地多半是新竹的國民大戲院，因為由校長推動整校的學生去看的都是文藝片或是體育片，而上映這些片子的仍以國民戲院為多。我記得在該校不同的地方，也是辛校長犀利的眼光看出的一個盲點。

辛校長還有一個特色是會全校放假帶去看電影，目的地多半是新竹的國民大戲院，因為由校長推動整校的學生去看的都是文藝片或是體育片，而上映這些片子的仍以國民戲院為多。我記得在該

講得很彆扭的時候，普通話只是過渡時期的語言，日語才稱得上是永久的。這是竹中與臺南一中等校不同的地方，也是辛校長犀利的眼光看出的一個盲點。

看電影的日子等於是學校放假的日子，我們浩浩蕩蕩地全校整隊過街，蔚為奇觀。而同學們在戲院裡可以打情罵俏，真是自由得讓我們很享受！

關於辛校長，我在衆多記憶裡，還有一些特別的軼事需在此言及。

有一次，我還在念初三時，校長室傳來消息，要我下課後到校長室一趟，有一短話要說。我照著他的指示下課後馬上往校長室跑，他看見我，畀以一椅子坐下，幾句寒暄之後，他肯定我是好學生，籃球又打得好，所以雖然是初三的初中學生，學校應讓我打校隊，於是成了校隊裡唯一的初中學生。我這才知道辛校長有他的草根性，下達命令也用這種草根性的方法，這也是哈佛大學的羅索夫斯基(Rosovsky)在他的著作《大學》(The University)裡所提好的院長所應具備的草根性，沒有這類的草根性，就做不好院長或校長的職位。

上文說過，讓竹中擁有一個泳池是愛好游泳的辛校長持有一個夢，等我後來負笈到了美國以

後，有一天突然收到辛校長一封親自手寫的郵簡，告訴我他百般奔走以後，已有可能買土地挖冰池。那時候我還是窮光蛋一個，但也想法子捐了十元美金。別小看十元美金，那時候的十元美金以現時的幣值計算不知要值多少美元呢！結果辛校長不但不嫌少，還親筆來信表示感謝之意，使我能參與母校泳池興建而倍覺光榮。

話說我有一次代表竹中參加新竹縣政府主辦的演講比賽，經過一番選拔，打敗了同期同學周應龍而成了竹中的代表。那次的縣級演講比賽是現場抽題，題目要在比賽開始前三十分鐘抽籤才算決定。辛校長派了一隊由學生組成的秘書陪我，事先猜測會有哪些題目，而這些同學皆胸有成竹地陪我赴戰場。結果我抽到的題目是「孟子思想與民主政治」，負責準備這個題目的是湯廷尉同學。演講的結果，我不負衆望拿了冠軍回校，這個冠軍的匾額在大禮堂掛上兩年左右的時間。辛校長在接收我給母校的獎品時說：「還是從ㄉㄩㄇㄢ學起的人比較厲害！」他的涵意在指我打敗了在各種國文獎項經常得獎的周應龍同學而代表竹中參加比賽，這些話使我頗為驕傲。衆所周知，周應龍的文筆與普通話都是超人一等的。有關周應龍的事容後再加敘述。

就這樣我在竹中過的日子也蠻愉快的，今天的年輕人很少會相信在下午兩點以後還在教室徘徊碌而充實。

的竹中學生。當時下午以後的時間都屬於課外活動，不是打球就是搞合唱團、做壁報，總是覺得忙

在我十六、七歲那幾年，我拾起了看書的習慣，湊巧我看的福澤諭吉在十九世紀也是那年歲開始看書，是種巧合？那是白色恐怖起始不久的事，那時大陸大部分的作家都被認為是左傾的，冰心、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以及許多作家的書都不能看，連魯迅的書都在剃刀邊緣。有一則笑話，據說我們情治單位的人無知到誤以爲馬克·吐溫是馬克思的弟弟，故連馬克·吐溫的書也成了禁書。所以當時可以看的中文書並不多，但我找出了一个打破這封鎖的方法。

我看得懂日文書，也講一口流利的日文，我和各兄姊平常在家裡常用日文溝通，所以日文一直有所長進，二次大戰結束後也是如此。恰好我四姊出嫁，她的結婚對象是新竹望族的李家，李家有

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院中左翼一個偌大的房間被開闢爲一間圖書館 裡面擺滿了世界名著的日文版，這些書都是開放而隨便可以借出的。我和三哥猶如兩隻餓虎般向這此羊群撲去，大概很少人看過《紅與黑》(The Red and The Black)這樣的小說吧！不但是《紅與黑》，還包括《娜娜》(Nana)、《特斯》(Tess)等無數沒聽過的書。

## —看書的習慣—

竹中學生的看書習慣是值得一提的，愛看書的不只我們兄弟，後來拿諾貝爾獎的李遠哲也是其中之一，我會看見他拿了一本厨川白村的書大搖大擺地走進了學校。我的朋友傅偉勳比我還手不釋卷，他可以說是讀萬卷書的一個，後來他進了台大哲學系，留學學成之後在費城的天普大學執了宗教學的教授教鞭。不幸他晚年染上了何杰金氏症，於數年後與世長辭。他就是《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的作者。

周宜旋同學，就是用秀才與天才來分等級的那一位，他現在家裡有一圖書館，據說裡面有水準

很高且有意義的日文藏書五、六千冊。想到這事，就知道我們這年代的人，已經老到在考慮身後之事了，最近有一天他來我家，談起在竹中養成的看書習慣，他身後留下的五、六千冊日文書擬全數捐給台大日文系。台大事先派了兩位圖書館員來拾穗式地評估這些書是否足稀世珍本、值不值得台大收藏，結果全數都通過了審查！我也會隨便買書，後來才發覺不喜歡的並不乏例，我搬了幾次家，搬不走的一大堆書都請愛好書籍的醫學生來檢，免費贈送了事。



唐偉勳教授，1991年。

台灣水準高、較有教育的父母會到書店逛遊，但大半父母不愛看書。據媒體調查報導，台灣每一個人一年平均才花一千元買書，這是一個很小的數字，正驗證了前面敘述。我每到友人親戚家，習慣性會看看家裡有沒有書架，發現沒有書架的不在少數。如果有書架，書架上放的是哪一種書，是我很好奇的一個問題。

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曾經說過書有三種，

其實我認為書有四種。一個人應該多看的是能提升自己的教養書，這早在十六世紀法國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已強調了這一點。林語堂說的其他兩種，一是專業書，二是娛樂書，我則在林語堂的分類外另加工具書，總共成為四種。很遺憾的，我發現在台灣家庭裡書架上的書大多數是《台灣之子》、《無愧》之類的娛樂書，不屬於林氏所提到的提升自己的教養書，所以整個社會的水準也顯著提升較慢，心靈改革步伐快不起來，更遑論它們如何進行(這一點請看李登輝著的《武士道解題》)。在《河殤》這本書裡，兩位作者蘇曉康與王魯湘提到：「人的素質是落後概念的本質。」我想這是刺到了要害。龍應台又曾經說過台灣書籍市場很小，因為所發表的書籍能賣五千冊以上就可以說它是一本暢銷書，似乎在台灣要出版一本暢銷書是比其他的國家容易得多，或是難一點？

不管上面的故事怎麼演變，我的讀書習慣是在竹中時代約十六歲左右時建立的。我得承認，我念的國學還是不夠多，查我現在所看的書，百分之四十是英文書，百分之四十是日文書，百分之十是德文書，而剩下的百分之十才是中文書。也因為這樣，我覺得清華大學等把我捧得太高，反而使我覺得自己是混水摸魚在諸多作家中，因為我國學的基礎並不夠穩固。我的看書目的與林語堂所說

的相似，在吸收新知，學別人的經驗，而成爲活到老、學到老的習慣。從這方面來看，我同意他的說法，也認爲報紙沒有太多知識，故不必花太多時間看報紙。台灣的報紙特別因爲標題很詳細，所以自從上竹中時，我就養成每天的報紙翻一下就放置一邊的習慣。

外文書與中文或日文書有根本上的差異，東方的作者對準備索引很馬虎或根本沒有這種企圖，這是懶惰的表現，包括我自己在內是對溫故知新或寫作的大障礙。溫故知新的意義只能用索引來簡化，不然要溫一件故而想知得常重看整本書不可。我早就對這方面注意過，故凡念任何語言的書皆自做索引，以備將來查資料。就算作者已經準備了索引也不一定統統有用，因爲每一個讀者注意的事不一定與著者的符合，故自製的索引特別有用就是。譬如說，普來斯頓(Diana Preston)最近發行了一本註解相當仔細、描述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的書，如果不細心，誰能發現當時被義和團暴亂而包圍在英國領事館的一批人中，居然包括日後成爲美國總統的胡佛呢？如果不做索引，誰會記得作者在哪裡說過這話？

## 外語的學習

我這一輩子的最大勝利是在外文的學習，這不單涵蓋了竹中時代的英文，後來在考進台大德文時也發揮了作用。日本有一種學英文以及各種外語的參考書系列，以英文舉例來說，叫「英文四週間」，這四週是用來教什麼呢？就是在分析字的來源。

英文、德文在拉丁文、希臘文、法文等之中有共同的語緣，但中文象形文字的形象沒有語源，故無語源學可以依據，譬如說，“terr”之指「土」是有它的來源的，但中文的象形文字沒有這個切入點。以英文來說，如果語源字(Etymology)弄懂，就知道“terr”意義在土地，於是含“terr”的字便可一網打盡，如“terramycin”是「土黴素」、「Mediterranean」是「地中海地帶」、「terrace」是「陽台」(土造的爲主)、「territory」是「領土」、「terrain」是「地勢」、「terra-firma」是「地球」等約十個字可以收割殆盡，這看字典就可一查。當然「土」字邊的字會是指什麼，這也是一種語源學，但像“epidemiology”這個字，如果我們一直集中在「流行病學」，誰會想到該字有「人群」(dem)的涵意在裡面？因此，如果在動物之間流行的病就不叫“epidemiology”，而是說

“epizoolgy”呢！民主政治這個字在英文因此以“democracy”表達，因為這是一種以人民作主的政治制度，其他以此類推。

了解這個方法使我的生字能力特別強，從前在竹中教我們英文的老師叫董增慶，他有一天就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前說：「黃崑巖念英文的方法和別人有一點不同。」這使我覺得很汗顏，汗顏的是我學東西雖然有我的一套，但總覺得好不到哪裡去。但考台大入學考試時，英文確實是我考取大專院校很重要的關鍵。

考入台大的醫學系醫預科，第二年修了德文一年，由周學普教授執教鞭，我也用了同樣的方法。德文與英文不同，複合名詞特別多，所以我的方法特別管用。當時全班同學都學德文學得津津有味，一年下來，已經能看得懂《茵夢湖》等短篇小說。

我的英文能力對我一九六三年負笈美國後的英文學習很有幫助，但仍自覺比起黃達夫及賴其萬教授還不如呢！

我於一九六二年抵美，前往華府的喬治華盛頓大學修博士學位，當時外文的必修有德文及法文，我向負責註冊的人問：「日文可以當作外語嗎？」答案是不可以，我再問：「那中文呢？」註

冊人員回答中文也不行。於是我就逼她考我德文，說好如果我考過了，就只要直接學法文即可。原來，我早預測到這個局面，所以在離開台灣到美國前已在補習班補習德文三個月，以備不時之需。這下子戰略發生作用了！我通過了德文的考試，這使我省了不少學費，也增加了我學外文的把握。但可惜的是法文課只教我們如何念法文的科學論文，沒有教如何發音，所以我離精通法文還太遠。

一九九五年我在擔任十三年院長後下台，之後就前往德國學德文會話，當時我的德文生字能力也使德文老師嚇了一跳（請參照第六十六頁）。不管怎樣，瞭解語源是使我能操六種語言的能力源泉。

語言是一種工具，我要再三強調語言能力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能力，語文絕不是爲買東西而學的，知識分子學語言是爲了想瞭解外國的文化。學語言也要有膽子，所下的功夫與時間才不會白費。有個成大同學曾經問我什麼叫精通一種語言？精通一種語言依我的定義，不能僅止於能和外國人進行有關天氣好、吃過午餐嗎之類的生活會話，而要能表達抽象的感覺，或能看懂該國的原文書，這樣子才能感受得到文化的洗禮，不然就不算精通，只是懂得表皮而已。

## —看外文書的心得—

很多人認為語文的天分與生俱來，這我不全盤否定，但也深信學語文不是全靠天分。外文學不好，尤不要認為「我無天分」而放棄，學外文要靠持之以恆的興趣，也需要有效的方法。一九八二年決定從美國回台灣時，我擔心的事不少，其中一項，就是怕回來沒幾年，我的英文會逐漸退步。多年來在台灣每遇想不起一個英文字，恐懼感就湧上心頭，似乎擔心的事已經成真了。但冷靜評估我今天的英文能力與一九八二年相比較，說實話，我現在的英文比二十幾年前還得心應手，對我來說，這證明了我學習方法的正確。正確的另一旁證，是我用同樣的手法，在過去數年裡自學了德文，成為我能運用的第六種語言，這是我治學生涯的一大勝利。我之所以這麼認為，是因為語言是治學的基本工具，而治學要細讀，語言不好，不但閱讀難推得廣闊，細讀更無門。

我在台南基督教青年會開過英文課，教如何念《時代週刊》，也在成大醫學院教醫學英文，透過來上我課的人的英文能力來評估我們國內一般英文的教學，覺得比起從前進步有限，近幾年是例外。從托福考生的平均成績來看，台灣排在東南亞國家的末端，這是很難看的，日本比台灣更慘，但想單從文法切入來征服語文，是下策，是緣木求魚。

把文法研究了一番之後，不必等到精通的地步，就應該勇敢地把文法書放到一邊，因為再念文法書，總脫離不了那常見的幾個範例句子。我初一才開始正式念國語，記得常念的是「貓追老鼠，老鼠跑」之類的句子，翻開英文文法書，也都是「下雨」、「正在下雨」、「昨天下雨」等等與「貓追老鼠」頗為類似的句子。這些字句變化不多，生字有限，而出現的文法情況更是死板得使你無聊透頂。所以我說，學習外文應該把文法書「阿殺力」地放在書架上，除非必要不去碰它，應該要跳入茫茫書海去找書來看才對！書裡的文章會帶你到那真正廣闊的世界去，那裡有森林，有花草，有雷雨與晴天，有飛禽走獸，那裡才有始料未及的文體情況不斷地發生，你會發現那裡有活的文法，是文法生命的所在。

所以學語文，尤其是學外語，不應該變成文法的俘虜，與講英文的人接觸多了，你會發現他們

不見得比我們懂文法。但問題的關鍵在把文法書擱置一旁之後，應該找哪種書來讀？念專業的外文書不等於是看外文書，因為專業的那一套變化有限。所謂看書，我指的是看課外書，這與一些美國的醫學教育家鼓勵學生要念課外書，也要看莎士比亞，是同一個道理，華府的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最受歡迎的選修課叫「莎士比亞裡的醫學」原因在此。看英文報紙當然也是一種方法，但據稱美國報紙上的一般文章是以十四歲讀者的閱讀能力為標準而寫的，所以光看報紙也不是辦法。

把文法書丟了，接踵而來的是該看什麼書的問題。我在中學時看的書不多，因為那時買得到的英文書也著實很少，常見的是原文的讀者文摘。讀者文摘的文章題目很雜，文體變化也多，而且口語頗多，對初次試讀英文文章的人不見得容易。到了大學畢業，在第八期預官訓練時，我二哥給了我一本賽珍珠(Pearl S. Buck)的自傳《我的幾個世界》(My Several Worlds)，這在當時是一本禁書。何曼德院上最近也寫了一本英文的回憶錄，書名是《幾個世界》(Several Worlds)，兩本書名很像，讀者不要混淆了。

我總是趁上課時偷看賽珍珠的書，這一點坐在我前面、藥學系畢業的方森茂學長最清楚。我對賽珍珠在中國的那一段生涯與經歷頗覺引人入勝之外，她記述的北伐軍隊進入南京時的種種表現，

則大大地開展了我的眼界。讀了這本書後，奠定了我之後讀外文非專業書的基本策略。

要使閱讀外文的能力進步得快，選擇讀何種書籍是成敗的關鍵。我發現如果專選一些對內容背景已有些認識的外文書，我就可以專心去瞭解英文，消耗在瞭解其情境發展與經緯的時間就可以省下。譬如說，如果選讀電影亂世佳人的原作《飄》，若不是長住在美國南方的人可能不容易瞭解裡面所描述的風俗民情，又如果不諳南北戰爭的前因後果，對整個故事就會有許多迷惑與不解，因為南北戰爭與《飄》的故事是緊緊編織在一起的；要瞭解白人男女之間的感情糾葛，甚至白人與黑人之間的主從關係影響所及的言行等等也會是問題。這些困惑，都會加深英文的難解度。

基於上述考慮，我認定，如果先選些我已熟悉的中國或日本社會歷史為背景的英文書閱讀，不但在技術上節省很多精力，而且因為我生來對歷史的喜愛會使我手不釋卷，必然會有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正式開始涉獵外文書的初期，我選的書有賽珍珠的自傳《我的幾個世界》、史諾(Edgar Snow)訪問在延安的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人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的史迪威將軍事蹟、鴉片戰爭的歷史等等。讀這些書的當時，我真有以跑百米的步調在跑十公里競賽的感覺。

多年前，我把德文文法書放回書架，請一位奧國朋友買幾本德文書，說我要的書必須與

日本或中國的歷史，或與醫學有關，結果他寄來四本書，一為《敢說不的日本》，二為《現在日本的誕生》，三為德文版的溥儀《末代皇帝》。最妙的是第四本，是德文的台灣旅遊書，書中深入介紹台灣社會的各層面，南北各都市與名勝，由基隆寫到鵝鑾鼻，無一不是耳濡目染的，這使我讀起來有如健步如飛。

我曾在德國南部名叫普林(Prin)的小鎮內一所德語學校學德文會話五週，該校師生對我能夠靠自習而有如此的閱讀能力頗為驚訝，頻頻問我用的是什麼方法。經我說明後，我上述的戰略在那裡就以「黃教授方法」著稱而傳開來了。

## 追根究柢的態度

我每次聽國內教授或科學家用外文的幻燈片演講，總會在片上找到不少拼錯的字。拼音正確是否重要？國內各種考試的英文試題，總少不了與拼音有關的考題，這表示拼音正確是很要緊的事。

誤，有下列三種方法。

第一、要講究發音；一般人只茫然地知道學語文要講究發音，交談時對方才能懂，殊不知發音會直接影響拼音的能力。很多國人看不出英文的發音有規則可循，使得發音毫無章法。誠然，英文的發音遠不如德文之井然有序，但卻比中文好多了。我回國後，遇有陌生的字查國語日報字典，常會見到「又音……」的註解，表示可發不同兩音的字還不少，統稱破音字，在李豔秋當年主持的「每日一字」節目中也會強調中文的這個特色，因而我早已下了「中文發音比英文複雜」的結論。很多人摸索不出英文的這些規則，認為發音技巧屬於發音學的領域，常人高攀不上，所以目前在中學、大學裡，發音準確的英文老師早已成為稀有動物。不說別的，長音與短音為何物？重音何在？這些指導起來該是易如反掌，對國人卻成了苦差事。發音如果入了門，遇到拼錯的字，唸起來就覺鷙扭古怪或根本無法發音，它等於被你抓個正著。我抓拼錯的字比別人快，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研究了發音的緣故。

第二、拼音常出錯是不解英文字的字源所致。英文字的來源不一，但不論字源是來自希臘文或拉丁文，不管它是埋伏在字首、字尾或中間，拼音是固定不變的。每一個英文字皆可以說是其來有自，而且絕大多數的英文字是有了字才有音，不是有了音才配字母而成的，最常見的例外是一些形容聲音的象音字。字源學叫“*etymology*”，欲知字源，只要查一查韋伯（Webster）字典，皆有註解，一點都不難。以英語為母語的英美人士如果對字源毫無概念，比起錯字會很像國人，這我在美國指導彼邦研究生時就會領教過，是頗耐人尋味的。

第三、得在腦中對每一個字的形狀有個影像，遇到錯字時才會有「這個字看起來有點不對」的感覺，相信我們寫中文的白字或錯字，都有過類似的經驗。

我對拼音遜遠的老師頗不諒解，在醫學系裡，英文幾乎是專業語言，使用的頻率恐怕不亞於外文系，所以醫學系的教師帶著滿是錯字的幻燈片上課，就是不折不扣的誤人子弟。試想如果用的中文幻燈片裡有一堆白字與錯字，那像什麼話？在國外演講，片上遇有錯字，演講者還得向聽眾道歉呢！

我有一位朋友名安士壯，是康乃爾大學醫學院的內科教授，多年前他住在紐約市北郊的馬瑪羅



與安士壯博士於巴黎露天咖啡座休憩，安士壯博士隔席為其夫人。

內克鎮（Mamaroneck）。他的住家在一片叢林裡，是一棟有一百多年歷史、古香繞樸的老屋，走在屋子裡地板到處窸窣作響，房間格局有如迷宮。但使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這些，而是在浴缸旁邊居然有一個小書架，可見安士壯教授在浴缸浸浴時還在看書。浴室裡比較潮濕，在那裡放置書籍我並不認為是好主意，但我同意在浴缸裡浸浴或甚至於坐在馬桶上的時間，是可以好好利用的時間資源。我很早就做了種種揣測，羅丹的名作「沉思者」到底坐的是板凳、岩石或是馬桶？他的姿勢一直使我認為他坐的是馬桶，「沉思者」宛如

是一位很會利用時間遐思的人，連坐在馬桶上的時間都不放過。事實上，浸浴和坐馬桶，我是很少不帶書的。

但我生性求精，不管在哪裡看外文書，都非得把生字的意義立即徹底釐清不可，這就演變成馬桶、浴缸旁非得常備字典不可的局面。時至今日，不懂生字已經極少，我已經不像以前一樣依賴字典了，但我家裡的確有過「各戰略要地皆部署一本英文字典」的非常時期，目的無非是要能隨時隨地順手翻翻，省掉跑往書房的麻煩。

有些英文老師或外國人對勤查字典、確定字義對學習英文的需要性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生字不必逐字查閱，只需由前後句子的涵義猜猜即可。這種學習方法有它的價值，因為我們學母語的確也不是捧著一本字典學來的，但這種方法似是覆蓋了一層吹不走的薄霧在字義與句子的語意前，會因為看不到對方的真面目而使我焦慮不安，更何況臆猜的大意難免與實際意義有些微出入。反正遲早非把它搞個水落石出不可，為什麼不趁早呢？看書查字典會使閱讀速度減慢，這的確是個缺點，但我覺得這比狼吞虎嚥導致文意消化不良要好得多。

勤查字典，把字義弄得一清二楚，對加強以外文抒情的能力會有關鍵性的影響。人的情緒複

雜，深淺有別，各有詞藻可供擇用，要能把這些抽象的、感情的、微妙的差異加以抽絲剝繭、精確地表達，則非要有意準言宜的字彙不可。只知生字的約略大意，就很難達到這個境界。外文的能力如果不到這個地步，絕不能算熟稔，因為我們的交談不能永遠只停留在食衣住行與氣候的話題上。

提到查字典，我要趁此機會呼籲，我們國內需要彙編更多高水準，而且能跟著時代改訂與前進的各種外文字典，例如法文、德文，不能只講究英文字典。有好字典才能給學習外語者方便，也能加速國人的國際化。目前我個人用的都是日文的字典。

## 人生典範

我在初中時就有了心中的典範，找一個典範是學做人與提升自己很重要的步驟與捷徑，但這典範我主張從自己的周遭找。找不到嗎？我才不相信！孔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身旁任何在某方面比自己強的人，他們都是自己的典範，典範更是學習目標具體呈現的優點。為什麼非得要把自己提高到史懷哲或居禮夫人的程度？我敢打賭回答史懷哲或是居禮夫人的這些人，他（她）們的知識來自傳記或自傳，我常問，如果你是以史懷哲為典範，會在畢業後到非洲去嗎？大多數的考生都啞口無言，回答不了我的問話。

### 蘇森墉老師

我的典範是竹中的合唱大師蘇森墉老師，蘇老師日前才因巴金森症而結束了他近十年的病痛生活。他生於台北延平北路，少時就搬到福建省，所以他受教育、成長皆在大陸，樣子看起來就是一副來自大陸的模樣。他出身於福建音專，也當過我們的班導師。

當然他教的是以音樂為主，但他多才多藝，所以有關人文的課他都可以代教。有一個難倒中國人的英文字叫“sophisticated”，這個字是「複雜難以理解」的意思，一般人用口頭解釋不清，就舉出實例以收立竿見影之效。這個字在竹中最好的實例，我認為是蘇老師，他對一般藝術的造詣不同凡響，「蒙娜麗莎」雖然不是蘇老師所繪，但他是我心目中的達文西。像他這種人，英文叫文藝復興型的人。他以身教言教引導了衆多學生走過在竹中的六個年頭，在黑板或週記本，也寫一手脫俗的字，洋溢著才華，他的文筆、水彩畫都超出一般的水準，而且擅長打籃球。他教我們唱的歌都是典雅超俗的，我們至今都還會哼呢！他自己也創作了不少歌曲，曾在台校友彙整成書，竹中的第一校歌就是他的作品。



蘇森墉老師與其夫人合照。

他不是一位嚴師，我從未見過他動怒，閒言不多，但很健談。畢業後週末南下探訪，他和見識不廣的我非暢談直到深夜一、兩點返不了家，幾是例事，使我自己母親也嫉妒了起來。有人說過要贏得別人的欽仰萬不能強索，他就是以風範影響學子的，我們追隨的是他自然吐放的文化氣質，他強調我們如不能為創作家，也應為有品味的鑑賞家。蘇老師的提示，不知豐富了我這一輩子多少自樂的生活。

蘇老師從未洞悉我一直以他為典範的秘密，我有四件使我覺得與有榮焉的事，一、享譽全國的竹中合唱團的前身，是由蘇老師催生與指導的，當時我在裡頭擔任指揮的角色，我們曾在新竹的國民戲院公演過；二、由蘇老師與黃友棣所寫的竹中校歌也是先由這個合唱團練好，在週會演唱後由全體師生選定的；三、我曾是蘇老師女公子綠萍負笈美國時短暫的監護人；四、我曾經拼了命地模仿蘇老師的字體，學到令人真假難辨的地步，但最近連續兩次收到蘇老師書翰，我們倆人的字卻已顯得互不相似了。蘇老師不幸患有巴金森病，筆跡微微顫抖，看在眼裡使我百感交集，但昔日的字跡與才華仍然可辨。過多年之後，我們師生倆人的字跡已如此南轔北轍，正反應我們各走了數十年不同的路徑，經歷了不同的人生。但不管這代表多少滄桑，蘇老師仍舊是我心裡的達文西。

從一個典範學習有其極限，該學的都學了，這時就可以提升自己而另找「新歡」——新的典範也無妨。舊典範的影響是停了，但對舊典範的敬意更要加倍，因為他是建立你一生有份的人之一，怎能忘掉感謝之意？我對蘇老師的敬意仍在，但因空間的改變，到台北念台

大後，每次週末回到新竹，到蘇老師的家裡談



蘇森墉老師晚年照片。

天的習慣漸漸不再了。後來我開始覺得台大裡也有一教授稱得上是我新的典範。

那是林宗義教授，據稱他在約二十七歲就從東京回台灣建設台大醫學院精神科，將該科弄得有聲有色，在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前，林宗義教授還在世界衛生組織做過重要的職務。他造就了不少後代而因此桃李滿天下。他的父親是台灣的Ph.D.先驅，在二二八事件時神秘失蹤，後來才知道他已經被槍決。林教授是風度翩翩的學者，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碰到他，都會知道他是一位教授。他的外文已經到精通的程度，而學者的台風是他的長處，我當然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樣。

現在我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我六十多歲的時候曾經寫了封英文信，表示他曾是我的典範，使我暗地裡受惠很多，他也寫了一封很溫馨且充滿感謝的信給我，我將此段往來視為一佳話。

##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對我們的家庭影響很大，所以不得不在此一提。我大哥是主張斯巴達式的，是一切都照規矩而嚮往軍國主義的人，他崇拜早期的希特勒，而日本的社會制度則很多都學自德國，自稱為東方的德國，大哥對此頗為心怡而雀躍。他對希特勒初期能發明建設高速公路印象尤深。我大哥的這種傾向，當然身為竹中的老師故不能表態太明，但他對大陸來的人所持的態度明顯和別人不同，帶有歧視的味道。

我們當時住的宿舍共四棟，兩棟一排座落在省立新竹醫院旁，隔壁是台灣女性嫁給大陸人的一家，當然不會引起我大哥的尊敬。斜對面也住了一戶姓陳的大陸人，他沒家眷，不管單身來台或是還沒結婚，反正是一個人佔住了一棟房子。這姓陳的年齡與大哥相差有限，更惹得大哥的反目與鄙

視。

西元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很快地波及到新竹，但據我所知，大哥沒有親身加入暴亂。那時有一位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曾在日本岩波文庫做事的文人名叫黃金穗，黃先生是我大哥的摯友，他倒是親身參與。有一天晚上，他全副武裝，腳穿長統靴，來告訴我大哥戰況。黃金穗當時在台北的延平中學當老師，後來轉職新竹女中。由於日式房子隔音效果不良，而且蓋法是一棟挨一棟雙併的，因此當天晚上的對話，隔壁家都聽到了，這讓他們有情報可以向上面報告。當然對面姓陳的也在伺機報復，但我不相信這是唯一的遠因，我大哥平常的態度，以及我三哥在二二八時期在人去樓空的姓陳的家裡靜讀都可能是，誰知道呢？反正二二八時期是趁機打劫或張家的仇找李家報的時候。

二哥在台中師範求學，跟著他的同學一起作息，比較不受家教的影響，他曾經參與什麼活動我們當然無從知道，但也受了連累。

陳儀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之後，二二八的情勢改變，國民政府佔了上風。有一天四點鐘左右，家旁來了一部吉普車，走下兩個彪型大漢進了我們家，母親一邊拭手一邊向前問：「您們要



李克承照片。

找誰？」這時大漢們說要找黃崑耀，母親不疑有它，叫來在後院做事的大哥，大哥放下手上的東西前來寒暄，正中大漢們的下懷，就這樣被帶走了。當時新竹有位日本長崎醫大畢業的醫生，名叫李克承，大家都叫他李博士，跟我們一家人頗為親近。他於大哥被帶走後五分鐘急匆匆地到我們家裡，他目睹大哥被大漢陪著上吉普車載走，覺得事情頗為不妙，於是來警告我們。可是老實而不知情的母親還對現實問題掌握不深，只覺心裡怕怕的。大哥就這樣被帶走了，連逮捕狀都沒有呢！（這一過程，我三哥的記憶與我有所出入，但這裡依我的記憶為故事的主體。）

話說那天晚上半夜，由里長林先生陪同蒙面的三、四個男人，把我們一家人叫醒，面向牆壁排成一列，對家裡做了一次徹底的搜索洗禮，連我父親在新竹縣政府供職一點都發生不了作用。

里長林先生是我竹中同學故林資賢的父親，但這又有什麼用呢？幾個大漢們翻箱倒櫃，弄得整個家裏亂不堪。我四姊還責備了這幾個大漢一番，想爭一口氣，但卻換回了幾個巴掌。整個家被搜索完畢，這些大漢們叫我二哥吃碗飯，穿上衣服跟他們一起走，二哥只好照做。就這樣不到二十四小時，兩個哥哥都無故鎖鑰入獄，大哥被關了四十五天，二哥關了十五天，四姐因為父親認為風險太太，故送回後龍大伯家裡躲一段風聲。而我們家呢？可以說因而傾家蕩產。

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大哥被捉去後，可能是由新竹市警察局的後門進去，一過了後門，頭上就被蓋上一條毛毯，因此不知被帶往警察局的何處，只知道之後是一連串的拷打。說拷打也不對，因為沒有問話，也無從答起。拷打最難受的是叫他坐在一張板凳上，背靠牆，雙腳伸直，上放一橫桿，一端各坐一人以施加壓力，上身則用槍座硬壓。打得我哥唉叫連連，等投入監獄裡的房間時，一雙大腿已腫到非得由在同室坐牢的人設法把褲管剪開才可舒緩。那時我們也不知大哥可能是受到對面姓陳的或隔壁的那一家的陷害，或是單純的報復，反正過了幾天以後，好不容易才曉得大哥何在。那時真是風聲鶴唳，天氣又冷，一家人大夥兒白天也躲在棉被裡等看事情的演變。新竹以風大有名，任何的門窗因為風的吹動發出聲音都會使我們膽顫心驚。母親是很誠摯不渝的人，曾經到過

新竹南門派出所去跪過幾個「領導人」要求釋放我大哥和二哥，但也不得要領。

這時，大姊夫再婚的妻子玉梅（與大姊已經辭世而做鱷夫的姊夫再婚的玉梅嫂嫂）在傳遞訊息上發生了一點作用，原來大哥、二哥是不准與外界，包括家人互通消息的。我們都用綁在襪衫鉗鉗的捲小信紙來與他們聯絡，就像小說一般，但這種溝通方法很費時費心思。不久之後，警察局裡貪腐的情況一一呈現，大哥與二哥相比，逮捕大哥的人要比較厲害；那時用的手法是先說大哥在第一科，等第一科東西和錢拿到手後，就把大哥交給第二科，第二科如法炮製以後又輪到第三科揩油。揩的油各科不一，例如說消息傳來第一科科長的太太要一台縫紉機，到了第二科會傳來消息說科長的太太要一枚戒子等等。等到警察局揩完了油，他們又說大哥交給了憲兵隊，這讓本來就不是怎麼富有的我們，很快就傾家蕩產了。這使我想起柏楊在其回憶錄中所言：「不，這是恐怖下的產物，中國人沒有管束自己的能力一般。當時的政治腐敗到極點，而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軍風紀蕩然無存，國軍和土匪海盜沒有分別，不要說從來不排隊，甚至從來不買票。」（請參考《柏楊回憶錄》

二哥的「罪狀」較輕，因為他大半的時間都不在新竹，而新竹與台中似乎沒有靈通的內應互



## 從歷史系到醫學系

我雖然是在竹中表現優異的學生，但從未得到班上第一名，更遑論不是同班但同期的學生。在我們的班上，最多我總是第二名，班上的「狀元」是湯廷尉同學，他真是聰明過人的學生。但我的長處就是我比較廣，廣的程度雖比不上我三哥，也沒有像他一樣深化各領域，但他和我的長處不同，我較能包容他人，和別人的關係較好。

竹中那時有從初中部念完後直升高中部的制度，但我並未名列其中，必須和別人筆試競爭，成功了，才入高中部。我認為這也表示我程度不夠，考高中對我仍是囊中物，我也就這樣進入了竹中高中部。

我在竹中高中更是鋒芒畢露，玩了不少，也念了不少書，我也漸漸地看出自己的興趣之所在。那時有一位教歷史的趙老師，我對他的歷史陳述特別入神；我生性愛歷史，看別人的自傳是我的最愛。

竹中沒有依照性向而分班，我高二時已經下定決心要考歷史，以歷史為一生的軌道。後來事

與願違，並沒有投考歷史系，不然依我的聰慧程度，大概靠歷史吃飯是沒有希望的。最近台大的黃俊傑教授也慶幸我後來沒有投考歷史系，他說學歷史猶如在高速公路開車，一小時一百公里也開，五十公里也開，是很苦的事。我開小車上歷史這高速公路大概只能開八十公里。

竹中既不分班，那時也沒有所謂的聯考，沒有人好商量，而下定決心是個人的問題，我硬是準備考台大歷史系，結果被大哥南下新竹臭罵一頓。

眼見台大和幾個學校的考試只剩三個月，已迫在眉睫，大哥有一天從台北南下新竹，到了家就捉著我訓了一頓，他說：「研究歷史將來想吃什麼飯？」想起來也對，我一九六三年負笈美國，目睹塔克曼 (Barbara W. Tuchman) 之類的大眾歷史家，為大眾說文解字，提供從外國人的眼光看慈禧太后、康有為、蔣夫人、義和團之亂等書。這些書是大眾必要的作品，也要一定資料的蒐集及分析，這也是歷史家的責任。但這一群大眾歷史家都受到真正歷史學家的鄙視，如果我學歷史，大概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這和我之後雖學醫學但也沒有成為醫生從事醫業是同一個道理。

大哥那時已經從二二八的陰影走出來，開始展現他的組織能力而成了南港輪胎公司的創辦人，因此他的話更有了份量。在二二八事件受盡苦頭的他，現在卻連手下的國民黨員也管，由他口中娓

娓道來，這些事特別有味道，也看透事情時過境遷就大不同的道理。當時他替我出了主意說：「你準備投考醫學好了！」

我那時也等於沒人商量，嚴肅的家裡，有這麼一位對家庭最後希望的老公這麼關心、期許的大哥，也是一個福氣。我只好放棄了考歷史系的念頭，轉而準備醫學系的考試，如上文所述，這時距離台大的考試只剩三個月。



## 第二部 醫學之路

我不一樣的人生  
|黃崑巖自傳|

## 踏入醫界

很多世界有名的教育家都開始覺得要一個高中畢業生選擇生涯工作是太早了一點，台灣的現況就是如此。但這也要看小學與中學以及整個社會的學問水準與素質，像台灣一樣的社會水準，怎能比得上英國或美國的情況呢？這是現實的問題。

我是一九五二年竹中畢業的，那時覺得像樣、可以報名投考的學校不多，只有國立台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省立台中農學院、省立台南工學院四間。我報名投考了兩間學校，第一是台大醫學院的醫學系（叫醫科），第二是念都不想念的省立師範學院數學系。那時候聯考這玩意兒還沒有人提議，每一間學校都是單獨招生，還記得國文考試得自己帶硯台、墨以及毛筆。試題就不是考入竹中時那麼簡單了，雖然國文也受了六年的薰陶，現實環境也不同，人也不同了，但我考入台大醫學

系的本錢還是靠英文與數學，這兩科的分數特別高而救了我，這也同時要感謝彭商育老師。

## —彭商育老師—

我與竹中彭商育老師的關係橫跨竹中與台大，特別值得大書特書。彭商育老師是湖南人，與毛澤東同鄉。他普通話的口音很重，我現在跟他談話也是非懂似懂的，以這個普通話的程度，怎麼使彭商育老師在竹中嶄露頭角，再能成為名震全台的數學名師是個謎。我猜想有一個原因，是他會把他要講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在黑板上，而且他寫在黑板的字清晰可讀，故方便了許多學生。

他也用鋼板把他所講的寫成講義，而我因為寫得一手好字，被選為寫鋼板的主要人物。所謂鋼板，是電子郵件與傳真機問市以前的東西，用的是一種半透明薄膜臘紙，以鐵針筆在糙面鋼板上刻寫，然後以油印機印刷。刻寫的力道和手寫的筆跡，是決定這份印刷是否清爽宜眼的主要因素；而一張臘紙的耐印程度，通常不超過五百份就報廢了。寫鋼板字要寫得漂亮以外，還有要件，就是要將寫鋼板用的臘紙鋪平，以極細的筆在上面寫字畫線，看得出所寫的東西，這也是以前出版商除打



與竹中同學合影，中坐者為彭商育老師。

字印刷以外出版刊物的方法之一。我就是負責為彭老師寫解析幾何的講義，以利他溝通的人物，當然這些事都有報酬的。

這工作持續到我到台北後的一段時間，後來怎麼停止的我已不記得了，不過在尚未結束之前，台北新竹間的來往都是用紙筒的，而因寫鋼板所獲得的收入，添補了我不少零用錢。

## —幣制改革—

那時候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很壞，通貨膨脹已在上文提過，弄到後來不管是旅遊、薪俸都是節節上升，連我父親的薪水也變了一個樣。

那時候的薪水是現款帶回家，後來所領的錢多達百萬元，連用扁擔搬都有點困難，所以後來改

發所謂的銀行本票。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對政府來說，通貨膨脹是經濟政策上的一個癌，它控制失靈，政府會因此垮台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記得那時四姊在台灣銀行就職，有一天她下班回來，

說幣制已經開始變革了，當時統治台灣的行政長官是陳誠，他把台幣分成舊台幣與新台幣，呼籲民衆把舊台幣換成新台幣，兩者的比例是四萬元舊台幣等於一元新台幣。

好在這幣制改革並未引起像金元券在上海的擠兌，金元券制度的成果可以說是曇花一現，台灣當時的幣制改革沒有搜刮黃金的意圖，金元券事件據稱到底還是搜刮人民黃金勾當。那時候的台幣與美元兌換比例是一比三十六，但在黑市的兌換率是一比四十六上下，這樣一看，美元也經歷了不少滄桑。美元在我一九八二年回台後，依照後來採用的活動匯率，曾經掉到二十五塊多新台幣呢！

## —北上求學—

我搬到台北註冊而入了台大的醫學系，住的是位於信義路與新生南路交接處的大華莊，而不是宿舍。大華莊是日式的兩樓公寓，一個單位只有一個房間，廚房是共用的。我大哥結婚後搬到台

北，後來雖然飛黃騰達成爲南港輪胎的創辦人之一，但這都是幾年以後的事了。他在大華莊受了很多苦，而且幫助了當時還在念台大經濟系的三哥及我住宿與食的問題。

與三哥分租的是叫楊金龍的一個公務員，而我住的是二樓的一個房間，與我分租的是一名叫黃國忠的心理學系畢業的老師。所有的房間都只有四塊榻榻米大，在這麼小的房間，我大哥要維持他們一家（嫂嫂及長子鴻欽、長女玲燕）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我和三哥曉得這件事情卻說不出口，這是家風使然，無可奈何，我嚴守家訓，行爲從未出軌，這是母親幾句訓話的結果：「你知道在心裡就好。」

黃國忠是蘇鄉雨教授的子弟，蘇教授因出身新竹，故我們都非常瞭解他的底細。上文說過，我竹中的鄰班好友傅偉勳，後來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的高材生，因爲哲學系與心理系關係密切，傅偉勳對黃國忠私事更是瞭若指掌，例如黃國忠對自己的月薪毫無節度，到了月末總是沒錢，每天日夜皆睡覺過日子是他很熟習的事。總之黃國忠是一個怪人的事實，傅偉勳及其同黨人，包括我皆清清楚楚。後來黃國忠找到位在台中的一家精神病院的工作，消息傳到台大，傅偉勳一黨知道黃國忠入了精神病院後，喃喃地說：「想不到這麼快他就入院！」其實，黃國忠是爲了從事心理治療的工作而

去該病院的。

整個台北市當時還沒有發達起來，沿著新生南、北路的瑠公圳尚未加蓋而暴露在陽光底下，新路被分為兩條。瑠公圳後來還因為一起分屍案上了報，成了台灣治安變壞的警訊。我一天就沿著新生南路騎腳踏車上學。

## —父親的逝去—

我們聽到父親的噩耗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清晨，住在台北大華莊的每一個家人都一起搭了公路局的國光號，一路晃回到新竹。那時公路各段尚未鋪成柏油路的路段還很多，台北新竹段就是其中之一。

父親未能等到我成家立業才辭世是我一生很大的遺憾，其實我們住在台北的一群人都錯過了見父親最後一面！他患有高血壓但未經過治療，怕的是會花錢，影響家計。在這個情況之下還每天騎腳踏車到新埔上班，病重時才請來李賢豪醫師。李醫師是我四姊嫁去的夫婿，念了日本的醫學校，當時我們一家人就照著台灣的習俗為父親舉行了葬禮。

醫預科課業輕鬆，我的腦筋馬上就動到課外活動上。那時台大已經有一個合唱團叫友愛合唱團，英文叫Glee Club。友愛合唱團的歷史悠久且傳統已經建立，團長及指揮是電機系的林一，電機系畢業後，他放棄了專業而改學電子音樂。友愛合唱團既已存在，於是其他在中學時就愛好音樂，尤其是合唱團的台大新生們於是另起爐灶而組織了鐘聲合唱團，後來還辦得有聲有色呢！

鐘聲合唱團的創辦人是建國中學的畢業生黃維寧，他是一位患有氣喘的同學，他糾集了一些建國中學畢業、愛好合唱的同學來找我，畀以第二指揮之位。我本來就喜歡合唱團，故欣然接受。因為我也擅長寫鋼板，還記得鐘聲合唱團的樂譜都是我寫的。那時的團員有男高音的施敏生、台電總經理黃輝的女兒黃紫金、後來成爲榮總醫院護理長的王唯，以及很多現在已經記不起

的名字。每年兩次的音樂會裡，我會指揮過「我要歸故鄉」，這是首很大的曲子，黃維寧則指揮合唱團唱過黃自寫的「長恨歌」。

這好景持續了兩年，每次練習皆在台大的普通教室，那時的團員出席率非常高，可見大家熱心與認真的情緒。

醫預科是現在醫學系的預科，醫學系要念七年，我們入學當時的一九五〇年代，前兩年醫預科屬於理學院，這是台灣（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的「雜交」而成的制度。一九一〇年時，美國醫學教育的改革者已經把美國變成世界醫學的王國，而所有美國的醫學院皆成爲後醫系，比起我國的醫預科，美國的醫預科等於是大學的四年，比我們還多兩年。

但醫預科再短也值得，在醫預科，我們學了普通大學的核心課程，即國文、英文、國父思想、近代史、化學、物理，此外更學了動、植物學、微積分、有機化學、分析化學、德文、拉丁文、心理學，以及比較解剖學等。這些知識有的後來對醫業有用，有的卻一點用都沒有。但我特別喜歡拉丁文及德文。

上文說過語言是一種工具，是做學問的基礎，我至少掌握了這一點，於是乎我特別下功夫學

了拉丁文及德文，這兩種語言的認真學習最後都發生了良好的效果，尤其在解剖學及微生物學方面。很多人，尤其是學士後醫學系的學生認為微生物的名字很難記，但如果知道微生物名稱的拉丁文、德文或英文的來源，記這些名字就可以事半功倍，並不很難。周學普教授對教德文有特別的要領，上文也說過，我跟他學德文，在一年以後，即第二學期的期末，已經帶著我們讀《茵夢湖》(Immensee)。《茵夢湖》的作者是史東(Theodor Storm)，故事繞著伊莉莎白(Elisabeth)及蘭哈特(Reinhardt)而展開，是一部纏綿的文藝小說。

台大的英文課當時是以入學考試的表現分班的，我被分配到的那一班老師是一位名叫塔克(Mrs. Tucker)的美國太太。我最得意的是我的英文作文、寫故事，塔克女士也很喜歡我的文章，每次在我的文章文尾都寫有相當詳細的評語，而且有許多指正。

記得有一次她在課堂上說：「你們選了講話要小心，昨天是禮拜天，我在台北火車站遇到一些同學，問她們今天做什麼，結果她們的答覆是“*We want go to Yang-Ming Shan to play.*”“Play”這個字不是我們普通話『玩』的意思，是指三、四歲小孩無所事事，隨便大叫跑跳，它並不指成人去陽明山玩的那種『玩』。另，“play”如用在成人，則戲謔、操縱的意思較多。」這使我楞了一下，

這是選錯一個字，講出口了就禍從口出的一個好例子。

塔克女士非常重視英文的重音，外國的字和中國的四聲相似，也有抑揚頓挫，但外國字沒有嚴格的四聲，頓挫語氣不對的問題比起中國的普通話不嚴重，但不能就此一概蒙混過去。我一九六二年負笈美國時，就會因“police”一字的重音不對而搞了半天對方還聽不懂，以致與對方的溝通中斷的經驗，要知道“police”的重音在後半段。

學外文最重要的原則是外國人怎麼說，學習者就怎麼說，切勿標新立異。任何語言發音方面都沒有標新立異之餘地，只有在寫成文章時才有製造新名詞的可能，唸的時候還是照習慣用法唸它。譬如說李敖曾經把陳文變成動詞用，唸這文章的人都明白李敖在說什麼，是好例子。

## — 學習與現實運用 —

上文說過，我不知道在醫預科所學的東西什麼有用、什麼沒有用，不過所學東西的內容和現在大不相同是真的。最近有一位美國作者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美國大學的醫預科所教的與他們之後

從事的醫業不合，這是真話。我相信台灣的各醫學院都在改革，只是改革的步驟與內容有點太慢而已。譬如說，他在文章裡就問微積分有沒有用？我們念醫學系的時候學的統計學和現在的統計學完全不同，要知道每一種疾病都有一個統計相，而統計學已經成了每篇文章必具的成分。

雖不屬於醫預科，微生物學及生化學也有了徹底的改變。微生物學的病毒學方面，以前可能在三個鐘頭就打發完了，現在則變成一本書了，醫預科的老師們不能不特別注意。在台灣最受詬病的缺點是社會學，美國愛滋病防治協會的負責人弗斯特（Mr. Foster）就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中指陳台灣一般大眾對台灣的社會瞭解不深！

什麼叫社會？社會是生活共同體，它的文化與作爲或表徵都是共同體成員行爲規範的累積。要知道，台灣只是一個島國，控制疫情很容易，但我們對這共同體的文化，即社會學卻瞭解不多。弗斯特先生舉的例子很簡單，他說他參加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的國際愛滋病防治會議三天，在他下榻飯店的隔壁有一家三溫暖，他去該三溫暖看個究竟，因為國際上已經知道三溫暖是男同志經常出入的地方。結果進了店，老闆就給他一個禮物，他打開這個禮物，裡面是三支香菸。他說如果三溫暖老闆知道三溫暖是愛滋病傳染重要據點的話，送的禮物應該是三個保險套而不是三支香菸，遑論告赫爾辛基有關捐贈器官給別人的規則改了四次？

## —與太太邂逅—

我們班上一共有七十個人，這是學校規定當時每年培養的醫師數目。那時台灣的人口只有八百萬人左右，每年培養七十位醫師來彌補因退休、辭世而流失的醫生人數還夠。現在台灣的人口已膨脹到兩千三百萬人，但近年來因為出生率降低而人口已逐漸下降，因此，現在的政府，尤其是衛生署，訂的培育上限是一年培育一千三百位醫師，並未改變，這需要多所醫學院一起用同樣的標準來設校並推行醫學教育才可。澳洲的人口和台灣的一樣，故該國的醫學教育政策可以借鏡，澳洲也有十一所醫學院，與台灣可以相比。

一九五二年我進台大醫學院醫學系時，只有七十位準醫師，而醫學院只有一所，就是台大。七十個學生中有七位是女生，恰佔有一成。現在社會上講求男女平等，上次到英國的利物浦看到那裡的大學醫學系男女學生之比為男學生三成、女學生七成，醫學顯然對將來會成為家長的男性正逐漸失去魅力。我認為這背後主要的原因是醫師自主性的侵蝕，在美國，醫師漸漸被稱為醫療服務（medical service）的提供者（provider），在台灣則醫師開藥還得看健保的臉色呢！

話說我們班上的女生原本有七個人，不久過了兩、三年就走掉三個，剩下四個人，這是畢業時的女生數目。其中有彰化女中畢業的謝惠美，是使我神往的一位，她舉止溫雅，看得出是上層家庭出身的大家閨秀，她的美贏得一部分同學校花的稱呼。她很瞭解別人的心思與心路歷程，所以能博得別人的愛戴，而刻苦耐勞與勤儉更是她的美德，她並不花大錢買流行的女裝，整個人顯得很樸素宜人。我也不是因為念醫學系而想趁結婚撈一筆的人，所以很少去管她的家產問題，我深信自己的家產要自己累積，不靠別人賜予才來得有意義。

她更大的特色是她的現實性，事事她都講究效率、實際的應用，因此她的點子特別多，在這方面是點子王前成大校長吳京比不上的，這個特性，在我們的女兒先後出生之後明顯地發揮。總之，

她有完美的人格使人喜愛，但這並非指她是完人，其實她與別人一樣，多少有缺點是難免的，但日人有一句話說：愛上什麼人，那個人就是有不平的麻子臉，也會覺得它是滿臉酒窩。我在四年級時正式邀她出去，這一舉動，在國外叫做“dating”，dating在彼邦是發現對手的機會，但在台灣dating時男女方都已經有某種程度的默契，dating等於是把事情公布於眾，所以那時候相偕出遊並不是簡單的決定。

我曾經介紹惠美於我母親與二姊，她們都到台大醫學院來，談了一些話，當然我母親與二姊並無所求，故並不表示反對，反而對惠美讚賞有加。但惠美的父母親及兄弟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知道她父母親也是醫師，不但如此，她的祖父、叔叔、舅舅、哥哥、妹婿及後來大專畢業的弟弟們全都是醫師，弄得我們兩家差距頗多，難怪輕度反對之聲此起彼落，或說我臉色難看，恐怕是貧血；或說我出身苗栗縣，恐怕是客家人，嫁女兒給客家人家庭，會很苦。客家家裡的女性需要特別耐苦而勤儉是事實，但我壓根兒就不是客家人也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兩家後來無形中承認了這個事實，我們則交往了七年，於一九六一年結婚。相偕出遊七年才結婚的事在國外是絕無僅有的，我們三個女兒也這樣說。等到結婚時，形式上也要紅娘拉線才可

以，這一紅娘台語叫「便媒人」，當時的紅娘是我的表兄杜世彬夫婦。我的表兄有一個很能幹的兒子，是神經外科醫師，就是在台大服務的杜永光，他曾經警告我這樁婚事因為兩家懸殊不同，故我這位大女婿難做，要小心。我很感謝他的關心，但並未將此放在心上。

## 萌生放棄的念頭

念完了醫預科就開始進入醫科本科。我一直以為醫科是很容易念的科目，因為它的軌道是固定、別人替你鋪好的，以一個學生來說，只要能每次考試都通過，到時自然就有畢業的一天。這很像後面有一個人在推你一樣，我也稱這種教育為「套餐教育」，以別於「單點」的非醫學教育。這也表示，醫學系學生如果不發展充實自己的有效方法，他的視野會很窄，這種後果可以從醫學生很少離開醫學軌道一事一窺究竟。醫學院畢業生比起經濟系、法律系以及其他各系的專校學生，較少脫離專業軌道，這是一個自然的後果。

我搬到醫學院的宿舍，開始了學醫的生涯。第一年要學解剖學、組織學、胚胎學、生化學等人體正常的基本構造。這是記憶與理解混合的學問，但是忙得一塌糊塗，這恐怕是誰都會開始問當初

為什麼決心學醫。我們偶而也會去看西門町的電影，但看電影得一個禮拜以前就事先安排，到時候連攤開的書都無法闔起來，一說走就走，晚上看書到兩、三點鐘是很平常的事。我覺得在醫預科裡學的拉丁文及英文馬上找到了用處，使我很稱意。

第四年念了微生物學、病理學、生理學、藥理學，以及診斷學等漸漸像醫生的學問，尤其是病理學。改進美國醫學教育的亞伯拉罕·佛萊斯納（Abraham Flexner）在他的自傳中透露：「醫學服務的中心是病理。」故受他很多稱讚的約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醫院，第一任的醫學院院長找來了威廉·韋爾契（William Welch），是一位病理專家。佛萊斯納請教德國有名的維蕭（Virchow）有關病理的重要性時，他告訴佛萊斯納：「一家好的醫院應該以病理科為中心，換句話說，一家醫院的病理科好，則該醫院的各科都會好起來，我自己的內人學了病理學以後我才徹底地瞭解這話的意義。佛萊斯納的兄弟名叫賽門（Simon Flexner），是洛克菲勒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的院長，他也是一位病理學家。」

原來病理科像是一家醫院的警察，譬如說，某外科醫師經常動切除闌尾的手術，但每次口說不正常的闌尾，經術後病理科醫師檢查而發現其實是正常時，病理科就會在適當的委員會把它提出來謹慎，能三思而後行。當然學了病理學以後，心裡就覺得更像醫師了。

## —缺少兩性學習的醫學教育—

診斷學學到如何看病人，課堂的練習對象是男同學看男同學，女同學看女同學，換言之，女同學只有四個同學可看，因為女生人數本來就少，故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我們都仔細地學習診斷學，因為這攸關以後的專業，所以不能馬虎。

醫科第五、六年級在國外稱為“clerkship”，五年級生稱為“junior clerkship”，六年級生稱為“senior clerkship”。五、六年級從大科（即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小兒科）以及小科（包括耳鼻咽喉科、眼科、精神科）等，還有我還是學生的時候不一定有的現時有的科（最好的例子是復健科）

都要學，但反正醫學基本上是通材教育，什麼科都要經歷一番。

那時有所謂的教學門診，規定學生在實習時要每一個早上看兩個病人，診斷、檢查與處置都要上面的醫師檢驗過。輪到我的那番的醫師是楊思標，來的病人都畢竟是幾歲的女性，我們男學生根本沒有學過怎麼看女性病人，連如何下手都不曉得。只見這位有胸痛的女病人坐在病人坐的椅子上，拉緊衣服不知道我下一個動作是什麼！後來勉強地看完了病人，我記得向楊思標報告這位女病人可能有右氣胸，需要照之張急診的胸部X光片。結果片上也明白地顯現右胸部邊緣有帶狀氣胸，使我覺得信心大增，楊思標教授也稱讚不已。

最近兩性平等的話題甚囂塵上，老實說，台灣醫學教育要改革的範圍太廣，兩性平等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塊而已。我這不是說兩性平等不重要，兩性平等委員會裡的女委員也很能捉住重點而予爭取，但兩性平等要延伸到什麼點、時，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如果主張兩性平等的人士聽到一九六三年我負責的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裡有男同學看女同學，女同學也看男同學，最重要的是連A片都看的話，會嚇一跳嗎？

當一個醫生一定要知道所謂的“Bedside manner”，但台灣當時的醫學教育對這方面卻抱著「人

云亦云」的態度，一切都是「聽說……」，完全沒有實際的了解。要知道沒看過A片的話，在急診時是會有糗事的，因為很少人知道男女性交，除非有過經驗，不然想都不會想到。有一次我在急診處接了一位女病人，主訴是肚子痛，痛點在下腹部，原來她因為懷孕回而屏東娘家生產及坐月子一個月，等坐完月子才回到台北與先生碰面，久違的先生一定是等得望眼欲穿，碰到太太就做起激烈的性動作。這我還不懂，結果不得不請婦產科的老手李鍛堯教授幫忙，一經內視，子宮周圍的組織已破，腸子都看得見，表示陽物沒有去處而弄破了子宮旁的組織。這麼簡單的事都不懂，使我一心氣餒，但反過來說，性交是什麼事，經過這一番指教以後，收穫很大。所以我覺得喬大的做法雖然有一點逾越，但大方向是對的。但我偶爾也會問自己，性經驗比東方人多的白人學生是否有這必要的問題。

後來我在做實習醫師的時候也發生了人云亦云的趣事，讓我印象深刻，必須在此言及。原來外科住院的任何開刀，術後一定要有詳細的英文紀錄。寫這種紀錄有一個不成文的格式，每一個病人開刀的共同點可以照抄別人前面所寫的東西；一般手術的紀錄會始於哪一部分的皮膚消毒，把無菌被單蓋好後，以多少的切口向哪一個方向切入，等出血點一一停止以後，再一層一層地下

去，終於達到亮亮的黏膜是腹膜，腹膜用位於左右的夾子夾起張開之後，一切開，一般有多少的液體溢出……。「溢出」這字因為照抄，別人寫的前文皆用“*flew*”，於是我最初照抄別人的紀錄時，也犯了這個毛病。等第二次再抄別人的前文時，就覺得有點奇怪了：“*Flow*”的過去式明明是“*flowed*”，但因為“*know*”的過去式是“*knew*”，故很容易把“*flow*”也當作是不規則動詞，而變成跟“*know*”一樣的變化，但忘了“*flow*”是規則動詞。如有兩百到三百西西的液體，趁著打開腹膜時「飛」出(*flew out*)，我現在猜想，這應該是在太空艙的無重力環境中才看得到的情景。所以我說這是人云亦云的最好例子。

那時學生及實習醫師(Intern)都得做血、尿以及病人大便的檢查，由於還沒有機器問世，所以所有的檢查都是手工完成。現在的clerk(以前叫實習生，現在叫實習醫學生)及intern(實習醫生)要學的也多，但是單子一開，什麼都可以用機器代勞是當時想不到的事。這個問題的缺點是現在的醫師有的不知檢查背後的道理，這是老一輩的醫師知識比較深化的一面，但大意失荊，有許許多多的其他面卻輸給年輕的醫師。

## —精神面的教育—

我可以說，我們受的教育一點都談不上什麼精神教育，我們根本沒有聽過現在常被提出來談的「隱藏的課程」(Hidden Curriculum)，連希臘的希伯克拉底斯誓詞也聽都沒有聽過。醫師在病房就像皇帝一般，是有權威性的，就像一位外科主治醫師曾豪語說：「這個刀開不開，完全看我那天早上的心情怎麼樣！」這表示這位主治醫師在移除病人胸部的惡性腫瘤時，並沒有一個國際的標準，但這恐怕很多國家都是如此。成大有一位優秀的學生名叫何雅琦，她在我生日那天送了我一本英文書，書名赫然是《盡可能不殺死一些病人》(Kill as Few Patients as Possible)，現在想起，那位主治醫師應該精讀這本書。姑且不論精讀不精讀，問題是我們那時候所受的醫學教育就是那麼一回事，身教幾乎等於是很少的一部分。難怪美國有一位世界有名的醫學教育家說：「醫學無法教，但可以學。」這句話的內涵是對住院醫師以及所有主治醫師的警鳴之聲，因為底下的學生主要都在看上級的醫師在做什麼！學習是模仿，俗語也說有樣學樣，就是這個道理。

就說科學論文好了，每篇科學論文都是作者或論文的題目先見人，然後有一系列的數目字及分

去，終於達到亮亮的黏膜是腹膜，腹膜用位於左右的夾子夾起張開之後，一切開，一般有多少的液體溢出……。「溢出」這字因為籲抄，別人寫的前，“flow”於是最初照抄別人的紀錄時，也犯了這個毛病。等第二次再抄別人的前文時，就覺得有點奇怪『flowed』的過去式明明是“flowed”，但因為“know”的過去式是“knew”，故很容易把“flow”也當作是不規則動詞，而變成跟“know”一樣的變化，但這“flow”是規則動詞。如有兩百到三百西西的液體，趁著打開腹膜時「飛」出(flew out)，我現在猜想，這應該是在太空船的無重力環境中才看得到的情景。所以我說這是人云亦云的最好例子。

那時學生及實習醫師(Intern)都得做血、尿以及病人大便的檢查，由於還沒有機器問世，所以所有的檢查都是手工完成。現在的clerk(以前叫實習生，現在叫實習醫學生)及intern(實習醫生)要學的也多，但是單子一開，什麼都可以用機器代勞是當時想不到的事。這個問題的缺點是現在的醫師有的不知檢查背後的道理，這是老一輩的醫師知識比較深化的一面，但大意失荊，有許許多多的其他面卻輸給年輕的醫師。

## 精神面的教育

我可以說，我們受的教育一點都談不上什麼精神教育，我們根本沒有聽過現在常被提出來談的「隱藏的課程」(Hidden Curriculum)，連希臘的希伯克拉底斯誓詞也聽都沒有聽過。醫師在病房就像皇帝一般，是有權威性的，就像一位外科主治醫師曾豪語說：「這個刀開不開，完全看我那天早上的心情怎麼樣！」這表示這位主治醫師在移除病人胸部的惡性腫瘤時，並沒有一個國際的標準，但這恐怕很多國家都是如此。成大有一位優秀的學生名叫何雅琦，她在我生日那天送了我一本英文書，書名赫然是《盡可能不殺死一些病人》(Kill as Few Patients as Possible)，現在想起，那位主治醫師應該精讀這本書。姑且不論精讀不精讀，問題是我們那時候所受的醫學教育就是那麼一回事，身教幾乎等於是很少的一部分。難怪美國有一位世界有名的醫學教育家說：「醫學無法教，但可以學。」這句話的內涵是對住院醫師以及所有主治醫師的警惕之聲，因為底下的學生主要都在看上級的醫師在做什麼！學習是模仿，俗語也說有樣學樣，就是這個道理。

就說科學論文好了，每篇科學論文都是作者或論文的題目先見人，然後有一系列的數目字及分

號等記號。請捫心自問，有人教這些記號是指什麼嗎？如果有課程在教這些數目字的意義，我想知道！這些學生來自高中，高中根本都沒有這種課程，若又碰上不用心的課程安排，把這種解釋在醫預科或醫學的課程漏掉的話，這種知識就只能從自習或經驗裡習得，別無他途。

台大的蔡甫昌教授也曾經提出主張說台灣及中國的醫學倫理裡沒有病人自己的自主性（autonomy），而代以家族全體的集體決定較多。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看法，但問題是，台灣的醫學教育誰注重倫理與人文？哪一間學校或醫院在推行有效的床邊規矩？我們那時受的醫學教育甚至沒有這種名詞！哪裡在教重要的消息，譬如說，如何告知病人最後診斷的「靈耗」等，哪裡在辯論、考慮，或教授這些話題呢？我們醫學教育的落伍就在這一方面。

## — 實習醫師的學習不限於醫學 —

除了學醫學專業以外，有兩件事情應該提起，其一為我與女朋友的交情。我與太太有一份姻親的關係，這一邊學醫學七年一邊成長，那時沒有計程車、電冰箱、冷氣這種東西，所以帶女朋友出車羅曼蒂克的地方，這非計程車時代的人才會瞭解的，下雨時三輪車前面有可供客人拉下避雨的一塊帆布，當然天氣好時也可以拉下來，以免我們的行爲機密洩漏，這塊布遂成了一種「遮羞布」。

醫學也帶給我學下圍棋的機會。原來實習醫師是常值班的，尤其是外科，外科值班時，一定會半夜裡被叫醒去拉勾開做闌尾炎或其他的急診開刀，一叫醒再回籠就不容易入睡，所以一開始就決心晚上值班不睡。值班的實習醫師都不睡的話，要有事可做，這事就是下圍棋，我圍棋下得不像一些人好，但總能找到旗鼓相當的對手。我在美國與台灣都有圍棋的設備。

後來喬大有一批白人學生來自加州，其中有人特別喜歡下圍棋，知道我會下圍棋後，大家都擁上來要學圍棋，甚至還有想學下中國象棋的，像來自東北部的傑夫·衛斯頓（Jeff Wetstone）。有一位叫唐·卡龍（Don Karon）的白人，現任UCLA的教職，他有時日以繼夜在我家裡下棋，下得我頭昏腦脹。他有時換成泳裝，下棋下累了，就踏入我後院自家的游泳池去休息一下。有一次，連我女兒也覺實在太過份了，她向唐·卡龍說：「唐，你太注重下圍棋，荒廢掉醫學的學業，要是留級怎麼辦呢？」結果唐·卡龍說：「沒關係，我吊車尾最後一名畢業，病人還是叫我醫師呢！」

我覺得圍棋是知識分子的娛樂，真刀真槍，一點都沒有運氣的成分。但它像高爾夫球，佔時太多、太久，會把家庭擺一邊而不管，我每次一個人下圍棋後總會充滿了罪惡感。關於圍棋的感觸，將在網球一項敘述（請參照第二二四頁）。

我們就這樣日漸地成為醫生，但隨著歲月的逝走，我對當醫生漸漸生畏，我愈是長大，愈覺得自己不適合這個行業。這可能是因為我天生是一位好老師，而目睹台灣的醫生很少從事教學的緣故。有一位有名的學者曾說：「最好的學習方法是教學。」我也覺得這話講得很對，因為醫業與教學脫節，醫業遂成了純粹技術性的東西，這是違背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等人文主義者所主張的事，而我一向以人文主義者自居。

## 軍訓預官第八期



退伍時照片，1961年。

預備軍官是為大專院校的畢業生所建立的制度，因為他們一路走來都在學校，並未服過兵役。

但等我負笈美國後，所謂的預備軍官制度，雖然英文的譯名縮寫為 R O T C，但彼邦的 R O T C 與我們的預備軍官制度迥然不同，不能相提並論。美國的 R O T C 有如我們的軍訓課，只有登記的人才有一週一、三個鐘頭的軍訓，不像我們這裡的預備軍官那麼紮實而有系統。

我們這裡的預備軍官，首先是體格檢查，再來是分等級。

據稱台灣不去當兵的醫學系畢業生最多，那種避開服兵役的神技是哪裡學來的，我毫無概念。反正那時第八期的預備軍官

是等體格及格了之後就報到接受一年又六個月的訓練，這一年又六個月是很要緊的數字，到了一九六三年負笈美國之後才知道其緣由。我們預備軍官的前半年是在陸軍步兵學校，後來到了在台北芝山巖的陸軍衛勤學校兩個月，最後分發做十個月的服務。據稱這分發靠關係關說的機會頗大，甚至緊張程度不亞於樂透的開獎，我最後被分發到澎湖馬公的海軍第二醫院。

## 分配到澎湖

在澎湖，我生平第一次要獨立行醫，可憐的是那些擠到門診來的補充兵，他們簡直是我們這些畢業醫學生的實驗鼠。雖然我們磨刀霍霍，等著發揮我們所學而帶給海軍醫院新的生機，但不久就發現，門診最有力的武器還是開抗生素，而軍人及其家眷來院的目的也在領抗生素。當軍醫最稱意的是權利比想像的還大，請假單及診斷書簽名不斷，因此軍方各層級都不放過巴結我們的機會。最好的例子是邀我們到軍艦上打牙祭，軍艦上的伙食要比陸上的好一點，所以這種機會也算難得，後來成了常有的飯局。

## 軍中樂園

有一趣聞是很少人聽過的，我卻身歷其境，我自己以前也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回事，現在想起來其實是無可奈何。原來軍中有叫「軍中樂園」的設施，以便解決從大陸過來的單身軍官及士兵的生理需求。有一個週末我恰好值班，早上十點鐘左右電話鈴聲大響，曰附近的軍中樂園有小姐自殺，第二醫院立即派救護車解救等言。我這才明白軍中真有小姐集中的軍中樂園，這豈不等於日本軍隊的慰安婦制度？不同的是日軍是用朝鮮人或台灣殖民地的婦女，而軍中樂園用的是「自願」的賣春女子，而且大部分是原住民同胞的婦女。

我立即跳上醫院準備好的救護車前往軍中樂園，只見兩座油漆過的偌大鐵皮屋，外面各有一個賣票的小亭。這小亭子有小窗口，窗口上面排著標有號碼的各小姐的照片。我問隨行人員為什麼有兩個，不是一個就夠了嗎？隨行人員跟我說因為軍官和士兵不能相混，這似乎是一個重要的軍中基本規則。鐵皮屋當然是我們的目的地，因為那是所有自殺行為發生的地方。鐵皮屋是隔間的，入口處像動物園一樣有旋轉的鐵架子，所有沒在工作的小姐都蹲在正面的牆邊，這就是所謂的軍中樂

園。

我進去一間隨行人員指點的地方，有一小姐滿臉通紅地躺在床上喘息，我料想她就是所謂試圖自殺的小姐，四周則圍起了一座人牆，這些都是當時的顧客。等處理好了這位小姐，我就離開了，但我有生以來就這麼一次，目擊軍中樂園的真面目。

在步兵學校時，我那一連上有一指導員一直勸我入國民黨，我答以報國不必入黨為由而拒絕，但有同學卻經不起指導員的勸誘而入黨。不管指導員如何親切，都是笑裡藏刀的；我有一次從行軍操演回來，床上赫然發現惠美寫來的一封信，卻忘了寫收信人，但它還是照樣地到了我的手裡，可見每一封信他們都打開來看過。他們的拆信技術高超，能將已開的信貼回去而外行人見不到痕跡，讓人嘆為觀止。

那時台北、高雄間的交通往來費時約七、八個鐘頭，惠美冒著這個麻煩來看我，我是很感謝的。就如上文所說，人沒來也常寫信，是心中莫大的安慰。

記得最被犧牲的享受就是入浴。有一次同班同學、現已過世的沈友仁醫師，他認識當時省立澎湖醫院的陳金樹院長，說陳院長邀請我們幾個去他家裡入浴並吃飯，過了一個舒服而愉快的夜晚。

陳院長後來調回嘉義，任當地省立醫院的院長，之後又成爲省立臺南醫院的院長。就在他擔任省立臺南醫院院長時，正好是成大的夏漢民校長在成醫創院的時期，是去美國的代表團裡面的成員之一。我提起這事，陳院長臺灣大學建院初期對外聯絡委員會陳院長已經提過，讀者可以參閱原文，不在此再述。

在軍訓期間，因爲第二醫院所在地位於馬公的海軍基地裡，海軍的動態我們大都可以猜出，最明顯的是金門的八二三砲戰。這個砲戰停止了美國總統艾森豪的訪華，日本的石原裕次郎也趁機拍了「金門灣風雲」一片予以渲染。住在馬公軍港附近的我們則目擊到船腹中彈有二、三公尺直徑大洞的軍艦停泊在馬公港修理，這種情景並不常見，故議論紛紛，也反映了前線大戰激烈，而且是真槍實彈呢！

不久之後軍訓結束，我也完成了一年半的預備軍官軍旅生涯，帶著許多第二海軍醫院人員的祝福坐軍艦離開。後來偶爾還會聽到相關消息，例如說在第二海軍醫院的劉進貢將軍後來成了軍醫局局長。

## 第一個離開外科的人

那時醫科畢業學生有我本身也捲入的一趨勢，那就是畢業成績不錯的男生一定申請外科，所以外科從沒發生過沒人要去考的窘相。我也選了外科，現在想起，這是因為虛榮，還是另有原因，我不知道。在我們班自然的競爭之下，我的畢業名次是全班七十人的第八名，所以申請入外科實為囊中物。

我做了一年外科的基層住院醫師，當時的前一年叫做“fixed intern”，第二年才是住院醫師的開始。我的女朋友惠美則早我一年多已進了內科。

我一進外科就發現自己不是行醫的料，第一、借口人的表達方式：我的神經很細，白天若開闊尾炎，我就會擔心病人是否會釀成腹膜炎而一整晚都睡不著。反正要擔心的事太多，多得不成樣。

子，弄得我的生活也被影響。第二、從第一年住院醫師一直升到總住院醫師，隨時都有被砍頭的可能性，這跟美國的醫師醫學史作家路德摩爾(Kenneth Ludmerer)的書《醫治的時機》(Time to Heal)寫得一模一樣(請參照該書第九十四頁)。而且主任的太太一天到晚進出病房，發號施令干涉人事升遷。這事我不能接受。第三、我還是嚮往少年時的美夢，認為我有把握變成好老師，不管我的專門是什麼。如果我要當醫生的老師，那麼到美國念博士學位當基礎醫學的老師與當臨床醫學的教師待遇也差不了多少，這事漸漸使我萌生辭去外科醫師的職位而前往美國求學的念頭。

爲了這改變，我與內人去請教了王三聘老教授，王三聘說他自己剛想放棄基礎，而我卻想離開臨床進入基礎，兩個人的走向不同，他覺得我放棄臨床這搖錢樹實在可惜。他的談話等於替我辭去外科訓練之事潑了一盆冷水。

反對我離開臨床的聲音也起自惠美的舅舅，認爲我選擇的新路是充滿荊棘的路，是錯誤的，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反對我決定的還包括林天佑及許書劍兩位教授，但現在再想起當時的決定，這些人的反對皆出於好意，毫無鄙視我的意思。

最大的支持來自我的內人，內人當時在內科，頻頻告訴我她父親以外科醫師的身份而喜歡微生物



與夫人謝惠美女士的大學學士照  
合影。

畢業後我就和惠美結婚了，那是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的事，我們的婚禮也依照本土的習俗舉行，但不太鋪張。我們結婚後先住在撫順街，不久之後，長女岫清於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四日出生，她在台大出生時，我正好在左營服海軍的教育召集，所以並不在場。那時我們整個家也搬到士林的福林路，福林路附近當時是一片田野，我們搬去不久之後，就感覺到與總統官邸爲鄰有不少好處，第

後的意義如何，我已下定了決心表明辭去外科的意志，就這樣，外科林主任也無可奈何地接受了我的辭呈。

## —結婚—



1980年，與林天佑教授(左一)合影。

有一天我到了林天佑主任的辦公室，正式地提出了辭呈。林主任說了一句話：「你真的要離開外科嗎？」這一句話有兩個意思：第一、進入外科的人從未離開過，我將是第一人；第二、他必須像扮演美國大使館的角色般，要我確切地表明我的意向——放棄臨床工作。不管他這句話背物學，但內心難免有一股前途未卜的感覺，這感覺我自己也有。所幸她沒有加入反對我的陣營，而與我站在同一邊，我很感謝。

如無當時贊成我去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

做研究員的高天成，以及不易表態但不反對我走基礎醫學的惠美的父親等人，我可能就不會有今天的這個生涯。



筆者伉儷結婚照。前排右一為大哥，後排右一三哥，後排左一為杜永光醫師母親（同時為筆者伉儷之媒人）、左二為大嫂。



筆者伉儷婚宴之二，左起站者為筆者大哥，旁為楊思標教授，右起第二坐者為台大附設醫院高天成院長。



筆者伉儷婚宴之一（新娘旁坐者為其母親）。

第一個離開外科的人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嶽自傳

## 美國海軍第一醫學研究所

離開了外科，我去了哪裡呢？



右二為Dr. Hope Phillips。

那時美國海軍有位於華府近郊的海軍醫學研究院 (Nav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 NMRI) 及分布於世界各地的四個研究所，這也表示美國海軍的勢力已經橫跨全球。美國海軍及一般軍人子弟兵所在此處皆有醫學研究機構在研究如何照顧這些子弟兵的健康。海軍第一醫學研究所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No. 1，簡稱NAMRU-1) 在加州的奧克蘭，第二研究所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No. 2，簡稱NAMRU-2) 在台北。第二研究所當年以一年一美元的價錢設在現在景福會館附近的牙

科，是一棟L型的大樓，設立所長是名叫羅伯·菲力普的海軍上校 (Captain Robert Phillips)，他是范·斯萊克 (Van Slyke) 的生理學士，但出身醫學。他的夫人名叫霍普·菲力普 (Hope Phillips)，是位學識豐富的女性，為維斯爾學院 (Vassar College) 的畢業生。她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台灣是她的第二故鄉。關於霍普·菲力普的趣事頗多，詳細內容已收錄在美國在台醫藥協進會 (ABMAC) 的歷史書中，由約翰·瓦特 (John Watt) 所編撰，故不在此敘述。這裡只點出第二研究所對台灣的沙眼、腦炎及恙蟲病有重大的貢獻。第三研究所在埃及的開羅，第四研究所在美國的大湖市 (Great Lakes)。

那時的NAMRU-2是一所可以作為台灣模範的研究所，設備極為齊全，連實驗動物都有周全的安排，供應台灣各地的需要，這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〇年代是很少見的例子。研究室裡外的環境極為清潔，從東南亞各地來的研究員雲集該所；台大及台灣人在那裡做專任或兼任研究員的，當時有一、二個，即李俊仁、李慶雲等人，後來去的人更多。NAMRU-2因為菲力普夫婦為人的關係，兼做了一些重要的國民外交工作，很是成功。

現在NAMRU-2已經搬走了，原因就是一九七八年台美斷交的緣故。

第一個離開外科的人

## —哥頓教授—

我到N A M R U - 2不久之後，來了個外國人，那就是哥頓(Francis Gordon)教授，他是芝加哥大學退休下來的一位白髮蒼蒼的學者，現在擔任美國海軍醫學研究院的微生物主任，他也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首次分離沙眼病菌的人，故他的名氣是很響亮的。他的助手關小姐(Alice Quan)是生於美國的中國人，她會講廣東話，但不會講普通話。美國海軍醫學研究院位於Bethesda, MD，與世界有名的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隔一條路遙遙相對，其全名叫Naval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或簡寫為N M R I，其創院地點是羅斯福總統的選擇。

哥頓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時，曾直接受教於組織學的麥克斯矛教授(Prof. Maximow)，我們學組織學時使用的教科書就是出自麥克斯矛教授之筆。聽哥頓教授現在再加描述，整個組織學課都活了起來。他是英文很好且出口成章的人，我暗地裡從他身上學了不少英文，他也不忌諱指出我講錯的英文。有一次到美國參加了一個派對，他站起來唸了自己寫的一首詩，那時我深覺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能精確地運用語言及文字。

我和他自初次認識以後，交情愈來愈深，有一次他在N A M R U - 2的圖書館單獨閱讀，我恰好也去查資料，兩人碰面談起我的將來，我這才知道他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簡稱G . W . 或喬大)的兼任教授。他的副手，也是芝加哥大學的退休教授，叫懷斯(Emilio Weiss)，是全國有名的立克次體專家，偏向細菌學中的生化學，也是喬大的兼任教授。他就當場決定回華府後與喬大協商，並與N M R I折衝，最好的安排是在美海軍醫學研究院工作而兼做喬大學生。

哥頓教授曾經請我們到圓山飯店吃過飯，飯後在金龍廳觀賞台北的夜景並跳舞，頗為愉快。那時的圓山飯店是還在蓋主體的階段。

他離開台北回美國華府近郊，大概馬上與喬大當局取得聯繫，喬大不久之後就有信件寄來。按照那印刷物內容，我有一年二千四百美元的獎學金，而職位的名稱就是助教。

我前往美國的決定與內人惠美也講好，所以就照原訂計畫進行。我不在的這一段時間，內人從福林路搬到撫順街的娘家，一切搬家的事由她解決，她也從未在信裡訴苦過，使我更覺虧欠。



筆者1960年代照片。

當時要飛往美國主要都是透過 C A T，中譯叫中國民運航空公司，是以飛虎隊為前身所組成的英國公司。該公司沒有幾架飛機，有一次該公司的一架民航機在林口發生空難，整個公司就馬上改組成運貨公司，等於公司關門，這彰顯了該公司沒幾架運人的飛機。捨去 C A T，剩下的就是西北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取道日本而飛往美國西岸，再接飛到東岸的華府。

我要在此強調，那時買的機票是單程的，機票當時算貴，單程要六百多美元，這票價在這四十多年以

後的現在並沒有改變，反而便宜一點。但六百元美元我當時也拿不出來，只好向岳母暫借。

那時出國赴美沒有那麼簡單，我拿的是學生簽證，而且要有醫生的證明沒有香港腳，還有 X 光片一張證明沒有肺結核。所有往美國的學生皆人手紙筒一個，裡面裝有 X 光片一張。

那時也沒有桃園國際機場，故如果要坐飛機出入國，一定要經過松山機場。家裡的母親和兄弟姊妹，以及惠美的家人皆來機場送行。這也難怪，我這一趟出國，何時再回國是難以預料的。

經過不曉得多少時間，終於到了華府，哪裡知道華府的機場不是僅有一座而有三座，我飛抵華府的並不是哥頓教授所猜較常用的杜勒斯機場，而是位於華府與巴爾地摩中間的機場。就這樣，接我的人在幾十英里外的機場等候，而我卻在陌生的美國華府附近向著喬大前進。

到了美國之後，我立即發現我們在英文課所學的英文並不管用，譬如說，我想坐的巴士的車資是每人一塊二十五分美元，但美國人硬是不說二十五分，而說四分之一元！他們不說“one dollars and twenty-five cents”，而習慣說“one and a quarter”。

後來有一次喬大一百五十年歷史的舊大樓要從華府的第十三街搬到二十三街的新大樓去，那時我已經在喬大，每一位教授（包括助理教授以上）都要提出所需的設備清單一張。結果我們的主任

把所有教授的要求加起來，發現比學校當局給我們科裡的預算超出很多，於是有一天把我叫去，要我把這些東西分為二類列出，即：“things you got to have”、“things you have to have”、“things you would like to have”。弄得我查遍字典也查不出“got to have”和“have to have”的不同點，只好去問美國人同事，這才弄清楚這兩者的不同。台灣英文課本所講授的英文裡沒有類似這種英文的實用例子，是一大缺失。

言歸正傳，我坐了灰狗巴士從機場抵達了第十街的巴士終點站，旁邊有一個黑人司機穿著制服，我一下車就用我生硬的英文問：「到十二街喬大的醫學院要怎麼去？」結果那黑人司機說搭計程車最安全！我就只好坐了計程車。其實巴士的終點站離喬大醫學院的路程很短，但我行李多也是非坐計程車不可的理由之一。

我在喬大醫學院位於十三街的辦公室認識了我的指導教授羅賓斯教授 (Marty Louise Robbins)，她的人不錯，但沒結婚，已經是六十歲左右的女士。初次見面寒暄之後，她也把事務性的事交代清楚後，我這才明白，學校已經幫我安排了位在二十四街的學生宿舍，於是便住進了學生宿舍。

## — 哥頓教授的家具 —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我依約到了郊外的N M R I 與哥頓教授見面。在會談當中，哥頓教授重申之前的承諾，說明喬大的安排只是暫時的，只會維持一年，第二年就會成為N M R I 的公務員。

臨走時，他發現我穿的風衣太薄，不足以禦華府之寒，於是吩咐太太瑪麗隔天早上帶我去找大衣。那時的物價低廉，我衣袋裡只帶了二十塊美元，希望瑪麗夫人等會兒帶我去的地方東西不要太貴。結果她車子愈開愈是郊外，最後在舊衣店前停車，她下了車就帶我進去一家舊衣店，幫我物色適當的大衣。結果我找到合適的一件，等我買單時，我赫然發現這一件大衣的價錢是七毛五美元而已。弄得我數年後家計好一點，雖買了一件更好一點的大衣，也不敢穿它到哥頓教授家裡。

哥頓教授有一華人助手名叫關小姐 (Alice Quan)，上文已提過，關小姐能毫無障礙地操廣東話，但中國普通話，即國語則一竅不通。一九六三年有一天，我趁她在抽氣櫃內滅菌做事時，請教了她該如何準備一套家具，因為一九六四年惠美與岫清到美國，我非得把家裡的必需品準備好不

Oct. 11, 1973

Dear Amy <sup>and</sup> Kun-yan,  
Francis,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lovely evening we  
spent with you — and  
that delicious dinner!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get ready to go  
next week and hope to  
make our deadline.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you and the  
girls visit us in London.  
we might even find some  
Chinese food to make you  
feel at home. With love  
and Best Wishes from us  
both - Sincerely, Mary

哥頓教授的夫人，Mrs. Mary Gordon寫給筆者的信。

行。但我在美國卻依親無著，對如何開始著手毫無概念，只好請教關小姐。  
美國海軍實驗室因為寬敞，哥頓教授當時坐在另一個無菌抽氣櫃操作檢體，因此把我和關小姐的話都聽進去了，也知道了我的意圖。等我和關小姐的話講完走出實驗室之後，哥頓教授走過來與我肩並肩；他跟我說明，美國的家具很貴，而且我又不是要永久住在美國，他打算將他家裡儲藏室中上一代留下來的家具整理一下，湊成一套借給我用。總而言之，他叫我不要再去買家具。我正想他老人家怎麼能搬這些家具到我住處，但我對住美國沒有經驗，故他有什麼方法也不太清楚，但我還是決定等等看。

等到惠美將到的前兩天，哥頓實現了諾言。原來我租下等惠美的公寓叫普克丘 (Pooks Hill)，普克丘到美國海軍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有交通車可乘；哥頓教授有三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最小的男孩子當時約二十歲，叫比爾 (Bill)，哥頓教授與比爾借了一部由自己駕駛的D-I-Y的U-haul，而且以他的高齡卻親手與比爾一起搬了十件左右的家具到了普克丘。這些家具包括一張桌子、椅子、床等不打緊，還包括了一些廚房用具，真是設想周到。我自己呢？只添購了沙發椅一張及飯桌一套，前者是新的，後者是一手貨呢！另外懷斯教授也借給我一張小孩的床及零星的東西幾件，我全

家在美的生活是這樣子開始的。

惠美與岫清於一九六四年八月抵達位在維吉尼亞州的杜勒斯機場，當天的晚餐及飯桌都是哥頓夫人瑪琳打點、準備的。哥頓教授用他的車子把我們一家人送達我們在普克丘的新家，之後他吃了點東西就起身告辭了。我們請他把餐具放在原處就好，我現在還記得哥頓教授說：「保持一家的麻煩開始在整理餐具，而且它隨時都開始！」

哥頓教授與夫人瑪琳不但大方，而且幫別人忙設想周到。關於瑪琳尚有另外一件事現在還在我記憶就是內人懷雙胞胎的時候，有一次大雪剛過，普克丘公寓停車場地上一片結冰景象，內人準備送岫清到學校，走在薄冰上走時，忽然跌倒而出血。瑪琳知道後馬上燒好的晚餐帶來普克丘，使我們感動得無可形容，她發揮的是照顧人的本性，而我們就落在她這種精神的圈子當中。

哥頓教授借給我們的這些錢完全來不及還，哥頓教授就辭世了。他留下不少小故事讓我回憶，但他與夫人瑪琳的人生結局卻不好。

## —哥頓教授夫婦之死—

哥頓教授於一九七三年從海軍退休，退休後擬到倫敦的眼科學研究院繼續研究。那時我已是一個成家立業的喬大教授，所以他也請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我們一家人開了一個晚餐會，請了一些人歡送他夫婦倆。他因為生性喜歡某些程度的冒險，出發前告訴我，他這次行李特別多，所以預備到紐約搭客貨兩用的輪船橫渡大西洋。數天以後我們卻獲得噩耗，說他們夫婦乘坐的船著了火，他們逃上了救生艇之後，救生艇在大海中翻船而兩人都溺斃。他夫人瑪琳的屍體是找到了，但哥頓教授的屍體始終沒找到，他們倆的墓現在在馬里蘭州的OBY家附近的教會墓地內。

## —懷斯教授—

話說我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海軍第二醫學研究院與哥頓教授見面時，他已經把我留美第二年以後的行程都已經安排好了。我的校外指導教授在海軍第二醫學研究院，是哥頓教授的副

手懷斯教授 (Emilio Weiss)。懷斯教授出生在

南斯拉夫，長於義大利，後來移民美國，他說

一口口音很重的英文，但是研究論文卻寫得頭

頭是道，是美國少數的立克次體及微生物的生

化專家。我抵達美國當時，正巧碰到哈佛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的威廉·文森 (William Vinson)

在沒有細胞的培養液裡成功培養出五日熱立克

次體 (*Rickettsia quintana*)。因此，微生物學界

裡「五日熱立克次體不是典型的立克次體，立克次體必須重新分類」的聲音甚囂塵上，我的

研究就是闡明五日熱立克次體的化學變化，從

生物學的觀點看五日熱立克次體是否真的是

*rickettsia*。



懷斯教授與其夫人的合照。

懷斯教授的父親是一心理學家，曾從師於弗洛伊德，所以懷斯一家是科學世家。他特別相信愛因斯坦的一句話，即「聯想力比知識重要」，他每天都會告訴我：「崑蟲，聯想！」那時喬大微生物學科有比利·翰 (Bill Hahn) 這個人，花了七、八年寫了四百頁長的論文拿了博士學位而畢業。當我以三年的時間寫了七十五頁的短篇論文贏得博士學位時，懷斯教授曾經跟我說：「當你沒有東西好寫時，博士論文要四百頁，當你有東西寫時，寫七十五頁就行了。」由此可見他對論文簡潔的要求。

懷斯教授也是很實際的人，他曾經告誡我，週末離開家裡到實驗室工作，估計要花的時間記得要乘以二，比如說實際可能要花兩小時，告訴太太時就要說四個鐘頭，因為可能會有未能預料的事會發生。他也喜歡玩弄英文字，他指非驚天動地的研究不能接受的年輕人是患了“*Nobelitis*”，意思是指一個人患了諾貝爾獎金熱；感冒流鼻水，鼻涕擤不停的人叫“*Blownosis*”，這些新字都令人莞爾。

## 雙胞胎的來臨

一九六六年我獲得了博士學位，一九六七年、隔長女岫清出生五年之後，雙胞胎，即岫安與岫寧，終於來臨。那時我內人還沒有在美國就職，故全心照顧雙胞胎及照顧雙胞胎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首先，照顧的重點在尿布，我內人有數十條用紗布縫好，疊好的尿布每兩天要洗一次。另外，因為兩個雙胞胎很像，餵奶時很怕一個會餓兩次，而一個沒餵到，故兩個雙胞胎各有豎牌編號，舉凡任何事情，例如拉肚子的是岫安或岫寧，都有詳細的記載，以免上述重餓、重做的事會再發生。這些都全靠我大大的點子所以帶起小孩來特別容易，等她們上學時，果嶺更重複

做兩次的情況就發生了。原來她們學校在休息的時間上廁所是叫名字、照排隊的，有一天，她們回來，有一個褲子是乾的，另一個卻是濕的，一問之下，乾的去過廁所兩次—而濕的，次也沒去過，因為老師沒叫她去排隊，可見老師沒有牌子。

但雙胞胎在醫學上有它的作用，對研究基因的影響特別有用，這也是希特勒手下的醫生們特別喜愛猶太人的緣故，看奧次維堡的解放紀錄片最後的鏡頭，有一大堆猶太雙胞胎走出那集中營，就知道雙胞胎在醫學研究上的價值。不說別的，光是觀察岫安與岫寧從學校帶回來的病毒，明明是當時流行的同一病毒，但他們兩個的症狀確有差異。這也證明世間要有醫師，因為診斷需要靠細心的觀察與聯想。

我們的雙胞胎倆感情頗好，在學校的老師也這樣說。這主要是內人惠美的功勞，她帶孩子有她的一套，這也顯示她實際且點子又多，她帶孩子的乾淨俐落，使她母親即我的岳母也佩服不已。



筆者美國房子的外觀。

等岫安與岫寧長大後，因為孩子們成長的空間不足，故於一九六七年快年終

時，我們經過慎重的考慮而買下了位於1600 Johnson Avenue的家。等她們長到兩歲時，惠美決定到喬大從頭開始在病理科受訓，於是請了當時還在世的二姊到美國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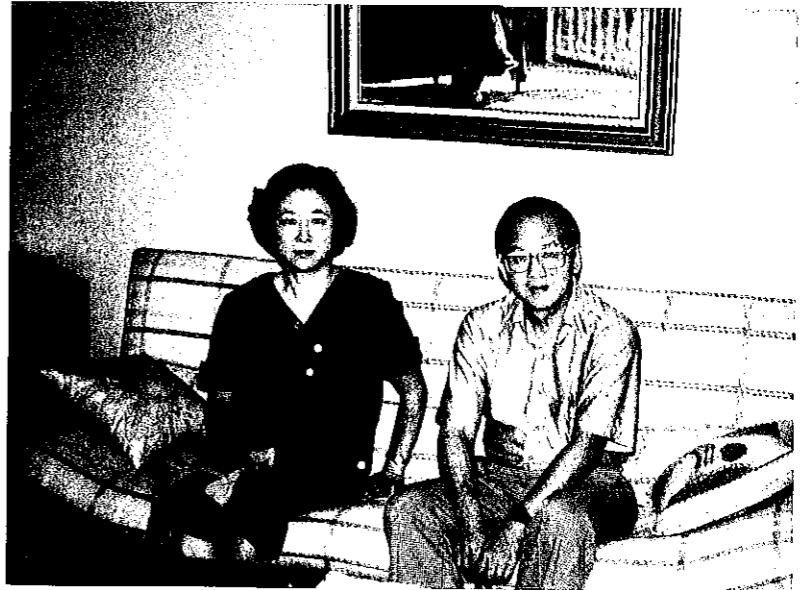
二姊嫁的夫婿陳萬生婚後一直體弱多病，最後患了肺結核去世，二姊未生育，平時自己一人生活，故請她遠赴美國來可觀光又可照顧女兒們，是一舉多得的事。於是惠美開始工作，而我託請二姊看管小孩的事也順利解決，這已在我的另一個回憶錄裡講過，故不在此贅述。不管怎樣，我在一九六三年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於一九六六年結束學程，獲得了博士學位。

## 成為美國公務員

我在成為喬大學生的同時也成了美國的公務員，這一件事使我益覺美國的制度也是講人情與裙帶關係的國家，和非法治國家一樣。

我拿的是學生護照，照理應該是絕對不能工作的，但我大概是有哥頓教授的護航，銓敘為第九等的公務員，一年的薪水是七千多，將近八千美元。我有一醫學系的同學張步良已來了美國數年，在華府當醫生，在我抵美時，他一年才僅有五千多美元薪水，所以他對我後來居上且多拿收入意見頗多是這個原因。

一九六三、六四年左右，也是越南戰爭戰事節節上升的時候，當時美國有醫師的徵兵制度，年齡上限達三十六歲，是比其他各領域都高的。有一天，美國當時的徵兵機關(Special Service)來了



右為張步良教授。

一封信叫我去巴爾的摩城做體格檢查，這證明是我觸犯美國醫師徵兵制度的結果，是徵兵的前奏。有綠卡沒有投票權，意味權利不全，但有美國公民的義務；我即把事情的始末告訴哥頓教授。哥頓教授建議兩件事：第一是要我遵從徵兵機關的建議，訪問徵兵機關一趟；第二是另外準備文件志願成為美國海軍士官（noncommissioned officer）。我照哥頓教授指示行事，到徵兵單位那裡，正有一位老太太在辦公接受我的案件；我告訴她我不是美國公民，她答：「我們會立即給你公民權。」我又說我也沒有臨床訓練及執照，她又答：「我立即給你訓練及執照。」

我的兩個問題皆被否定，但最後她問我有沒有一年半的軍事訓練，我立即說有，她要我提出證明，因為美國法律規定，在二次大戰時的戰友國服務過一年半，每天有二十四小時軍事訓練的話，就免於徵兵。我立即寫信請惠美馬上寄來退伍證，並請我駐美使館譯為英文，然後把這文件向美國徵兵機關提出。果然，這文件馬上奏效，我的體格檢查本來是最高的，馬上被改成免於徵兵的一類。我的朋友張步良因為算是華僑，雖然與我同期，但未去服第八期預官，所以第二次手握綠卡到了美國立即被徵兵而走了不同的路，但至少他服役時是美國的陸軍少校，而我還是中國的海軍少尉呢！

這件事也彰顯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但像一個我拿學生護照卻能當國家研究所公務員的，在這法治國家是很明顯的矛盾現象。

## —甘迺迪總統之死—

華府的十一月不是好季節，是風蕭蕭雨飄飄的秋末氣候，天氣常顯得陰霾，而一九六二年也沒有例外。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一個令美國國民悲傷的日子，我也無意中捲入了這風波。那

時我開始在喬大做助手幫忙教學，下午四點多鐘，我們整班學生（醫學系）皆在階梯教室上課，我坐在後排的「高地」，該座位恰好在後門的附近。課進行到一半，突然後門開了，進來了一個名叫歐亨（Elisabeth O'Hearn）的女助理教授，她只隔空向我說了一句：“Kennedy was shot!”

我在上文已說過，台灣教的英文不管用，這裡又有了一个實例，通常「遇刺」都會說“assassinated”或“killed”，“shot”在醫學上是用來形容打針或種疫苗的。我只回答歐亨說：“Is that so!”，現在想起這事，當時歐亨一定會覺得我是一個無血、無淚又冷漠的華人男子。我當時也沒想到是我的英文程度不好，等兩、三分鐘後，華府各地的鐘聲大作，我才恍然剛才歐亨說的英文真意而覺得汗顏。

我每天在十三街到二十四街之間上下班來回，總會經過白宮，因為兩端皆離白宮不甚遠。當時天空飄落的雖然不是雪而是細雨，但天氣不好，四點多鐘四周已初暗，白宮前來悼念的民衆已有很多，我也在白宮之前佇立許久。

甘迺迪總統才上任不久，就遇不幸，表明這個國家的安全措施有問題，而且也露出民主制度的破綻。我並不是稱讚獨裁政治的好處，而是強調推行民主制度也要更加小心。一個每人一票的制度難免有它的缺點，這也是法國大革命以來關心政治的人心中共同的隱憂，他們也提出過不少警告。

因此可見，世上沒有完全民主的國家。

但甘迺迪總統的口才、風度，在他在世時風靡了整個世界，就像現在民主黨初選中的歐巴馬（Barack Obama）一樣。優雅的第一夫人更與總統是天生的一對，這種魅力壓倒了古巴豬羅灣的攻擊失敗，以及他在內政方面國會空轉的挫折，而掀起了政治的一個新期望。據《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華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的主張，甘迺迪最成功的是振興了經濟，在背後的可能是甘迺迪的赤字政策，總統也不知它的究竟。反之他的出現代表了美國新時代的來臨。這樣的總統怎麼會遭到不測！

繼甘迺迪之後當總統的是本來當副總統的詹森（L.B. Johnson），他雖然標榜大而正義的社會，但他的任期卻為越南戰爭所困，成就不多，僅有的成就是黑人的民權運動。但他對國際學生的重視，使我有能以來賓身分進入白宮作客的經驗。

我也在寒夜中排隊排到半夜裡耐心等候，走入國會大廳去參觀覆蓋著國旗的靈柩，我也到阿靈頓公園觀看戴高樂等世界各國的領袖們來華府參與的送殯儀式，這些領袖一律也和其他人一樣徒步，經國會沿著賓州大道及憲法大道抵達阿靈頓。我總說沒有甘迺迪總統的美國頓失了一個活力。

## 一朱養民先生

我至今很懷念朱養民先生，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學究，任何人一見到他就會知道魯迅、老舍，甚至於我至今還欽仰不已的典範——前新竹中學的蘇森墉老師所描述的大陸學究，就是朱養民先生這個模樣。

我萬萬沒想到我會和他巧遇而成爲朋友，因爲我認定他是高攀不上的一个政論家，所以能遇上他，使我喜出望外。我在負笈美國以前曾是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的讀者，雜誌是在台灣發行的，胡適是發行人。朱先生在《自由中國》裡的文章字字真諦，有理想的年輕人看了很容易上鉤。一九五〇年代該雜誌有一系列所謂反攻無望論，記得有殷海光與朱紂紅兩人以及其他幾個人的論文前後數篇；現在想起，如果那時政府放下身段，聽這些人的話而勵精圖治，立足台灣，我們今天的境遇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我一九六三年到了喬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科，第一次上研討課，我就看到一位中國人，他中等身

材，駝背，眼水溢出紅腫的眼框，鼻樑上懸掛著似要掉下的老花眼鏡，稀疏的頭髮摻雜著不少銀

絲。因同是東方人，我趨前自我介紹，略做寒暄之後，我才恍然這就是我曾拜讀過大作的朱紂紅，原名朱養民。後來和他有一番深交之後，知道了他的身世，又因爲他是外交出身，使得我在華府的駐美大使館結交了不少台灣的外交官，像彭啓平，以及文教處的鮑幼玉先生等都是好例子。

朱先生是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學念外交，不久之後派往當時還有邦交的法國，在使館工作。他雖然中文不錯，但英文只能說馬馬虎虎，僅可溝通的程度。等法國與我斷交，政府要他轉到丹麥，他卻洗手不幹，自己轉往加拿大的溫哥華，再轉美國西雅圖開了雜貨店。據稱他在西雅圖遇搶兩次，第二次的黑人強盜居然被朱先生曉以大義而繳了械，朱先生因此遽然成爲媒體人物，還上了電視呢！我認識朱先生時他的英文溝通能力還很差，他是用什麼招數說服了那帶槍的大盜，對我來說仍是一個謎，叫我想像那情景，似乎是一部叫座的喜劇片。

不知怎地，朱先生生涯有了大轉變，以五十左右之年他立志從ABC重新念起微生物學，拿了學士、碩士後，我在喬大遇見他時，是在他走入免疫學博士課程的時候。雖然他是免疫學的研究生，但我看他的心並不在自然科學，我們一坐下，他的話題心會立即轉入政治，而他在香港《明報》還常寫文章發表黨論。起初我發現他是極端反蔣擁毛的人，尼克森總統爲中美之父鋪路之後，

他立即訪問了大陸，而且前後還不只一次。有趣的是每次回來，他的言論就改變了一點。我知道他是信奉民主自由的中國人，這早就在我看《自由中國》雜誌文章時就一清二楚，直到有一天他坦誠地告訴我：「海峽兩岸都得痛罵，我是反對任何反民主政權的。」

朱先生外表很潦倒，喬大的科主任曾經跟我打開心窗說：

「我一走，約翰（朱先生之英文名）是找不到工作的。」果然，主任一走，朱先生的位置就保不住，轉職到鄰州的杜邦公司做事而斷了聯絡。但他在政治立場上的凜然骨氣與手裡握的犀利筆桿子一直使我難忘，不知他現還是否在世。

有一次他仔細地看我的長相，喃喃地說：「你的長相不錯，有做官之相，你要不要做官？要的話我願做你的代言人。」他的看法是：要做異議分子就要做得很壞，一定要坐牢，要這樣出名才可，坐完牢還可以寫一本書賺大錢呢！

## 善行

我曾在美國的公路上體驗過陌生人的善行而上了人生的一課。

一九六四年，秋高氣爽的九月，我帶著內人與女兒，開著一部剛買才一週左右的福特二手轎車，從華盛頓往巴爾的摩城，接新竹中學蘇森墉老師的女兒蘇綠萍來我家度週末。憑良心說，車子是買了，但我對維修車子的知識倒是空空如也，連說明書的封面都還沒見過就上了高速公路，擠入駕駛人的行列。



右二為蘇森墉老師長女綠萍。

去程安然無事，但回程卻在距離住家約三十二公里處，車子開始失控，整個車子偏向左邊。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車子導入右邊的路肩停了下來。下車一看，原來是左前輪爆了胎。但我當時對如何換胎毫無概念，就連備胎如何取出都有問題，考慮一番之後，只好取出褲袋裡的白手帕向過路的車子揮搖，希望有人下來救助。頃刻間，有部車停了下來，走下兩位身著筆挺空軍制服的軍官，問我發生了什麼事。當我說我不知怎麼換輪胎時，兩位軍官頗為訝異，臉上露出一絲「你這樣子

還敢上路」的表情，但兩人互相點了頭，就說：「我們來幫你，你看著喔！」說著，就把上衣脫下，捲起襯衣袖子，動起了手。他們步步為營，互相合作，一下子就把輪胎換好，並且把破胎放入行李箱。當他們說：「好了！可以走了！」我心裡感激得無法形容，傾囊使出還不是很流利的英文，謝他們一番，目送他們開車離去。

目送行禮完畢，我以輕鬆的心情把行李箱碰地關上，到駕駛座想發動車子，才發現我的鑰匙忘在行李箱裡。顯然是開啓行李箱拿取備胎時，順手放在裡面了。你經驗過狼狽、困惑與進退兩難等情緒摻雜在一起的感覺嗎？我當時真的經驗過了！怎麼辦？我只好再把褲袋裡的法寶——白手帕拿出來，再如法炮製一次。這次停下來的是白髮蒼蒼、風度絕佳的一對老夫婦，老先生問我：「怎麼了？」「我把鑰匙所在行李箱裡了！」「噢！你說什麼？」他起初還不相信呢！他抓抓頭，摸摸下巴，說：「有的車子把後座椅背移開，伸手可及行李箱。我們試試看。」他就親自動手和我一起搬動了後座，但我這一型車子在車廂與行李箱之間不幸有一鐵板隔開。老先生搖頭束手，他問：「你家裡有備用的鑰匙嗎？你家離這裡多遠？」聽我解釋說明後，他說：「這樣好了，你們現在統統坐我的車，我送你們回家，拿了鑰匙，我再載你回來這裡，好吧！」

老夫婦於是送我們回去，我拿了鑰匙，內人、岫清與綠萍留在家裡，他們把我一個人再送回原地。他總共開了六十多公里的路，再抵達現場時，已是夜幕低垂。你可有過對救命恩人感激不盡的感覺嗎？我有！老先生把我放下，說一聲再見並囑咐我開車小心，就很瀟灑且若無其事地掉頭要走。我急忙說：「我要鄭重感謝你，但不知應該如何謝你？」他微笑地說：「不用謝了！下次你遇到別人有類似的困難，你就這樣子幫忙他就好了。」我站在原地揮別注視了他們許久，直到他車子的兩盞紅燈在夜色裡逐漸消失。

## —論文作者的掛名—

我一直以為中國是禮儀之邦，結果不是，外國人看了不能瞭解的事很多，我認為中國的教育也

走了樣，因為這種禮儀沒有在學校教，而失去了實際的教育效果，禮儀之邦也是嘴上說說而已。

中國人在外國人深入的觀察中是很殘忍的，這種殘忍的程度沒因中國人對待中國人而稍減，讀者不信，可隨便翻翻外國人觀察中國人的書籍，這裡面包括最近問市的書——約翰·龐弗瑞特(John

Pomfret) 的《中國的教訓》(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文化大革命的殘忍與亂像是一個好例子。

中國的教育沒有深化「先做成功的人，再做專業人」(Before becoming a doctor, become a man!) 的原則，一味地想學表面的技術，美其名曰學以致用。學以致用是清末民初中國面對西洋列強武力時的反應而延續下來的口頭禪，它是以學外國的船堅砲利為主體。社會上從事教育的關鍵人物如果不認為做人才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如何做一個成功的人的教育就會在學以致用的口號下被忽略，我們的教育就是好例子。

我出洋相的糗事就發生在這一教育下，原來我寫的博士論文是七十五頁短小而精簡的，但為博士論文所投下的時間與精力非比尋常，所以博士論文非得在像樣的期刊上登載方肯罷休。我也就像寫博士論文般如法炮製，把我的博士論文寫成可以投稿的形式投到《微生物期刊》雜誌(*J. Bacteriology*)去。但問題是我把指導教授懷斯擺一邊，由我單獨掛名作者寫作。我在此告白，這事我在學校裡一點都沒學過，是言教或是身教？我笨到沒有領略，那時候也沒有所謂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這詞話與概念，因此懷斯的名字只出現在謝詞中，現在想起這事真是汗顏。

待我一九六八年發現實驗用的小白鼠瘧疾能在白鼠身上刺激產生干擾素時，寫了一篇準備刊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的論文。一同參與這項實驗構想的哥頓教授向我說：「我的名字呢？我想我的名字應該在上面。」這時我才恍然大悟。

說我感覺遲鈍也可以，反正這是我們教育的結果，這事使懷斯教授顯得更偉大，因為他從不因此事吭聲，每次演講，講到登在我刊登論文中的數據時，他會說黃說怎樣怎樣，「以示公平」。

## 二、美記者的程度之別

一九六八年我在科學雜誌發表論文時，《紐約時報》的記者當天就打了一通長途電話過來，透過電話做了訪問，所問的問題內容程度都頗高，而且都觸及論文的重點。第二天《紐約時報》登的報導也真實地反映了我的意思，以及他在電話裡注入的意見，這使我很肯定該報辦報的精神與原則。

一九九七年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的普西納因發現非病毒與非細菌的狂牛症新型病菌而獲得諾貝爾獎時台灣某大報派了個人來找我寫關於普西納的故事。對方託我寫這篇文章時再三吩咐我

成為美國公務員

155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154

要寫得通俗一點，不然台灣的讀者看不懂。

我這篇文章寫得很通俗，比起

《紐約時報》的報導有天壤之別，結

果文章寄出，雖翹首等待出現，但我

的文稿卻像石落大海終未獲他青睞。

過幾天原稿退回來，未刊登的理由是

邦程度有差，或純粹是媒體工作者的

寫得太難了。這是台灣大眾媒體與彼

過幾天原稿退回來，未刊登的理由是

操作所致？



### 第三部

## 教職與學界發展

黃崑巖自傳

黃崑巖

黃崑巖</p

就在我修完博士班的時候，美國海軍醫學研究院出現了一個人，口口聲聲指著我，說我是當時外國、包括台灣的人才外流的好例子，而他本人絕不願意成為人才外流的一部份動力。這個人就是海軍上校薩達斯(Captain Sudduth)。我要問讀者，有誰到彼邦求學而不會想過要衣錦而歸？薩達斯上校從不瞭解這一點。我爲了找新的工作曾經到過波士頓及底特律等地覓職。

喬大的微生物學科怎麼會知道我在找工作的事，我不知道，反正有這麼一天，喬大微生物學科的主任羅伯·巴勒(Robert Parlett)打了電話來說，羅賓斯教授準備前赴日本用掉她七年一次的休假，並爲準備退休後的規畫前赴日本鋪路，這段空窗期沒人教病毒學，要我來代課一年。這明顯地可以除去我必須立刻找到新工作的壓力，所以我立即答應說好。我把這事告訴內人惠美，那時岫清

六歲，雙胞胎女兒岫安和岫寧是一歲，她們當然還小，不知道家庭危機，但內人則冷靜地表示贊同。

這是我回母校工作的初因，但本來答應一年的工作，卻變成了二十年的「長期工作」（Long Stay）。

我在喬大一年間，發現學生不歡迎羅賓斯的課，急著另找教授。我雖然知道自己會變成好老師，但也沒料到我在英文還不太好時，會受到這種程度的歡迎。我分析原因，主要是我知道怎麼革新，知道怎樣給學生刺激而有學習的感覺，舉幾個例子說：

- 一、我從不立即回答學生舉手發問的問題，而先指定其他學生回答問題。
- 二、我會在講課中故意停講問學生的意見。
- 三、我開發了一堂新的課，稱為「臨床病毒學」，這個課也成了我一九七七年回台大客座時授課的骨幹。

四、我會利用我的檔案系統，避免下一年犯同樣的錯誤，例如一九七七年的檔案叫「一九七七年的錯誤」，我會在一九七八年時拿出來看看自己在一九七七年犯了什麼錯誤。

## ——陳定信院士與聞玉梅——

學生很能領略我的教學努力，要記得全世界的每個學生都有一對雪亮的眼睛，曾經有一位同學敘述性地講盡了我是好老師的理由，他說：「當這個老師講課時，時間太過易逝，當這個老師講課時，絕不能睡覺，因為你不知道何時他會把問題轉向你！」

我還在美國時（一九八〇年），陳定信院士曾經來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 H I）培西爾博士（Dr. Purcell）的研究室，我事先知道他要來，就像已去世的哥頓教授一樣，準備了一套家具借給他，他只要找個住宿之處即可。

他自己的研究及去處是解決了，但他夫人的去處未定，於是她決定來喬大，到我的研究室做博士班學生一年。就這樣一年過去後，陳院士和夫人就回台北去了。

這時已有成大醫學中心的事甚囂塵上，一九八一年陳院士離美，接著從上海來了聞玉梅教授。聞教授的叔叔是大陸的社會學家、詩人，後來被國民黨暗殺的聞一多。她後來到倫敦的豪爾博士



(Dr. Howard) 那裡專門研究B型肝炎，現在是聞名國際的病毒學家。她來剛好把我為陳定信院士準備的家具接下來。她也是一年就回去中國了。

上述這些家具，多半是哥頓教授留下来的，所以並不影響我本身家裡的使用。後來聞玉梅教授也走了，有些家具就流入住在紐約的女兒，等她購置了她自己的住所時，這些有的家具又流入住在維吉尼亞州的岫安手中，現在還在用。



與聞玉梅教授的合影。

俗語說：「無巧不成書」，這句話用在這裡特別管用。六年前宋瑞珍教授從史丹佛大學回台南主掌成大醫學院時，初期

曾向我內人訴苦說他擔任成大醫學院院長時，成大只補助了他一筆二十五萬元的家具費，這不敷支出。我立即學了哥頓教授的例子，讓他用了我留在臺南的家具，這些家具我也沒掛在心上，全由他處理；這些丙人留在臺南的家具只是用來布置她在臺南购置的公寓所用，它們不像哥頓教授借給我們的舊家具，而是全新的。

## 瑪麗

大華府地區在一九七〇年代前期聚集了不少華人與醫學、生技有關的人，於是乎由一位陳姓 (William Chen，中文名字已記不起來) 華人醫師倡導，組織了 Mid-Atlantic Medical Association，中譯名簡稱醫學會，我也當了它的發起人，而且是第四任的主席。

話說尼克森總統到了大陸後，開啟了美國與大陸的往來，掀起了美國人的大陸熱。因為去大陸的人突然多了起來，美國政府對大陸的公共衛生、寄生蟲病及傳染病毫無概念，必須有一套較完整的數據書以資參考。美國政府於是邀請了華府的醫學會執筆寫一本書，而其中有關傳染病一章的寫

作大任則落在我的肩上。

寫這書的內容要有其來源，這資料在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簡稱國圖館），於是我就在適當的時候前赴圖書館商量此事。圖書館給我裝在塑膠套裡的一個名牌掛在脖子上，有了這個名牌，就可以在這偌大的圖書館裡的任何地方走動，包括地下室的書庫。國圖館有藏書兩百五十萬冊，連台大的《青杏》及當時台灣各醫學院的學生刊物都有。這個圖書館就是後來成爲成大顧問的康明斯博士領導，不過我負起這個寫作責任時，康博士還不是館長。

大陸在文革時期有些科學期刊還是發行的，但文革時期與非文革時期刊登的文章，看前面的短文就一目了然，因爲在短文摘要（abstract）前都有稱讚毛澤東的幾句話，例如說，文革時期，患有不孕症的病人在治療後懷孕了，這也先把功勞在短文裡歸給毛澤東，使人讀起來忍不住要噴飯！

話說有一天我看期刊文章看累了，想站起來在大廳走走鬆鬆筋骨，當我在寬敞的大廳裡走動時，有一位年輕貌美的白人小姐走過來，說我很像她曾經認識的一位中國人，我謝謝她的恭維。在閒聊的過程中，我知道她是西岸史丹佛大學的歷史學博士班學生，名叫瑪麗（Mary Brown Bullock），正在研究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中國西方醫學的貢獻，她的研究方法之一，是追蹤協和醫學院

院畢業生的腳步，查明這些校友們現在佔據何種地位和影響。這方法也涵蓋在台的畢業生，所以她到過台灣，也見過盧致德、張先林等人，但有一些名字還是無法追蹤。她看到我掛著名牌在圖書館內可以到處走動，於是遞給我一個名單，請我幫她，如遇到這些人的作品就抄下他們的職位及負責的工作，因爲這名單上有名字但沒有工作職稱。我瞄了一下她遞給我的名單，一口就答應協助她。

我之所以答應她，是因

爲注意到鍾惠瀾、林飛卿等



Mary Brown Bullock教授。

喬大任教

165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164

她完成了博士班的論文。

等她博士班畢業之後，她把博士論文寫成一本書，書名叫《美國的交換計畫》(American *Transplant*)，是由加州大學印刷公司出版的。我替她校對了關於皮膚寄生蟲病的部分，所以她的謝詞上出現了我的名字。

這是一本頗為完整的美國教育以及西方醫學在中國如何生根的歷史書，裡面有特別開闢一章描述藍安生(John Grant)。藍安生是一位醫學博士，出生於寧波的傳道士家裡，畢業於密西根大學的醫學院，接著執教鞭於約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學。他在中國時已能操一口流利的寧波話，因此當洛克菲勒基金會徵人到北京協和去擔任客座教授時，藍安生當然雀屏中選。藍安生和其他的協和教師不同，他拒絕住在協和校內的教員宿舍，而與校外的北京一般市民同住，故在描述藍安生的那一章瑪麗的標題是：「無產階級的醫學家：藍安生」。

當瑪麗的書問市後，位在華府麻州大道的一位富翁開了一個慶祝會，在會場中我看到一個年約七旬的老婦人走來走去，等到她注意到我，就走過來問我在哪裡供職、研究什麼課題等等，言外之意，好像她還蠻跟得上時代的樣子。我禁不住問她：「你是誰？」她這才告訴我她是藍安生夫人，

名叫丹妮絲(Denise Grant)，法國出身，不過她只是藍安生第二任的太太，因而沒到過中國。她以前是一位水準很高的護士，當場我們的友誼馬上開花。

丹妮絲常常作客我們家，每次來我們家裡吃飯都會帶來禮物，有一次，她帶了一雙象牙做的筷子當禮物，那是古董，裝在一個漂亮且精緻、正面上方覆蓋以一層玻璃的盒子裡。她說這是北京協和的學生送給她先生的禮物，因為她用不著，一直放著也不是辦法，所以送給我。

這雙筷子做工很細而美麗，她回去後，正當我上下檢視它時，突然從盒子飄下一張名片，上面有楊文達敬贈幾個字。我知道楊文達是以前的台灣軍醫局局長，後來有一次我在台南機場會與他同機隔座飛到台北，我將這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他，他這才又記起在北京協和的那幾年以及藍安生的和平。他是協和的校友，要我借給他《美國的交換計畫》一書，這事遂傳為佳話。

瑪麗後來有飛黃騰達的職業生涯，她擔任過中國董事會的董事、美國中央研究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術交流委員會委員、威爾遜總統基金會執行長、美國喬治亞洲艾格納斯·史考特學院(Agnes Scott College)校長，以及現任的艾摩利(Emory)大學的中國研究講座教授。

## —與聯邦調查局人員鬥智

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人員是無孔不入的，他們的手法有時比共產黨的第五縱隊還要厲害，我也領教了一段時期，時在蔣經國訪美於紐約繁華區的觀光飯店(Plaza Hotel)受試圖暗殺後不久，這試圖暗殺的台灣人一共有兩人，一名叫黃文雄，另一人叫鄭自才，都住在巴爾的摩城。一九六〇年代因為華府地區台灣人很少，華府和巴城兩邊的台灣人遇到過年過節總是聚在一起，鄭、黃兩人也參雜其中，我也認識他們。

不久又加上了一個名叫陳平景的人，是在維吉尼亞州的小鎮開餐館的台灣人，據稱他是一個「強烈」的台獨分子。的確，他的來去用神出鬼沒四個字來形容很恰當，陳平景後來不見了，彷彿從美國蒸發而不知其去向。

話說，有一天我接到一個人的來電，要我某月某日某時到華府十四街與紐約大道交接處一家叫「假期咖啡廳」(Holiday Coffee Shop)的咖啡店見面，他自我介紹是馬弟遜先生(Mr. Matisson)，是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他把身上穿什麼顏色的西裝，以及屆時會在西裝領子的反面證明其身分等皆

交代得清楚。他的語氣是如此：我猜想他不應是一個騙徒而予拒絕，故我按時前去赴約。

馬弟遜先生穿得就像在電話裡所說，按時出現在他指定的咖啡店，握手寒暄之後，他就翻了右邊西裝的領子，那裡有聯邦調查局調查員的別針在閃爍著，我猜想他這個動作是必要的制式程序。

馬弟遜一邊進行見面的制式程序，一邊說他從未離開過美國和中國。

中國的報紙，表示他的語言能力是很強的。他問我去過哪些國家、參加過什麼學術會議、有多少個在東歐諸國（即共產圈沒有接觸過東歐代表等）。

那是初次見面，而上文所描述的也是他問話的內容，就此道別，好像沒什麼重要的事。

但隔了三個星期，馬弟遜來了第二次，這一次問的，就牽涉到我擔任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的事。

他透過我的人脈，問一些人的底細，弄得我有一點煩了，於是問他為什麼選我問這些，他答曰：「台灣同鄉會是台獨的外圍組織，聯邦調查局對台獨本身沒有特別的意見，但這外圍組織的成員最近在紐約公眾中使用了槍枝，想暗殺蔣經國，所以台灣同鄉會馬上被考慮是有暴力潛力的組織。你是華府華人的領袖之一，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你調查。」這些話從他們的立場而言是有一番道理的，但無論如何，我決心要把這事打斷，免得馬弟遜先生每隔一些時候就會找我一次麻煩。

這時恰好我被邀參加在葡萄牙首都近郊厄斯多勃(stori)舉行的國際干擾素會議，回程在巴黎落腳於位在凱旋門附近的飯店，把要辦的事統統辦完之後我想到拉法葉(Lafayett)購物中心買個上學用的皮包給長女岫清。我買完東西，坐地下鐵回來，下了地下鐵在月台上走了一段路，正想步出車站往住宿處走時，迎面來了久未見面的陳平景！幾句快速的寒暄會話，知道他離開華府後到巴黎開了一間禮品店，但他倒沒說清楚為什麼要離開美國到法國去，只說他不久後要到戴高樂機場飛往大陸見周恩來等話。我說我也正要到機場，所以在機場再見面後就相別。孰料巴黎機場大得不像話，我倆根本無法相見，就此告別。

回來華府不久，馬弟遜又打電話來相約敘談，地點相同；這次見面聊了幾句我認為無關緊要的話後，他突然問我最近有沒有見過陳平景？這使我全身的警戒機制都緊張了起來，因我從沒想到聯邦調查局的跟蹤手法與消息傳遞之厲害程度，馬弟遜這一問使我有昏倒的感覺。因為這個機警性，遇到陳平景的事我只好照實地全盤拖出，而馬弟遜則忙著把我的話一一記下來，當時我内心打斷馬弟遜與我的關係的決心愈形堅定。

我回喬大以後，想起免疫學博士班的學生當中有一個名叫格倫(Glen Wright)的聯邦調查員，

他的研究課題是有關鑑定已經歷時乾燥的血跡是人血或是動物血的方法。我回到我的辦公室以後，馬上請格倫來我辦公室告以始末，請他幫忙。他拍拍胸口說：「這事交給我辦就是！」(I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這麼一說，也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如何做法？反正馬弟遜先生從此沒找過我，倒是我在台灣的電視上見過陳平景及鄭、黃兩人呢！

我在桃園機場的黑名單可以用我抵達桃園機場國門時的「等一下」說起，「等一下」的歷史對我來說來得很唐突，也是富於戲劇性的一段，而且它開始與華府醫學會有關，是一段很值得紀錄的經歷。

一九〇〇年我擔任第四任的美國華府中華醫學會會長，該會有許多的會員利用我與台灣辦事處（以下簡稱辦事處）的關係，極力想組團回去過一段由適當的台灣單位出面招待，除了機票以外，都不必頭痛的生活。我則耐不住這多數會員的懇求，決定出面前往辦事處與之交涉，以成多數會員之美。結果經過一段折衝之後，竟然事成。

這整件事由衛生署與教育部出面招待，國際線的機票由團員自己負責，此外其他費用一概由上

述兩單位負責報銷。抵台後住在忠孝西路的天成飯店，在台北舉行一次學術研討會之後，大夥兒會搭乘一部巴士南下參觀當時國內正如火如荼推動的十大建設的重點，等到一大隊人參觀完中船後就結束行程回到台北。我成為這個團隊的隊長完全是由我是該醫學會主席的緣故。

這個團隊的構成成員很複雜，有一些是在美國上生土長的第二代移民的華人，有一些是經常往大陸跑而在大陸有某些成就的人，像當時常到故鄉無錫的高景泰先生是好例子，他的身分自然也使他成為這次行程的頭痛人物，辦理簽證需時特別久。除此之外，團隊中更有些是從台灣出去、在美國落地生根的人。

最後這個團隊終於成行抵台下榻在天成飯店，在台北的行程很忙，整隊人馬進進出天成飯店也頗為頻繁，各單位的參觀活動及學術交流排得滿滿的，因此人不在天成的時間很多。上面派了五個人提供我們服務，他們的服務無微不至，譬如說，你只要說一聲口渴了，服務人員一定有人下車去買可口可樂。那時因為礦泉水沒有那麼普及，可口可樂可以說是解渴的唯一妙品。

有一天，我們人不在天成，內人的弟弟有一包東西想託他姊姊帶到美國的朋友，但我們人正好不在飯店，於是他就在天成的大廳裡走來走去，想擬出一個辦法把這包東西交到他姊姊手上。就在

這時，他碰到天成的電話總機小姐走過大廳，因為兩人有一些面識，自然問他來天成有什麼事？他答以來找姊夫，她立即問他找的姊夫是哪一位？他照實回答是黃崑巖，她聽到後放低聲音告訴他說：「轉告團長黃崑巖，他的房間是滿佈竊聽器的，要小心說話。」這事傳到我耳裡後，我們夫妻之間的談話皆變成低聲竊語或乾脆改用日語，但我知道這是徒然的，情治單位有的是懂得好幾種語言的人才呢！

後來我們的大客車一路南下，參觀了台中港以及其他重要的十大建設。結果有人有感於幾位服務人員不辭辛勞的服務精神，於是提議眾團員每人出五美金給我全權代表全體團員，買一適當的紀念品留給各服務人員，聊表感激之意。我於是多了一項為團員服務的事項。

到了台北，向每人收集了五美元，準備去購買禮物，但團員中有從香港來的丁景耀與黎昌初等利誘我跟他們一起到香港一玩，說是有富人朋友準備一系列的週末參觀活動。我只好把買禮物的事延期到從香港玩完、回到台灣之後再處理。於是我們一夥人往香港玩了一個週末。

在香港玩了一個週末很是開心，但回到桃園國際機場，接受移民局入國檢驗時，承辦的小姐叫我「等一下」，這是返抵國門叫我「等一下」的第一。這時只見小姐拿我的美國護照往門後面的

房間進去，讓我在窗口空等了約五分鐘，她帶著我的美國護照回來，我問她：「什麼事？」，她回答：「沒事，同名同姓搞錯了！」

我要請問讀者，我的名字會有同名同姓的可能嗎？天底下會有用我這個名字取名的另一位父親嗎？我父親賜給我的名字是四十五劃的「黃崑巖」，是很少見的。

我對此並無太在意，反正我也只等了一下就進了國門，只覺多一點麻煩而已，結果還不是一樣地入境。但後來問題發生在衛生署，我先去仁愛路圓環現已歇業的遠東百貨公司，用大家捐的美元一口氣買了五張禮券，每張是台幣二千四百元。然後我帶著這五張禮券到衛生署找人交送禮券，出來接待我的是楊漢泉先生，我向楊副處長道謝這次的招待，並提出這些禮券，託請他叫給那五位服務人員，他立即問我：「哪裡有五個？」我說：「明明有五位人員服務我們的啊！」他說署裡只派了三位，其他二位可能是安全局派的人員！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是不是安全局也不關我的事，把五份禮券交給楊副處長便拂袖而走。

這三位或五位服務人員之謎、天成飯店的竊聽器，以及桃園機場「等一下」的連續事件非比尋常，並不是單純三個案件的串連，明顯可看出這是一連串情治單位的監視行動，尤其是「等一下」

三個字後來變成了我每次返抵國門時的歡迎詞就可窺一端。

「等一下」這句聽起來無心而且不起眼的三個字，卻是一九八〇年開始每當我返抵國門，在桃園機場聽見的第一句歡迎詞，說這句話的當然是人關查證的年輕人。

我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八二年間旅居美國多年。由於我出身於道地的本土家庭，所以對台灣的政治前途自有一番見解與主張，我心裡是覺得台灣人民該自決政治前途的，我也相信再小的國家與隔鄰的大國並非不可並立，問題只在周圍的大國會不會尊重小國的國格而已，所以我同情在海外奮鬥的台獨分子。但我並非政治激進人士，也沒有任何政治野心，所以雖然有上述意識，仍和駐美國大使館諸先生們來往甚篤，直至台美斷交，我駐美使館降格為代表處後，這關係也一直維繫良好，沒有想到這種關係卻成爲我回國通關時，一定得「等一下」的濫觴。

## ——幫忙林宗義教授——

一九七〇年代，現任二二八受難家屬代表的林宗義教授，頗具前瞻性地發起了一項被政府認爲

是台獨運動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林宗義教授是國際聞名的精神科學家，當時已由聯合國重要職位退休而執教於加拿大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特別敬仰他（請參照第七十三頁）。我住華盛頓特區多年，而華府是一個世界性的重要政治中心，林教授發起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非得在華府進行活動，否則效果不彰。我充分瞭解這一點，於是他在所吩咐的事在當時都一一照辦。這些瑣事，大都不外乎是糾集演講會的聽眾，或遊行的參加人群；我本人則有時參加、有時不參加他發起的這些活動。一九七二年四月某日，林教授曾在華府記者俱樂部大樓的一個房間召開記者招待會，那次我也受邀參加了。當時我駐美大使館有不少攜帶輕便攝影機的人，不斷地攝錄參加記者招待會的人士，我也因此上了鏡頭。

支持林宗義教授發起的運動的過程裡，使我最感深刻的，莫過於爲該會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紐約時報》上刊登的宣言，揮了久未拿過的毛筆。當時寫的是「台灣人民自決」這六個字，我自覺頗爲滿意。可惜林教授的自決運動經過時間的摧殘與各方的不停打壓，漸漸地無疾而終，後來就音訊全無了。另一方面，這段經歷則使我被政府劃歸爲台灣獨立組織裡的一員，無疑地，對我後來上黑名單也有加分作用。

# VOICE OF THE CONCERNED TAIWANESE

April 1, 1972

## 台灣人民自決

### 認識艾琳達

提到「黑名單」，那麼就非得順帶一提我與艾琳達(Linda Arrigo)相識的經過，因為這件事也是使我登上黑名單的原因之一。

我有一位台大醫學系的同學，當時已是位自行開業的名醫，他的唯一缺點就是拙於語言，尤其是外文，當然這裡指的就是英文。一九七七年有一天，他想雇一、兩位隨身的外國人住進他陽明山的別墅裡，以便二十四小時的學習英文會話，於是請我代為留意找尋。那時我初回國擔任台大醫學院的客座教授，在台灣的人脈、尤其是老外圈子可說極為單薄，唯一的詢問管道是維拉(Thomas Weller)。維拉是一位約翰斯·霍浦金斯大學的研究生，他是我負笈美國時的指導教授的外甥，當時來台寄讀於台大社會系，並蒐集他的論文資料。有一天，我打了個電話，問他是否有意接受這份工作，他以沒有時間婉拒了我的建議。不過他介紹我一位女性友人艾琳達，說她一定幫得上忙，因為她的人脈很廣，而且富正義感，樂於助人。

我起初並不曉得艾琳達是誰，本以為她是義大利或西班牙人，後來才知道艾琳達是愛爾蘭裔的

入黑名單之列

179

We, the Taiw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semble here in Washington today to protest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of February 27, 1972 and wish to make it known that:

(1) Taiwan (Formosa) has been ruled by many alien masters: the Dutch and the Portuguese, the Manchus, the Imperial Japanese and Chiang Kai-shek. The people of Taiwan reject the possibility of once again becoming pawn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2) Taiw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 Taiwan is, and has been, a separate entity with fifteen million people who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unique and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 Chinese; and

(3) Taiwan belongs to the Taiwanese. We believe i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us, only the Taiwanese can end will decide their own destiny. Neither Mao nor Chiang should have any legitimate right in this matter.

Dear friends of the world--  
How many more men should die, such as in Northern Ireland?  
How much more shall we suffer, such as in Bangladesh?  
How much more blood should be shed, such as the massacre of Taiwanese leaders by Chiang's occupation forces in the February 28th Uprising of 1947 in Taiwan?

"No peace can last, or ought to last, which does not recognize and accept the principle that 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right anywhere exists to hand people about from sovereignty to sovereignty as if they were property."

--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

I would like to hav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  
 I am enclosing a contribution. Check payable to: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P. O. Box D  
Kearny, New Jersey 07032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1972年4月，刊登於《紐約時報》上的宣言。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178

美國人，她的父親是駐台美國顧問團的軍官，她本人則正在台灣某大學攻讀台灣的社會學，獨自住在公館的一棟住宅裡。我曾經和她及另外一位外國友人進餐閒聊，發現她會講流利的中文及閩南語，這使我那位想學英文的同學放了心，因為不必為了談條件比手劃腳。她的社會正義感很強，是一位倔強的民主鬥士。

不久後，我便見到了艾琳達為我同學找到的老師。有一天深夜，我拜訪了住在陽明山下的另一位台大醫學系同學，他極力主張即刻邀請上述那一位同學來聚聚。而那位同學出現時，便為我們介紹了隨行的古柏格 (Goldberg) 夫婦。這對年輕的白人夫婦顯然是艾琳達所介紹的。

讀者或許有印象，艾琳達曾與施明德結婚，在其後則發生了高雄美麗島事件。這些背景使艾琳達搖身一變成了不受歡迎的外籍人士，而遭當時的台灣政府驅逐出境。但她從台灣被驅逐回到美國的時候，也是她在旅居美國的台籍異議人士中名望升至最高的一段時候。我因曾與她有前述直接的接觸，瞭解她的本性，雖然我不是激烈而公開的台獨分子，但對艾琳達的處境別有一番感觸。所以艾琳達在美國各地巡迴演講至華府時，我特別到了華府機場歡迎她。當天約有一百位歡迎人士，裡面當然又摻雜著帶攝影機的台灣政府外交人員。

很難想像在這一百位左右的接機者當中，艾琳達竟只認識我一個！當她認出我在人群中時，馬上兩手攤開，口中叫著：「黃醫生！」熱情地跑過來擁抱我。如此一來，我便極其醒目地上了那些拿著照相機的人們的鏡頭，我的名字也就「正式」地成了那些黑冊子（機場的本子真的是黑色的！）裡的名單。相形之下，我們在家裡為艾琳達開的招待會似乎微不足道了！

諸如此類造成「等一下」的事件其實還很多，但上述兩件是值得一提的大事。

## —與情治單位父手—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我帶著探險家的心情，按約到成大訪視，這是當時夏漢民校長的提議。此舉頗類似國外招攬各層級人員時，必須經過的面試程序 (interview)，與舊時結婚前的相親相似。當然，相親並不是單行道，我被“interview”，但也可以看看成大的現況，例如經費來源的確實度，以及台南地區的社會環境，到底需不需要動用五十六億新台幣來蓋座醫學中心？它對該地區的經濟生態會有什麼衝擊？最後還得考慮家人、家務與公事的處理問題，這些都不是非同小可的

事，它們攸關我一輩子生涯工作跑道的轉換問題，必須嚴肅以待。

此外，「等一下」的故事也在當時繼續發酵不已。我回美國不久後，住在新竹的二哥打了越洋電話告訴我，新竹團管區有人來家裡詢問我返台的動機與緣由。那時的越洋電話很貴，除了婚喪大事之外，我們家並沒有以越洋電話閒聊或交換普通消息的財力。我覺得莫名其妙，新竹團管區兼辦情治事務，一個黑名单人物的行蹤情報，卻要訪問當事人的家人才能得知，未免顯得太笨拙且不專業了。

我當然很生氣，胸中一股怒氣不能扼抑，決定採取兩個行動。一是寫封長信，把上述黑名单的事件以及在機場受到的「接待」，一五一十地告訴夏校長，使他對這件事有所瞭解。而後來的演變，也證明了夏校長對我的堅強支持心意。

我採取的第二個行動較為複雜。五月的某一天，我打了一通電話給台灣駐華府代表處負責安全工作的主管，當時這個職務是由曾涉入江南案、後來擔任安全局局長的汪希苓執掌。汪先生和我本來就面熟，是普通的朋友。因為我相信他知道我的「底細」，並在此事上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決定打電話約他吃飯，好停止那惱人的「等一下」。

會面地點在華府近郊貝塞斯達的銀宮飯店。我直率地告訴他有關「等一下」的始末，包括新竹的家人受團管區探問的種種困擾。汪先生靜靜地聽我講完一切後，簡單地答覆我：「你先不要生氣，我會替你解決這個問題，也滿足成功大學延攬你的苦心，請等我的電話。」

大約一個月過去了，華府已是春末的景色，汪先生果然打了電話過來，又約我在貝塞斯達的銀宮飯店吃飯。一見面，汪先生就開門見山地跟我說：「黃教授，我剛從台北回來，你的事我已經一切辦妥了，請你放心地回台灣去吧，沒事了！」我心裡還是半信半疑，因為我知道要被列上黑名单是經過長時間的考慮與過濾的，一筆勾銷並不容易。但汪先生既然很誠懇地這麼說，我也就相信而接受。那一頓午餐吃得很愉快。

「等一下」的困擾似乎是這麼解決了，但成大醫學中心計畫的執行秘書聘書卻遲遲未到。延遲的原因另有文章，是汪先生的力量所不及的。因為我沒有向他提起，所以他沒想到在那一管道也有下功夫的必要。兩年後，我自付兩年「試用」期限已到，必須做下重要抉擇，夏漢民校長爲了說服我留在成大而透露了這麼一句話，他說：「我從來不曾爲了任何一個成大的教授去過警備司令部，只有一次是爲了你。」我才明白一九八二年我的聘書延遲，是因警備司令部另有意見，那時的司令

是陳守山將軍。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我攜著行李抵達桃園，過關時沒有再聽到「等」這個見面詞，我像一把熱呼呼的刀子切奶油棒一樣，順利地入了境。

但黑名單的故事沒有就此結束。我的秘書在幾年以後告訴我，她那時必須負責每月報告我的行動一次，以利相關單位全盤掌握我的活動。這簽的報告前後共持續了兩年之久，可見那雙看不見的手還是沒有放我自由，監視的雙眼還是投在我身上。

## 「等——最後的——一下」

「等一下」後來也衍生出一件趣事。

有一次，我和內人到香港渡週末，回台時改由高雄小港機場入境，而沒有經過桃園機場。那時小港機場的建築設備還很簡陋，入境的旅客排成兩條長列，附近咫尺之地也沒有辦公室，這會累壞入境處官員。最糟糕的是我老遠望去，工作人員正在翻閱豎立在眼前的黑名單，並與每本護照仔細對照。

細對照。當時桃園中正機場的入境手續已經電腦化，但高雄小港機場入境手續的電腦化未能同步，還在用人工翻閱黑名單的老方法。我心想，汪先生雖然輕易地把我的名字從桃園機場的電腦中刪除，但他可能沒想到台灣還有一個高雄小港機場！

果然，輪到我通關時，當班的小姐一翻閱名冊便說：「等一下！」我於是又站在櫃檯前空等。因為當時的小港機場設備較為簡陋，工作人員必須跑到牆角打電話。幾句寒暄之後，我聽到的是：「沒有嗎？我這裡有，你那裡怎麼沒有？」我心裡揣測我的預料是對了。桃園中正機場的名冊在電腦上，我的名字已由汪先生刪除了，但他忘了將老舊的黑名單上我的名字刪除。

這次經驗對我的自尊心傷害很大，我因此和內人說，以後回台灣不在小港落地，寧願由桃園入境，忍受地遠之不便。但她認為這是一件小事，雖然得「等一下」，後來終將順利入境。於是乎第二次到香港我們又決定由小港入境。大排長龍之際我偷偷往前一看，當班人員還是一個個以人工翻看著黑名單。但出乎意料地，輪到我時，出入境人員並未翻閱黑名單即截了印讓我通過，我心裡也頗覺詫異，說了一聲謝謝就拎著行李走向樓下海關。等我把手袋及托運行李放在檯上準備受檢，無意中向後一瞄，看到剛才讓我無條件入境的男性出入境人員，從樓上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下樓梯，正

在四處張望。我看他如此辛苦，值得同情，就主動走向他，並把名片遞上說：「你在找我嗎？我姓黃，我是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的院長。我一年要出國七、八次，請你不要找我麻煩好不好？」

聽見我這麼堅決的口吻，這位工作人員立刻回身消失，以後再沒有「等一下」的鬧劇上演了。

我手上現在還保存著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成大當時的主任秘書李茂雄教授為我具保寫下的文件。我對他的好意及信任表示由衷的敬謝。

## 訪問中國大陸

簡單地說，一九八一年的情勢有其特殊的地方，那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剛近尾聲，紅衛兵想要鬥的、破壞的，都照毛澤東的意思完成了工作，但大陸還是一看就是一片白襯衫、灰褲子的時代。

當時的統戰部特別活躍，做得有聲有色，是大陸全力拉攏旅居在美國台灣學者的時代。

所以，一九八一年的年初我接到上海第一醫學院（後改成上海第一醫科大學，現已併入復旦大學，不復單獨存在）肝病毒專家聞玉梅的電話，邀我前赴該校講學一個月。這並非一件稀奇的事，接到這個邀請，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覺得這個全家造訪中國大陸的機會是一生難逢的，故予以接受，約定的時間是當年六月成行。

## —不要買禮物—

那時候訪問中國大陸是很少聽到的事，大陸的統戰做得很周到：第一、護照沒有普通的簽證，簽證是一張紙；第二、由中共政府國務院發了一封信，叫我經常帶在身上，上面寫著：「這一位是國賓，所以機場與港口的檢查請從簡」等語，語言都是白話；第三、我在上海第一醫學院期間，與家人住的飯店是上海當時最好的飯店之一——錦江飯店。上海錦江飯店的中庭有一棟別致的一樓房子，是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時與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之地點，所以該飯店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在上海期間招待得無微不至，除了錦江飯店之外，還包括一部車子及司機。第四、訪遊了各地，在中國大陸一個月，我們全家都被帶至上海、浙江杭州、北京、陝西西安等各地參訪；第五、親自招待我們的有外交部、統戰部、衛生部等重要單位。

但每天趣事連連，無法在此一一披露，要另寫一書才能盡述。我為了表明沒有做無可告人之事，故事先已獲得我們台灣駐美辦事處對我大陸之行有所諒解，只是他們要我蒐集所見所聞，在抵台北後會有安全局姓項之先生找我簡報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的幾天，在天安門旁的北京飯店，我們不意遇到了惠美已闊別了二十五年未見的堂妹，她的夫婿是華人有名的數學家項武義。大家異地重逢，故興致特別高，約好次日一同共進早餐。次日依約碰面，項教授卻拿出一報紙指曰：「你這樣子還敢離開大陸之後往台灣跑嗎？」項教授知道我當時已經經由宋瑞樓教授在台灣安排好，七月二十九日要在台大演講，現在顯然有新的局勢發展，要我小心。我心想是誰死了呢？一看報紙，是卡內基大學統計學教授陳文成從台大的圖書館墜樓身亡的消息，這使我不禁楞了一下，決定往台灣之事三思而後行。

我依照原來的計畫，惠美與三個女兒早我三天離開大陸回台，我則於三天後，即七月二十一日抵達香港，住進希爾頓飯店。我們事先約好，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整，由惠美從台灣打電話給我，講好如果台灣的局勢不利我回去，就說「禮物不要買了」，如果政治氣氛還可以允許我回去，就說「記得禮物一定要買」，這個暗語一定奏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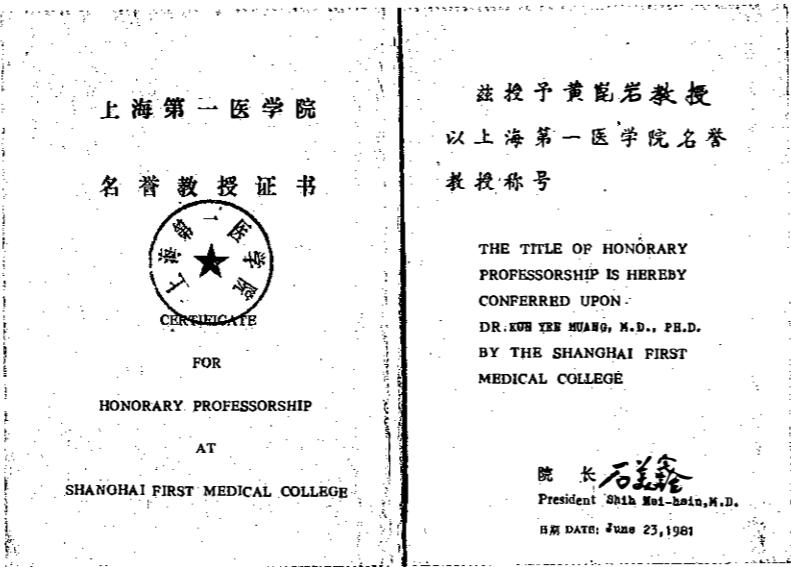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一日，我住進香港的希爾頓飯店，下午兩點整，電話真的準時鈴響，我拿起話筒，惠美的判斷與我的預料一樣，說「不要買禮物」。這一下子，因為不再回台，飛往東京之前多了一天無事可做，所以我去逛了澳門一趟。據說項先生在台北到處找我無門，不知如何是好。

## 林飛卿與榮獨山教授

當時中國上海第一醫學院的院長叫石美鑫，是一位心臟外科的專家，我和他相處得不錯，有一次還到他家作客呢！但印象最深的是林飛卿與榮獨山兩位教授。

我因為有和瑪麗的軼事在先（請參照第一六三頁），所以對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生的名字特別地熟。台灣曾有一位往北京協和醫學院學醫的人名叫顏春輝，他還當過第一任的衛生署署長，他在協和醫學院畢業後會與林飛卿教授共同發表過有關傷寒菌的論文。林教授與她夫婿榮獨山都是協和的校友，據說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時都受了不少苦，但詳細事在此不說。林教授在她的微生物科裡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存在，為人極為謙和，我從她身上學了不少做人的秘訣。

榮獨山是一位放射線科醫師，曾經寫了教科書一套，他是個短小而精幹的男人。林、榮兩位教授與我碰面時已經頗老，但榮教授仍喜歡與小孩子混在一起，有一次我們一家人到他們家裡作客，榮教授還一件一件地拿出他收集的古玩與我們的女兒們玩。我當時覺得這些古玩經過了文革時的浩劫未曾消失而仍舊存在，這麼一說，文革打倒孔家店算是只成功了一半。榮教授是西安事變後為蔣



筆者獲上海第一醫學院名譽教授的證書。

介石照大腿部X光片的一位；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時從窗口爬出往後山跑，在從窗口爬出去時重重地落地，因而需要醫師的評估。這事從榮教授的口中一道來，特別津津有味。

後來聽聞教授傳來消息，林、榮兩位教授皆已辭世了。

一九七七年，現已去世的台大內科醫師莊哲彥教授剛好在喬大做一年的研究員，喬大那時有一位名叫荷莉安席德（Hollinshead）的女教授在生化學科做研究工作，做得還蠻有名的，在免投學界大致還算出名，而且同道，故莊教授就選擇她為指導教授。莊教授的經費來源是否是荷莉安席德提供的，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

有一天莊教授到我辦公室來閒聊，語中透露了一個消息。那時台大醫學院的院長是李鎮源教授，但他的任期將於一九七八年，即翌年屆滿，台大正準備交棒給新的院長，但新的院長在哪裡還是個問題。於是七年制的同學就組織了一個地下組織，這個組織的基本主張是下一任台大醫學院院長應該出自七年制的畢業生。組織的成員及指導教授皆指名道姓，都是我的朋友，但為了避免料想不到的後遺症，故在此用以假名稱謂。

莊教授的意思是，我在喬大做得不錯，品格也好，聲望俱佳，故擬向地下組織推薦我為候選人，但這建議要徵得我的同意。對這建議，我說就由莊教授裁決，我沒有特殊意見。但我內人是不太同意我的看法的。



右二為莊哲彥教授。

台大醫學院院長

也歡迎我回去，而喬大方面則也可以有一年的休假，因此我做了一個決定回台大半年。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帶著我的行李，先到日本的九州大學作了一個日語的演講，然後就搭機飛往台北。抵達台北後，先到B教授處報到，第二天我就去見了A教授，A教授語多鼓勵，對當時醫學院現任的各教授則不吝氣的批評很多。他表示，台大醫學院的裡裡外外都是由他背後操縱，而且他的意見有直通台大各屆校長的本領。我心想，那應該由他擔任台大下一任醫學院院長不很適宜？不管如何，當天談了不少話，A教授以等他電話通知而結束談話，並表示由他帶我見台大校長最合適。

不料過了幾天，A教授還沒打電話來倒是另有很大影響力的C教授夫婦邀我到其陽明山的別墅過週末。因為他夫婦語氣誠懇，我只好接受邀請。陽明山上的深處有一公園，當時公園內還有一咖啡廳，第二天是禮拜天，我與C教授夫婦在那咖啡廳喝咖啡時，只見C教授太太用肘關節提醒他把話題轉移。這一信號顯然馬上奏效，C教授正式打開了話匣子，他說台大醫學院將換新院長，他已經去刺探在紐約做事的某教授，結果這位教授婉拒了這個建議，並且反過來建議他來和我談談今天來陽明山主要的話題就是這事，如果我不拒絕這個建議，他就準備帶我去見台大校長。

我並沒有當場決定我的去從，但我的未決態度對C教授來講等於是默認了這個建議；我也比較了C與A教授，認為在行政上由C教授安排我去見校長較為合理，所以也答應了由C教授安排。過了幾天，A教授不曉得從哪裡知道了C教授正在安排帶我去見閻校長，不知是生氣還是賭氣，他從此未曾跟我提過一句關於安排見校長的事。

倒是C教授來消息說已定好某月某日與校長見面，到了當天，他用他自己的車子陪我到羅斯福路的校本部去，在車中他再三叮嚀這次見面不要由我提起醫學院院長的事，只與校長談天氣等與院長職位無關緊要的事，十分鐘左右後我就先行退場，由他來繼續會話。我當然遵守他的建議，與校長寒暄之後，按照與C教授的約定，十分鐘左右後就告辭，到外面的車子裡等候他。頃刻間，C教授很高興地從二樓下來坐上他的車子，並告訴我一切都是順利。只是閻校長不認為院長人選需要到美國去找，所以需要一個順水推舟的作法。C教授建議我去請教陳奇祿先生，陳奇祿是台大的考古學家，而且是國民黨當時的秘書長。我約他在仁愛路當時的首都餐廳吃西餐，他的回答是像台大醫學院院長這個職位不會扯到黨部裡去，於是這條路就斷掉了。

## —竹中校友的聲援—

不久，已屆陽曆的歲末，周宜旋同學不知從何處嗅到我可能當台大醫學院院長的傳言，他對我說這種事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非活動不可，於是想到的是周應龍。周應龍是竹中校友，當時也是蔣經國的秘書室主任，而蔣經國是行政院院長。我曾經有鑑於台灣交通很亂，曾對周應龍說過，如果我回台灣而無法找到醫學院院長的職位，就乾脆回來當交通大隊的隊長，整頓一下台灣的交通。周宜旋於一九七八年一月某日，在台北車站前的希爾頓飯店開了兩桌酒席，那天晚上出席的是支持周宜旋的竹中校友，以及包括辛志平、彭商育等遠道從新竹請來的竹中前老師與校長。

想想，那天晚上聚餐的目的誰都知道，每一個人也都知道他要講的台詞及扮演的角色，不知底細的只有周應龍！餐會開始，從天氣講起，再加上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題，然後由辛校長帶頭談起我的事情，最後辛校長向周應龍說：「應龍，你可以做一點事！」周應龍說：「我可以做什麼呢？頂多是請蔣先生引見黃崑巖。」這話正中周宜旋等人的下懷！辛校長就說這是不錯的計畫，於是那天周應龍就要我等著行政院打電話過來。這使得好幾天連廁所我都不敢去，守住電話不放，結果當

年一月三十一日行政院真的來了電話而成事。

## —會見蔣經國—

我前後見了蔣經國兩次，第二次見他是成大校長夏漢民安排的，第一次見面是上文所提的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由周應龍安排的一次。我到行政院見他前曾拜訪了三個人，分別為C教授、D教授及E教授；C教授說要整建台大醫學中心，D教授說要給予權力解散認為不適任的教職員，E教授則說請准台大醫學中心擴大編制。有鑑於台灣的公務員不容易解職，D教授的要求真的是有情無恩。到了約定的時間，只見周應龍突然出現，告訴我什麼都安排好了，約見時間是十五分鐘。

我進去後只見蔣經國的桌上放了我的履歷表一份，話題繞著我的故鄉後龍轉，也提到後龍的西瓜，他還提到三軍總醫院及榮總等，但就是不談台大。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話題轉到台大醫學中心，把C教授的意見陳述，他又問：「台大那麼老嗎？」我說：「您每天都會去對面的黨部開

會，也去過台大醫院，您應目擊過台大多老邁才對！」

看一看鐘錶，已過了約半個鐘頭，超過預定的十五分鐘很多，但台大院長的事卻隻字未提就結束了這次會面。等我從蔣經國的辦公室出來時，周應龍又像幽靈般出現，讚許本來說十五分鐘結果談了三十分鐘，不錯！並說他會向教育部下一個條子。但台大院長的事，就從此杳無消息。

就如上文所說，一月二十一日我依約見了蔣經國，可是，二月時台大的魏炳炎附設醫院院長要向全體醫院同仁，包括學生講講關於回國這半年對母校的觀感。率直是我的本性，我認為一個人有什麼感覺就說什麼感覺，有什麼觀察就說什麼觀察。我準備了講稿，講稿到早上三點鐘才寫完。我給了當時擔任內科總住院醫師的陳耀昌醫師一份稿子，並畫以箭頭標示改換下一張幻燈片，免得我還要做出換下一張幻燈片的要求，目的在增強演講的戲劇效果。

結果來聽我演講的什麼人都有，連周宜璇、方友文等竹中的校友也來了，媒體人士當然也沒缺席，把偌大的台大醫學院第七講堂擠得水洩不通，就連走道也有人坐。我演講的重點在一、健康的教授治校制度，這與李遠哲的教授治校有此差別；二、封建思想瀰漫整個醫院，應予糾正；三、應傾聽基層醫師的心聲，以加強團結；四、加強學生的教育；五、糾正紅包的惡習。我留了大約

二十分鐘時間與聽眾交流，印象最深的是院長說了一句：「黃教授講的都對，我也想做點事，但不知從何做起。」結果，一位較為年輕的老師站起來指著院長說：「不知如何改革就不要佔據這職位！」

那時報禁還沒解除，但媒體還是利用我的演講內容，有的大幅報導，有的還加以扭曲攻擊台大醫院，這種報導持續了約十天之久，對台大說來是空前的大事件。魏火曜先生當時為校本部的教務長，這消息從媒體、從魏先生那裡，遲早都會傳入台大校長的耳朵，因而我在他們的眼中成了一個異議分子，不是改革的原動力。

台大醫學院院長之事從此煙消雲散，內人惠美也堅決反對我回台大，認為我與以前的老師們相處會花去不少時間與精力。我當年三月一日回抵華府的家裡，前後陸續收到六十幾封的信，語多讚賞我回台大時掀起的教學熱潮與新知，其中最使我感動的是有人說：「您在台大的半年，像布拉格之春呢！」但我內人堅決反對我回台大與老一輩的教職員周旋，在她的眼中，到台大是註定會鎩羽而歸；她保證如果我再成熟一點，而台灣另有這一類機會的話就讓我去。我知道這是安慰話，但誰料到不出幾年後會有成大的新機會！

台大後來決定了接任院長的人選，他不是七年制畢業的台大校友，而是我們的老師——彭明聰教授。彭教授是彭明敏先生的家兄，而且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無疑是適當的院長人選。

## —厄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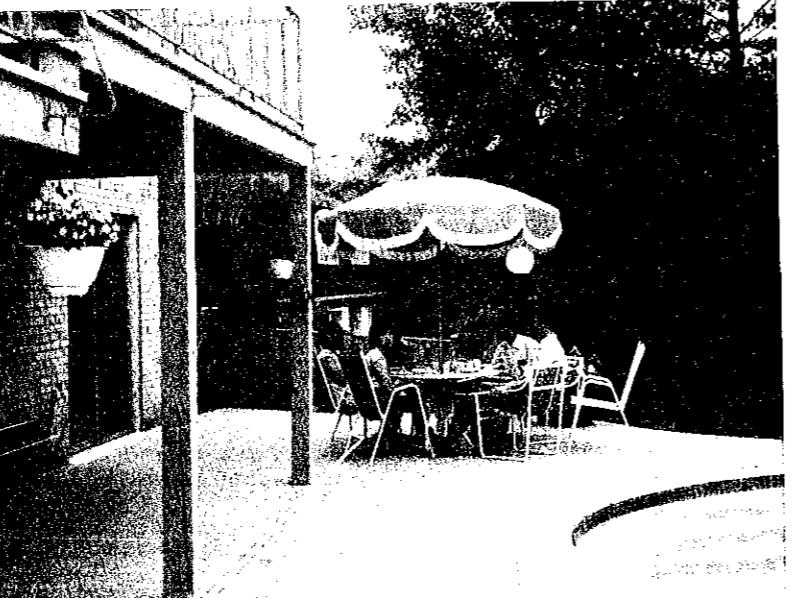
我既然經過一番生涯的驚濤駭浪，也該好好休息一下了。我想到我們於一九七四年搬到維吉尼亞州維也納的家後院蠻大的，可以容納一個游泳池，於是立即請了私有游泳池的設計建造專家來看，確定沒有問題後就動工挖了一個游泳池。這個游泳池帶給我們家人多少運動機會，實在難予估計，那一段時候，我們從未感覺過華府近郊夏天的天氣悶熱，因為下班一回家就把衣服脫掉換成泳衣泡在泳池裡，一家人就連吃晚餐都在池邊，絲毫感覺不到周圍悶熱的天氣。

很多外國的醫學院學生也常到我家裡度週末，其中上文提過的唐·卡龍就是其中之一。泳池到了冬天就把它蓋住，任冬天霜雪降下，荒涼它一季節，到了春天又把蓋子拿開就是。

當年年初內人惠美卻有了一個病徵，腸子裡面長了一個東西。住在華府近郊，很早即出國的女

院士兼科學家彭汪家康醫師，她的父親是一位風水師兼中國傳統的易經專家，根據他的說法，當時我們後院挖了一個洞蓄水當作游泳池，沒有選擇黃道吉日就開工，因而亂了命運的脚步。一九七九年的確是我們家的厄年。

不管如何，我和惠美講好，如果切片被診斷為惡性腫瘤，為了做更大的手術把直腸癌拿乾淨，會帶她到紐約的Sloan-Kettering癌症中心，該中心有我的好朋友安士壯(Donald Armstrong)醫師，因為靠他的面識，我們取得了看醫師的預約。安醫師訓練了不少台灣的感染症專家，在不久後也當了



美國房子的院子與泳池。

美國的感染症醫學會會長，是一位頗為有名的醫師。就在他的指導之下，終於找到願意為惠美開刀的醫師，是姓關的華人。因為這是大刀，又出血不止，故同一天開了兩次刀才保存了一命。但內人惠美腸胃生理改變，苦了她的餘生。

就在惠美入Sloan-Kettering的時候，發生了白修德故事的餘波，已在前文陳述。

話說這期間我得來往華府與紐約之間，我在華府時，三個女兒的飲食都得由我下廚，凡是擀水餃皮、燒菜都得親自動手。但我不在華府時怎麼辦？那時喬大的生化學博士班有台灣來的留學生胡淑光同學，這位女同學長得優雅且舉止有大家閨秀之風度。我開口請胡淑光幫忙，她一口就答應。她是一位很負責的人，後來與一位名叫劉吉祥的年輕科學家結婚。

後來我在成大的某一天，胡淑光突然打了一通電話給我，那是從新竹的科學園區打來的電話。透過電話我才曉得她的夫婿劉先生已回台北工作，現在住在芎林，而芎林正是我們全家疏開時期的荒涼住所。最使我驚訝的是，她患了胃癌，經過外科手術及化療才從幽谷裡走回來的。這給我一陣打擊，似乎我內人惠美的不適移轉到她身上似地。

淑光也訪問過成大，我的秘書李美穎小姐也見過她，她給李小姐的印象也不錯，我和內人也去



胡淑光教授與其夫婿結婚照。

台大醫學院院長

203

過芎林她家拜訪過。她最後搬到上海去了，從上海曾來有音訊，料想她倆在那裡一定稱意，我只能遙祝她的健康無恙。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202

#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一九八二年，即訪問大陸的翌年，我受邀回台灣創設了成大醫學中心，這段歷程因為另有回憶錄一本，故不再贅述。

但在成醫的創設期間，值得補提的是母親的辭世，時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四日，在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開始運轉的三個月前。

## —清華大學的機會—

一九九〇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通電話，是有關新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問題，電話是清華校

內校長遴選委員會的F教授特地打來的。校長的遴選要經過校內與教育部的遴選委員會遴選通過，這是現時的校長遴選常規。F教授在該委員會中的地位重要而特殊，他打這通電話是不尋常的，但在清華之前類似這樣要我寄履歷表競選校長的其他學校並不是沒有。

清華的F教授提出來的誘餌特別有吸引力，第一、清華的校長梅貽琦曾經是我內人在台大時的病人；第二、清華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可溯至民國前一年（西元一九一一年）的「清華學堂」，最初醞釀是在前清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間。我國駐美公使梁誠因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有「美國所收庚子賠款原屬過多」之語，一方面向美當局勸請核減，一方面上書清廷請以此款設教育才。中間雖因發生粵漢鐵路廢約之關係而生阻，但梁氏努力不懈，卒得美國國會之贊同，將處置賠款全權付與總統羅斯福。照條約我國應付美國賠款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經總統決定將當時尚未付足之一千零七十八萬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從一九一九年一月起退還我國。民國前三年（宣統元年，西元一九〇九年）為美國退還賠款之第一年，外務部與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商定學生遊美細則後，會同學部奏請設立「遊美學務處」及附設「肄業館」。六月初四日遊美學務處奉准設立，派外務部丞參周自齊為總辦，主事唐國安及學部郎中范源廉為會辦，

駐美公使館參贊容揆為駐美學生監督。初質北京東城侯位胡同民房一所為辦公處，後又遷入史家胡同，九月奏准將北京西直門外「清華園」作為遊美學務處興建「肄業館」館舍之用，是為清華得名之始。這一段歷史使清華有別的學校沒有的歷史羅曼史，且長久以來我對歷史就很感興趣，所以特別嚮往，再加上D教授的說服，使我特別心動。

於是我把這事提向內人惠美商量，尤其是美國國籍的問題，因為按照那時的法律，台灣的大學校長是不能有美國國籍的，連雙重國籍都不能有。經過深入的討論，如果需要放棄美國國籍，則我可以放棄，等以後這個規定取消，再申請恢復即可。美國國籍對我來說是需要的，這也是當時回台灣時，我口頭上對三個女兒的承諾。

該年春天校內遴選委員會通知我去與委員們見面談談，我依約赴會。該委員會成員包括李遠哲、張忠謀、現任元智大學校長彭宗平，以及現在已經記不起來名字的幾位教授。我覺得當天的面談進行得還可以，因為事後站起來，李遠哲曾經走過來握我的手並說：「我應該早一點來和你談談。」記得那天所談的多半是教育如何拓展的問題，接著由當時的沈君山校長等人說明清華的現況及將來的展望，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節目就是與同學們見面，在一個大階梯教室舉行，那間教室可

以容納三百人左右。這個會由同學主持，由同學發問，我記得他們關心的第一個問題是宿舍的安全問題。這個問題我也很關心，只是沈君山校長當時並沒有帶我去參觀學生宿舍，故無法確切地回答，我只說：「我是點子很多的人，而且你們的安全是我所關心的事，所以關於這一點等我到任後一定會有合理的解決。」

### 打亂決定的法案

但好事多磨就是指這類事吧，我從新竹回來後，有朋友急忙告訴我，美國的柯林頓總統投下了一個深水炸彈，使我們家庭會議的上述決定岌岌可危。原來，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凡是美國公民，且有年收入十萬美元，以及擁有五十萬美元財產的人，如果放棄美國國籍即認定為逃稅行為，一旦被認為是逃稅者，以後他放棄的國籍絕不能恢復，甚至連拿簽證踏上美國國土都不會核准。這是很大的一顆炸彈，而且來的真不是時候！我為了確認此事，還去函住在維吉尼亞州我老家附近的二哥蒐集一些資料，結果他立即傳真過來一篇《富比士》(Forbes)雜誌刊登的柯林頓簽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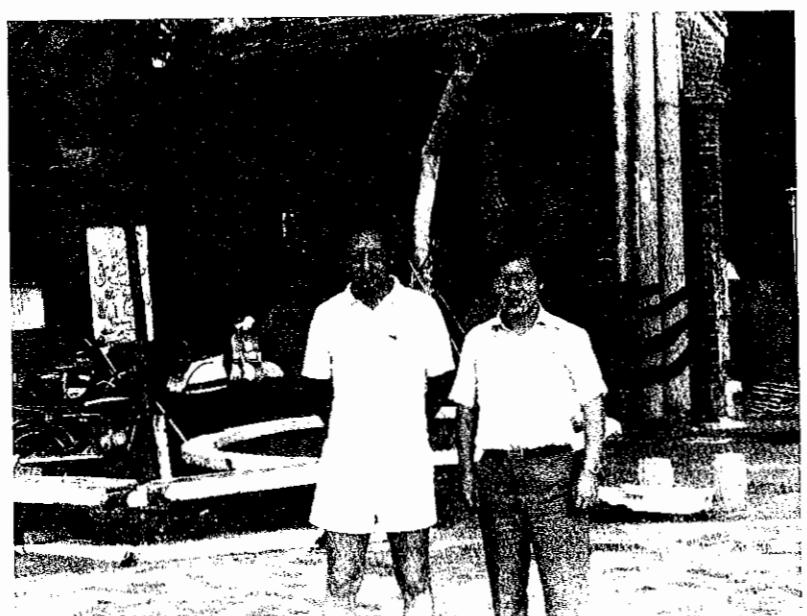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案的消息文章，該文的標題居然是刺眼的「And Don't Come Back!」（休想回來）。這是一顆真實的炸彈，這顆炸彈不得不使我對清華校長的職位重做一次徹底的三思，原因有三：其一、我一九八一年回台時對家人有口頭上不成文的允諾，等我退休之後必回美國，享受天倫之樂。其二、清華是名聞遐邇的高等學府，培育過諾貝爾得獎人的學校，萬不能有去不了美國的校長來領導它，這會產生不少校務之遲滯，在競爭激烈的國際高等教育上會對清華極為不利。其三、根據我守法的個性，前面兩個理由，即我國內對國立大學校長國籍問題的規定以及柯林頓簽署的法案，對我而言，皆是要人人遵守的鐵則。注重守法的我要是中選，非請清華或教育部想出個婉轉的辦法來迴避不可，休想正面及冒犯或做個假動作以掩蓋身分。

我因為這事請教了夏漢民校長，他的回應是：「法律歸法律，現實歸現實，你最好先放棄美國國籍，接受清華校長職位後再見機行事。」但我幾位好朋友卻持反對的態度，認為這事不能當開玩笑看待。我比較守法，只好另想辦法，但後來情勢的演變證明，前面一群人所說的與美國社會的現實主義相符。

話說遴選的下一步驟是教育部的委員會，我於該年初夏，依照通知時間到教育部面對教育部的



筆者與楊憲桂教授合影。

與清大校長失之交臂

委員會。時間一到，我步入房間，見到的有田長霖、楊朝祥、羅銅壁、郭南宏、周昌弘、施振榮等面孔，委員共有七人左右，不是院士就是各界的名人，都是一流的人才，所談多半是大專教育該如何定義與定位的問題。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後，其中領軍的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表示時間已經談得差不多，委員會面談結束，全體委員就站起來要散會的模樣，我卻請他們又坐下，邊做手勢邊說：「你們沒有問我有關國籍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攸關我是否有資格承擔校長職位的最重要問題，不是嗎？」田長霖校長說：

「當然這是一個基本問題，非談不行。」我

說因為客觀情勢的變化，我必須再重新召開家庭會議好好地討論這事，委員中有人問我要多少時間，我立即回答二週。最後委員會給我二週的時間考慮而散場，時為八月初。

聽說清華校長的候選人一共有三位，第一可能的候選人因為另有原因而退出，故我與另一位候選人的可能性同樣地上升，這期間最熱心指導我的人算住在華府附近的楊憲桂博士。

那時常有教育部來的電話，包括羅銅璧教授及教育部人事室吳主任，而楊憲桂博士則要我利用這個他們要我接受清華職位的情勢做一點交涉，看教育部是否能仿照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的例子，也容許我在清華任教授兼校長的可能性。我在教育部來第二通電話後寫了一封信建議教育部不鼓勵，這也是預料中事。那兩週內我接到教育部清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的電話兩通、教育部人事處的電話兩通，以及清華教授的三封信，顯然我已雀屏中選了。雖然我信奉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但我所建議的皆遭教育部婉拒而化歸泡影，最後只好放棄了清華的可能性，清華校長的事就這樣從我指間溜走。

吳處長三靈惠鑑

上聞四承蒙惠鑑，謹及清華大學校長一事，本人深為感銘。  
幸人出生既於行，在清地有相處，願盡在國的辯爭稍具經驗。  
如受命主持清華事務，必會全力以赴，謹此保留。七月廿六日  
方面談之後，即以即快正反學中商議，決定屆時將放棄美國  
國籍，設致其職，不辦去華美圓飯，附立新條款過止此。(未  
始由局報知本人之條件為主持校務時，因房價甚高，做學術活  
動，增加大學本身之困難甚多，故對放棄美國國籍而首出  
校長一職，請先保留總度。

現況既無如此，教部如果真厲意本人，煩請研究是否可以  
以清華生命科學院教授身任兼校長之方式解決，以免清華  
反卓人一派受害。如此亦可博得圓滿的學術國際化之局面。

即此順況 (同時寄至 Tokyo，謝謝周清志之影印本)

筆者最後與教育部人事處吳三靈處長的通信。

安祺

黃崑嶽  
一九九七·八·廿五

## 法律與現實

我心裡是耿耿於懷的，明明到手的清華校長，白白地看它從指間溜走，豈不可惜。我於是寫了一封信給最小的女兒岫寧，為什麼選擇寫信給她，現已不記得原因。過了一週後，我收到一封小女兒的安慰信，信最後是這樣說的：「不要太傷心，因為台灣各界的人都知道你是很願意分享知識的。」

林其和醫師，現任的成大醫學院院長曾經跟我說，以醫學出身的身分而能被清華青睞，已經不容易了。委員周昌弘最近也談起這件事，認為以委員身分來說，他是很希望我能出掌清華的。已故的前吳京部長曾經也在教育部長下台後來我處興師問罪，但這要怪誰呢？

話說我現在住的公寓裡有不少美國在台協會的人，其中當然有在簽證部門或國籍部門供職的，我和其中一位在簽證部門供職的老外特別有點深交，最近有一天，他無意中向我透露，他們部門收到我們不少已下台的政府高官申請恢復美國國籍的申請書。他的這一句話，馬上在我腦際敲響了警鐘，我於是把清華大學校長遴選的故事始末簡要地告訴他，並且告訴他：「明天你上班後把

你們的法規專家請來問一下，一定問得出那篇“*And Don't Come Back*”裡寫的法案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要知道，因為我守法，其代價是一所知名大學的校長職位呢！」結果他的回答使我很訝異，他說：「崑蟲，法律是法律，現實是現實。」我恍然這句話似乎曾經也出自國內的一些人口中。

## 與網球結下不解之緣

在竹中的時候，我和網球結下不解之緣，這個緣和我們家住在老新竹病院旁有關，新竹病院在二次大戰後改成省立新竹醫院。省立新竹醫院左端的放射線科面向我們的住所，放射線科的旁邊是一片草地，有一個網球場。這個球場，如果我們懒得繞道從正門進去，只要爬過醫院冗長的牆即可到達。那時新竹市內可以打有標準網球的球場不多，故所有住附近愛好網球的人都會在下班後聚集在這裡打網球。

那時台灣盛行的是日本人喜歡打的網球，叫軟式網球，不同於軟式的另一種叫硬式網球，現在風行全球的可以說都是硬式網球。軟式網球用的場地與現在的硬式網球完全一樣，規則也一樣，但不同的是以下幾點：一、球不同，硬式網球是有毛的，軟式的球則是光禿禿、要打空氣讓它膨脹

的球。因為球的性質不同，可塑性也特別大，故使球變形的伎倆也特別多，球彈跳的方式及程度也與硬式不同，是球藝的關鍵。二、規則雖然一樣，但計分喊法不同。現在風行的硬式網球是以十五、三十、四十的算法進行，但這是怎麼產生的，我全然不知。而軟式網球贏一球就算一，很是簡單。三、軟式比較注重雙打，而不注重單打；雙打時，打前面的永遠專注於打前面，後面就專司後面，前面的叫前衛，後面的則叫後衛。四、球拍的形狀稍異，硬式與軟式網球的各種裝備相比，前者較貴，故以那時台灣的經濟來說，沒人打得起硬式網球。

我三哥是什麼都會的人，連網球都是如此，看他每天爬牆在人群與場中馳騁，做弟弟的我好羨慕。那時家裡經濟狀況不好，不知怎的，他總是有辦法搞出一支屬於他個人的球拍，而我呢？我雖然在高二時成為竹中的校隊，在進入醫學院時也成了院的代表，但從未有過自己的球拍，都是臨時借人家的球拍打球的。

我在高一的時候就打入了竹中的校隊，記得成為竹中校隊時，家已搬到新竹女中對面的兩層樓房子。我擅長打前面的位置，叫做前衛，而且對前衛的角色掌握得很有分寸，和我搭檔的是竹中很強的後衛林建昌。我會說那時在竹中，下午兩、三點鐘以後都在參加課外活動，在運動方面，我不

是在打籃球就是在打網球。竹中當時是台灣全島數得上的強隊，所以常常參加全省的比賽。

有一次全省的比賽在嘉義舉行，代表團到嘉義的前一天，因為之前我與班上同學往某地露營時染上了一場病，父親一定要我到離家只有幾間門面的醫院打「補針」。我得說明白，那時候很流行打針，所謂補針，當時指的是五十四西葡萄糖而已，從現時的醫學來看，這補針一點意義都沒有。更糟糕的是，這醫院其實是一間獸醫院，是我同學傅偉勳的一位兄長開的。結果打完針不久，我就全身發燒、發抖，是中毒的現象，第二天起床後就全身疲累，走也走不動，遑論隨隊遠赴嘉義，結果我不得不請假脫隊而沒跟上竹中的校隊。

隊友們很是擔憂，前後來了急電找我，一定要到嘉義歸隊參加比賽，弄得我不得不勉強啓程單刀赴會。但大勢已去，我到嘉義後也發揮不了作用，我們在初賽就敗在台中一中的手下。

以一個健康的人，找一位獸醫打針，是後來自己成爲醫生以後沒聽過的事。現在想起這事，對自己的無知覺得可笑至極。

到了台大醫學院，我的球藝還是程度頗高，但打完了院隊後，隨著課業的繁忙，也漸漸地不打網球了。我之所以喜歡網球是它在球類運動中的地位，是與圍棋在棋界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不相上

下的緣由我猜想是網球不像籃球或是美式足球，僥倖與運氣、僅靠裁判來判斷的可能性很少。圍棋也不像橋牌一樣，黑白兩方的走法都擺在下棋雙方的眼前，看不看得懂，全看你的造詣。橋牌的確與獲得哪一種牌有關，但獲得哪種牌則完全看你的運氣。

但到了一九六三年負笈美國，事情有了重大的轉變，我買了自己的球拍，開始改打硬式網球，而且有了固定的美國人對手，他叫雅普(Yaap Boozman)，是東歐移往美國的歸化公民，是一位預備役的美國海軍軍官。但他怎麼會出現，我們為何會搭檔的？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反正，天氣熱一點的春夏秋季節我們就不



筆者與Mr. Yaap合影。

與網球結下不解之緣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在室外，而冰天雪地的冬天就搬到室內球場，一週一次從不漏掉。雅普的球藝與我旗鼓相當，有時他贏，有時我贏。

一九七七年，我回台大當客座教授，發現那時硬式網球在台灣已相當普及。我在台大時並無定期地打網球，也沒有固定的球友。有一天，我內人的哥哥，當時台大外科的謝健民醫師邀我到圓山俱樂部打球，他是圓山俱樂部的會員，圓山俱樂部當時是沙地球場，我打起來要能習慣真不容易。在球來球往當中忽有一球，我以為我的搭檔可以接卻沒接好，我急忙跑到前面去救球而做了一個急停的動作，我的右膝關節當場凍結不能彎曲也不能動了，當場只好用球拍當手杖支撐退出球場回家。

那時外科的李治學教授還在世，他急忙來到我住的南京東路，即我下榻的一姊家，從右膝關節抽出了三十西西的全血，顯然右膝節的某組織或肌骨斷了，李教授因此建議我馬上住院。我依他建議，住進了台大一西病房。

## —造假的病歷—

台大一西病房是骨科病房，而且是一等的，中間那一床住的是患有慢性糖尿病、腳趾壞死的病人，病灶還會發出陣陣的惡臭。我在一西病房一住院，等了一下，來了一位姓L的實習醫師，問了我的病例並做一番檢查，根據他的記錄，我的血壓是一百二十八／八十。不久來了一位H教授，是台大現在的骨科專家，由L醫師陪同。L醫師在H教授看我的當兒，問H教授說黃教授這個傷害要多好久好？H教授答以約二週。我當場覺得H教授沒有抓住機會教實習醫師，臨床教學應設法常引起實習醫師的興趣，例如說，當L醫師問幾個禮拜會好的時候，可以要求L醫師去看有關膝關節的描述，看我的傷害是什麼程度與什麼部位再說。讓這機會白白地溜過去是很可惜的事。

最近我看了路德摩爾(Kenneth Ludmerer)的《醫治的時機》(*Time to Heal*)，深覺我一九七七年所感覺到的實習醫師角色的疑問，最近又被重炒，並不偶然；因為提不出正確的答案，所以「實習醫師的角色是什麼？」的懸案就一直掛在那裡。美國醫學院的畢業生現在都不再被要求這一段訓練過程了。

L姓實習醫師的故事還沒完。話說H教授離開後不久，第二位來看我的是內科的故許成仁教授，他看見我孤單地在一西病房，旁邊還有會發出陣陣惡臭的病人，馬上建議我搬到內科的第九病房，我也同意。我很感謝許教授的建議，那時我因為有高血壓的家族史，心裡決定這一下子搬進內科病房一定要做高血壓的總檢查。

到了第九病房，來了一位名叫楊淑敏的內科女住院醫師，楊醫師是花蓮人；當我告訴她我有高血壓的家族史時，聽我這麼一說，她馬上拿了血壓計幫我量血壓，結果一量收縮壓（高血壓）是一百七十，她不解地加了一句話：「奇怪，昨天在外科一西病房您的血壓是正常的一百一十八／八十，今天為什麼那麼高呢？」我回答說：「昨天在一西病房並沒有人量我的血壓啊？」有病例記錄，但沒人量過我的血壓，顯然L醫師的記錄是人工造假的。

我會說過，病人那時的血、尿、大便皆無機器可以代勞檢驗，得由實習醫師親手檢查。實習醫師因為懶惰，遂以Intern method（應當方法指實習醫師造假）沒想到L醫師連當客座教授病人的血壓也造假，未好好地量而隨便在病歷上寫了一個數字。我只能嗟嘆L醫師的命運崎嶇，碰到我這個造假不絕的高血壓病人。

想想看，將來一定會有醫師做一個統計，我的血壓會是其中的一個數據，而從一西到第九病房，血壓就高到一百七十，是什麼原因呢？做統計的醫師還得煞有其事地非解釋一番不可呢！因爲自己一時的懶惰而亂了別人的研究步伐，真是笑話。

過了幾天，同學出版的《青杏》雜誌開了一會，是學生們主持的編輯會，我也被邀請參加。我當場全盤托出L醫師造假的事，並說這種造假的習慣可能會害死病人，千萬要不得。話傳來傳去，傳到L醫師的耳朵裡，當晚兩點左右L醫師來看我，向我道歉。我當然接受，但我告訴他，還好台灣不講究推薦書，如果這在美國，你就休想有醫業前途，因爲美國這個國家的整個社會是靠推薦書織成的，而L醫師的這個行爲一旦敗露，就很難拿到像樣的推薦書，也就難找到像樣的工作。希望他真的瞭解我的苦心。

我是一九八二年回台南的（見《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一九八〇年代的國科會主委是陳履安先生，他創立了所謂的邀請講席制度。這個制度是邀請在某個領域知名，而且是在世界上地位夠高的學者來台，給予五千美元的報酬，在指定的場所做三場的演講，期間的交通要在這五千美元裡支出自理。當邀請講席制度建立後，學術界第一位利用的人是我，我第一次牛刀小試，邀請了羅伯·蓋樂（Robert Gallo）來台，第二年的第二位請的是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當時他和羅伯·蓋樂還在為誰先分離出愛滋病病毒一事爭論不下而打官司。蒙塔尼耶在成大醫學院、台灣省醫學年會及台大醫學中心發表三場演說，他是在法國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供職的病毒學家，是第一位分離愛滋病病毒的專家。在該年六月或七月和他通信發出邀請時，

他立即回應答應該年十一月將抵台做三場演講，我以為事已大致底定，不橫生枝節。哪知九月左右，蒙塔尼耶的音訊突然斷掉，我再寫信也無回音，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緒。恰好九月將結束時，巴黎來了一位神經外科醫師，名為喬治醫師（Dr. Georges），這時距台灣省醫學年會剩一個多月。我請喬治醫師查驗一下我與蒙塔尼耶的書信來往，想查明我究竟做錯了什麼事；我把和蒙塔尼耶之間的書信統統攤開在我辦公室的茶几上，順著時間的進行排列，請他檢視。喬治醫師看後開口說：「沒有，沒什麼差錯，但我有一個建議，從今以後和蒙塔尼耶寫信，請不要直接稱他蒙塔尼耶博士（Dr. Montagnier），而要稱蒙塔尼耶教授（Professor Montagnier）較妥當。」這給了我一個學習歐洲風氣的機會，之後在與凱爾（Professor Keil）及文樹德（Professor Unschuld）兩位教授聯絡時皆發生了好作用，也應證了喬治醫師的話。

當年十月初，我另外訪問了蒙塔尼耶教授於他的研究室，發現他的沈默與音訊全斷，除了喬治醫師指出的稱呼習慣問題以外，他還對我訴說，認為五千元美元太少了；他飛的是頭等艙，而且這趟來台，中途沒有取道任何國家，沒人共同負擔旅費，五千元美元僅夠旅費而已。我因為性格很急，而且又時間緊迫，遂決定讓五千美元全部都入他的口袋，旅費與住宿費全由我負責設法。怎麼

蒙塔尼耶教授

223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222

設法？就是向企業家募款，請他們捐款贊助。事後結算這次邀請蒙塔尼耶教授，共用了三十多萬新台幣。

蒙塔尼耶教授是很不容易取悅的人物，我除了借來竹中校友周宜旋的凱迪拉克豪華轎車接送他之外，還把他安頓在位於中山北路有法國風味的老爺飯店。邀請結束，在送他到桃園國際機場時，我問他這次招待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結果他說老爺飯店的床太硬了。這使我覺得他是一位十分挑剔的人物，與蓋樂博士的義大利衣鉢迥然不同。

##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剛從成大醫學院的院長職務下台不久時，有一次，在一次演講會裡必須說一些德語，會後德國Giessen藥廠有位名叫黑希斯特(Hechst)的代表靠過來，問我德文的發音為什麼那麼標準。他的名字我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我回台南後，就打了電話給黑希斯特，問是否可以提供我一萬美元左右的獎學金，好讓我在歐洲這歷史悠久的西方醫學據點巡一次禮，我並以「西方醫學歷史巡禮」為這獎學金之名，結果他一口答應。

我為此寫了很多信，經過一番折衝，我選定了瑞士的蘇黎世(Zurich)、德國的渥茲堡(Wurzburg)及慕尼黑、蘇格蘭的愛丁堡及英國的倫敦。以這五個地方為據點，我各做了聯繫，例如瑞士的蘇黎世是蘇黎世大學的醫學歷史博物館、德國的渥茲堡是該市大學的歷史研究所所長凱爾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嶽白傳

教授、慕尼黑是慕尼黑大學醫學研究所的所長文樹德教授等，皆有事先的書信往來。這次書信往來因有蒙塔尼耶教授與博士頭銜在歐洲的前車之鑑，用稱呼時特別小心，而一舉成功。

## —托瑪斯·曼—

到了瑞士的蘇黎世，住進大學推薦的旅館，歐洲的旅館一般比美國的貴而且狹窄。這是我第一次訪問蘇黎世，這次的目的是：一、看它的博物館；二、拜訪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墓；三、如果醫學歷史家艾克內齊（Ackernknecht）還在世，想和他見面；四、觀光。這四個目標都順利完成，其中關於托瑪斯·曼，我要在此多加憶述。

托瑪斯·曼是一九二九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人，他生於德國北部漢堡附近叫呂貝克（Lübeck）的地方。他是猶太裔，因不滿希特勒的反猶太政策，很早就離開德國，移往美國，在美國住了幾年，因倦怠於美國的虛偽主義而遷往瑞士講德文的地區渡過了餘生。托瑪斯·曼寫的幾本書，皆與醫學或病人的心態有關，像《魔山》（The Magic Mountain）、《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就是很好的例子。因為他寫醫師與病人的心理變化太細膩，使得他的每一本書都很厚，有時候讀者看他的書會看不下去，因此熟習托瑪斯·曼的人較少。龍應台會寫一本書叫《乾杯吧！托瑪斯曼》，裡面所寫的托瑪斯·曼就是他。

倒是呂貝克另外出現了一位年輕的大提琴家，由台北的鋼琴家蔡采秀女士介紹而常到成大醫院來表演的霍赫慕思（Reiner Hochmuth），他在成大比托瑪斯·曼還有名。

有一次，現在在成大眼科擔任主治醫師的陳筱彥，當年她來參加七年制醫學系的入學甄試時，在自傳裡講到她的嗜好是看經典之作。當時我還是成大醫學院的院長，我們成大有一特別的面談方法，是五位教授問一位考生五十分鐘，所有的問題由自傳開始，所以甄試學生心理上要有準備，在自傳裡寫什麼，很容易成為當時甄試面談的起點。陳小姐也不例外，我第一個問題就問道哪一位是她常看的經典作家，結果她的回答是托瑪斯·曼。這就使我很覺尷尬，因為我很擔憂在座的其他四位教授沒聽過托瑪斯·曼這個人，遑論看他所寫的書。幸好我還看過他的書三、四冊，我問她，是否能把《魂斷威尼斯》的讀後感及托瑪斯·曼在這個故事中所欲說的結論敘述給我聽，她於是照她的感覺說了一遍。中間我針對與我看法不同的地方與她討論了幾句話，我以為這樣子就結束了我的

面談，而輪到別的教授問她。

不料陳小姐回家約兩週後，寫了一封信給我，信裡說那天面談時因對《魂斷威尼斯》一書的讀後感與我不同而起了一點爭論，她回家後，再看了該書一遍，發現她的論點還是對的，錯的是我。我立刻請了當時負責教務的張文昌教授吩咐他，如果她的面談成績還不錯，記得一定要錄取她。

因為有這個故事而龍應台又共襄盛舉，故托瑪斯·曼在我心裡有了特別的位置。後來托瑪斯·曼的女兒艾力卡·曼(Erica Mann)用德文寫了托瑪斯·曼的一生，我也看了。

我想見的另外一個人是舜父克內齊，但到了蘇黎世才發現他已經去世，所以就省了這個行程。

## ——渥茲堡的凱爾教授——

德國南部的渥茲堡是很早開發的城市，是當時羅馬天主教的主教所在地，有很大的主教(Bishop)的住宅(Residenz，英文叫Residence)，我訪問該地已不是第一次了。該地因為開發很早，因而大學也頗有名，以第一屆諾貝爾醫學獎受獎而出名的倫琴(Wilhelm Konrad Roentgen)就是

在渥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Wurzburg)時發現X光的，他的實驗室現在成了觀光據點。

倫琴的實驗室儀器一大堆，表示他所從事的研究當時是多麼的複雜而難做，但這也突顯倫琴對醫學的貢獻之大。他是把醫學診斷帶到病人體內的第一人，許久以後才問市的核磁共振攝影(MRI)、電腦斷層攝影(CT)及正子斷層攝影(PET)借X光帶頭的地方很多，所以一九〇一年他拿到諾貝爾獎的第一屆獎賞是受之無愧的。據紐蘭(Nuland)在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一書中的分析，倫琴一輩子只發表了四篇論文，但這四篇跟一八四〇年代的塞麥爾維斯(Semmelweis)，以及十七世紀哈威(William Harvey)一生只有一篇論述相比起來已經多很多了，再比起現時的環境，我只能說時代變(—)

渥茲堡還有兩個重要的人物，一是維蕭(Rudolf Virchow)，一八二二年生於德國一個叫席維班(Schivelbein)的地方。他是十九世紀德國醫學的天才，在二十幾歲時就已經分出了血栓與栓塞，而白血病現在的通用外語“leukemia”就是他取名的。但當柯霍(Koch)分離結核病菌時，他始終不相信結核病是感染引起而出名。他後來成了人類學家以及終身的國會議員。亞伯拉罕·佛萊斯納(Abraham Flexner)曾經在十九世紀約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醫院的建設時期去德

國，請教過他一所好的醫院應該具備的

首要條件爲何，維蕭答以：「病理。」

這與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的首任院長是病理專家，而佛萊斯納的兄弟賽門(Simon Flexner)變成一位洛克菲勒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中擅長病理者不無因果關係。

維蕭在渥茲堡一共九年，是在柏林的三月革命未成後的事情，他未曾懼怕前後而敢於批評政府，惹得俾斯麥宰相曾經要與維蕭決鬥一決生死，幸而遭維蕭所拒，不然德國的醫學就少了一個天才。不像倫琴，維蕭創辦了現在還刊行的醫學雜誌，

Physik. Institut  
& Univers. Werkst.

Münch 17 Nov 96

Dear Reiniger, Gebbert & Schall  
Strasburg

Yours truly,

Frage erlaubt, ob Sie mir die Röhren unter den M. 20 statt in M. 30 liefern könnten; aus mein eindrucksvolle Erfahrungen dagegen dieser Pr. Kelly sehr geeignet sein. Es ist auch die ein Ausnahmefall berücksichtigt und daher nicht weiter Bedeutung von meines Worts annehmen sein könnte.

Falls Sie auf mein Vorschlag eingehen, bitte Sie mir für die drei unten beschriebene Röhren 4 andere gleicher Qualität und einer drei kleinen und zwei großen zu schicken.

Nachdruck verboten

Prof. Dr. W. C. Röntgen

Geehrter Herr!

Ihre Röhren sind in der That sehr gut, aber für meine Verhältnisse zu teuer, ich brauche doch die Röhren nicht blos zu den bekannten Versuchen, sondern, wie wohl einleuchtend sein dürfte zu vielen anderen Experimenten, bei welchen die Röhren ganz anders als in der normalen Weise beansprucht werden; die Folge ist, daß sie eher zu Bruch gelangen. Ich möchte mir deshalb die Frage erlauben, ob Sie mir die Röhren nicht zu M. 20 statt zu M. 30 liefern könnten; nach meinen anderweitigen Erfahrungen dürfte dieser Vorschlag wohl acceptabel sein, da es sich doch um einen Ausnahmefall handelt, und Ihnen vielleicht weitere Bestellungen von meiner Seite angenehm sein könnten.

Falls Sie auf meinen Vorschlag eingehen, bitte ich Sie mir für die zwei bereits verbrauchten Röhren 4 andere gleicher Qualität – und zwar zwei kleinere und zwei größere zu schicken.

Hochachtungsvoll

Dear Sir,

Your x-ray-tubes are indeed very good, but too expensive for my situation, after all I need the x-ray-tubes not only for the known experiments, but, as should be obvious, for many other experiments which put much more wear on the x-ray-tubes than normally done. Consequently they are ruined earlier. For this reason I take the liberty to ask you, whether you could send me the x-ray-tubes for 20 Marks instead of 30 Marks. From experiences I have made elsewhere this proposal should be quite acceptable, since it is an exceptional case and you might perhaps be interested in further orders from my side.

In case you accept my proposal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replace the two already used x-ray-tubes by 4 others of the same quality – namely two smaller and two larger ones.

Sincerely yours,

Brief von Prof. Röntgen an Reiniger, Gebbert und Schall – heute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Bereich Medizinische Technik – in Erlangen, vom 27. November 1896.

Letter of Prof. Röntgen to Reiniger, Gebbert and Schall – now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Medical Engineering Group – in Erlangen, dated November 27th, 1896.

Überreicht durch: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Bereich Medizinische Technik, Erlangen  
Geschäftsgebiet Dental, Bensheim

Presented by:

SIEMENS AKTIENGESELLSCHAFT  
Medical Engineering Group, Erlangen  
Dental Sector, Bensheim

倫琴的來信（打字版）。

黑希斯特的獎學金

231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嶽自傳

230

而且一輩子裡是一年上百篇的論文，但他不是爲了升等而寫的，這是與現時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位出身於渥茲堡面對日本西方醫學貢獻極大的是西博德 (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醫師，可惜他有名的博物館在渥茲堡是空空如也，主要的博物館在慕尼黑，殊爲可惜。

國內對這位對日本的西方醫學做了重大貢獻的德國人西博德醫師一定生疏，我會有機會在日本長崎及他的出生地德國渥茲堡市的凱爾教授處獲得有關這位傳奇人物的資料，深爲他對日本醫學所做的豐功偉業所感動，故記於後。

西博德一七九六年生於醫學名門，他學醫於渥茲堡大學，但對動物、植物以及民族人類學亦涉獵頗廣。他生性好奇、冒險、犯難，不適開業生活，不久成爲殖民大國荷蘭陸軍的軍醫少校，前往今日的印尼首都雅加達，因其才華被上司賞識，一八二三年被派到位於日本長崎港內叫出島的一小島上的荷蘭商館擔任專屬醫師。當時把西學帶入日本的是以荷蘭人帶來的所謂蘭學爲主流，長崎一帶已聚集了有心想學習西方醫學的日本人士，西博德也就利用時間傳授醫學。當時的日本是鎖國，荷蘭人雖在港內的小島享有據點，但仍不能隨意踏上日本本土經營，唯有西博德卻被特准上岸診治病人，其名聲因而遠播。不久他與一日本女性德基（譯音）結婚，並於一八二七年生一女兒名伊內的研究也隨著擴展到了東京一帶及沿途各地。

一八二八年西博德在長崎五年任期屆滿，必須回國述職，乘船離開長崎，但遇颱風而船隻擋淺，幕府人員上船檢查時，在西博德行李內查出日本地圖及生態研究的資料，被判觸犯了不准任何人士攜出日本風土資料的禁令，西博德因而被監禁於出島，並於一八二九年被驅逐出境。西博德因爲掛念達基和伊內的生活，把個人所有皆留給妻女，並指示門徒們如何繼承他未完成的研究。回到歐洲的西博德則全神獻身於介紹日本給歐洲，有鑑於清朝因鴉片戰爭受辱，西博德不忍類似情況在日本發生，故進言荷蘭國王維廉二世，去函幕府勸告開國，也曾透過俄國宰相及美國貝里提督做同樣的努力。這些努力，對後來的明治維新一定有所影響，他所著的《日本》、《日本植物誌》、《日本動物誌》更是被奉爲曠世之作。

西博德於一八五九年獲得重返日本的機會，但時已過境已遷，當時他年六十三，已在德國再婚，這次訪日有長子亞歷山大隨行。德基在日本也已再婚，生一男孩但不幸幼逝，與西博德所生的女兒依內則從師於西博德昔日的門第，及從數名荷蘭醫師習醫，成為日本首位女性產科醫師，在明治天皇的皇子出生時還擔任接生的工作。西博德和德國配偶海倫(Helene)之間育有三男二女，長子亞歷山大來日之後，十五歲時就擔任了英國駐日公使館的翻譯官，後來成為日本駐羅馬及柏林公使館的日本官員前後約四十年。其弟翰利則成了奧匈駐日公使館的代理公使多年。西博德一家人都為日本的醫學及外交做了不滅的貢獻。

渥茲堡有西博德的紀念館，但所藏有限，不值得訪問，值得看的是位於慕尼黑、藏有西博德蒐集的日本民藝品紀念館。我從這一故事得到三點啓示，西博德的傳奇有如蘇格蘭醫師萬巴德在台灣、廈門及香港的事蹟，兩者傳授醫學於異國皆與人類愛有關，但非傳道。第二是西博德返抵荷蘭那段時候是中國成為西方強權俎上肉的開始，日本與西方勢力接觸，卻沒被迫簽下一大串不平等條約，中日之別究在何處？日本是如何贏得了別人尊重的？這是我們該做反省的一點。第三：這故事充分顯示醫學是無國界的。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留學日本的大陸學者錢國洪的《日本与中国に於ける西洋の発見》一書，以及李登輝的《武士道解題》中也有言及。

凱爾教授對西博德醫師的歷史知道得特別詳細，給了我不少的資料閱讀。他的研究所依山建造，也有一個小小圖書館。他也請我們到他家進午餐，他家裡面的裝設比起美國一般家庭也毫不遜色，而且較現代化。

他和夫人的健康都不太好，尤其是他夫人，幾乎是一位盲人，在家走動完全靠熟記家內物品的位置，故他家裡整然有序，並未發生任何事故。

多年後國家衛生研究院來了一位出版科學雜誌的赫爾·凱爾先生(Herr Keil)來訪問台灣的醫學教育問題，訪問結束後我問他：「我幾年前曾經去過德國的渥茲堡而在該大學的歷史研究所遇到一位和他同姓的人，凱爾這個字並不常見，姓這個姓氏的人亦不多，你認不認識他？」結果他回答：「凱爾教授是我的哥哥！」當場令我對天下之小有了新的感觸。他說過幾天是他們的母親九十多歲生日，凱爾教授也會遠從渥茲堡前去聚會，問我有什麼話要對凱爾教授說。我於是當場寫了一封短函托給他帶回德國，過幾天後就收到了來自凱爾教授很恭維的一封信。

這簡直是個奇蹟的故事，只能在記憶力強而動用聯想力之下才能發生的好例子。

## 一慕尼黑

文樹德教授，其夫人名叫文淑德女士 (Frau Unschuld)，我見到他之前尚不知他到過台灣，講一口相當流利的中文，他被中國大陸人士認為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對中國傳統醫學研究得最到家的一個人。他著有《中國的醫學》(Medicine in China) 等膾炙人口的中國傳統醫學書，其中很大的貢獻是他把本草綱目、皇帝內經及傷寒論譯為德文，並將中國醫學廣為傳播於歐洲。

先前，喬治醫師指點我如何稱謂蒙塔尼耶教授一事，對我身為學術機關做事的人來講很有效力。在歐洲，教授頭銜是很尊貴的，寫信時要先寫教授，即Professor，然後再寫博士，而且有幾個博士學位就寫幾個博士稱謂，像文樹德教授有兩個學位，即藥學及東方文化哲學學位，他的英文頭銜則為 Professor & Dr. Dr. Unschuld，聽起來有點奇怪，但說來是歐洲的習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在慕尼黑只待了約一週，因為我有教授的頭銜，故獲得一間研究室，一個共用的秘書及打字機，極為方便。

文教授讓我大為吃驚的第一件事是他會講中國的普通話，我打電話報告他我已到慕尼黑時，他

用中文回答是我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文教授那裡遇到了一位來自中國大陸、名叫鄭金生的醫生，他是中、西醫合併的化身，我和他談了不少話，有一次我問他：「大陸的中、西合併進行得怎樣？」他告訴我現在大陸還是停留在以西醫方式診斷病人而以中醫治療的程度，他並提到中國大陸現在有三種醫生：第一是正統的西醫，第二是正統的中醫，第三是不中不西的一種；「中、西合併是貌合神離的說法！」他說。

我認為中、西醫是根據完全不同的哲學做出發點，兩者很不容易合併。文樹德教授有很大的工程要做，但他的方法是中醫當中醫看待，並沒有徹底合併中、西醫兩者的意圖。

慕尼黑是一個文化水準極高的地方，是拜爾倫的首都，曾經出過一個國王瘋狂地喜歡華格納的歌劇，叫路德維希二世 (Ludwig II)。慕尼黑承襲這個傳統而有一個很大的歌劇院，我趁訪問慕尼黑時也偕同內人去欣賞了現代化的卡門，誰料文樹德夫婦知道我們要去看那歌劇，後來也買了兩張票去看同一場的歌劇，並邀我們在結束後一起到廣場對面的飯館共進晚餐。

## —愛丁堡—

蘇格蘭是很神秘的一個存在，老一代的蘇格蘭人殘暴成性，不亞於英格蘭，這是根據我個人的觀察與藍大弼醫師的見證，看過「英雄本色」這部電影的人都會覺得我的觀察是對的，這是因為蘇格蘭地處受維京人影響最深的一個區域。

蘇格蘭人也是十九世紀負責在台灣布道的長老教會派，這我在另外的文章裡提過。蘇格蘭的這個冒險精神從她雖地處北部，卻成了十九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的先鋒，以及領導了熱帶醫學的研究與發展即可見一斑。蘇格蘭的偵探小說家特別多，這是不是承襲福爾摩斯作者傳統的痕跡還將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愛丁堡是新舊兩區互相編織而成的，愛丁堡大學的大部分皆位於古城。愛丁堡有一所聞名世界的病理博物館，我的目的在訪視該博物館，因為內人專攻的領域最後還是病理，所以這次訪問很是稱意。另外使我們很高興的是，我們的大女兒將以愛丁堡為起點與我們一同去倫敦，我們家因此有了小小的團圓機會。

成人醫學院的生化科有位吳昭良教授，他的夫人是微生物科的蕭璣玲教授，兩人的博士學位都是從愛丁堡大學獲得的。她們的大女兒名Ponse（中文名我已忘記）後來獨自留在愛丁堡，也在該校醫學院畢業而獲得頭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Ponse在醫學院還未畢業前，有一次欲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學習兩個月而被拒，後來經我向美國在台醫藥協進會（A B M A C）的主席杜魯諾（Turino）說情後才又被接受。讀者如對美國在台醫藥協進會有興趣，可參考該會的會史。

## —倫敦—

英國的首都倫敦是一個永遠的都市，曾經出過幾位科學家、藝術家與作家，是世界音樂劇的出生之地。

倫敦以衛爾康公司（Welcome Co.）而聞名於世，另有一圖書館叫做衛爾康醫學歷史研究院（Welcome Institute of Medical History），我這次訪問倫敦的目的也是訪問這一所圖書館。它是一開

放式的圖書館，什麼人都可以自由進出，只要換個證件就可以。倫敦的地下鐵叫tube，從我住宿的旅館(Intercontinental Hotel)可坐地下鐵直達圖書館，我在這圖書館看了不少有關醫學歷史的書。

順在倫敦之便，我們也看了「歌劇魅影」及「西貢小姐」的歌劇，訪問了保護得很安全的戰時邱吉爾內閣的辦公地點，以及狄更斯的住所。

在倫敦時恰好遇到溫布頓網球公開賽，每年那一段時候的倫敦天氣陰霾，隨時會下雨。我女兒極力勸我這是一生中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要我們一定要花一天時間去觀賞，由她買票。我問她票價多少，才知道週六的決賽票價要一張一千英鎊，就連週三八強的比賽門票也要五百英鎊一張，而且很多座位都是在一年前就訂好，當場購買要透過公司行號的關係才可到手。於是我就與內人皆打消念頭，沒去溫布頓，去了大英博物館了事。

總而言之，黑希斯特給我的一萬美元獎學金我沒有白花，而且收穫很大，例如文樹德教授就是一個好例子。



## —文樹德教授—

文樹德教授的事在前文已經略述過，他一生最大的企圖是在柏林建立一所全德國性的中醫學研究

所，這個企圖的最大問題是經費，他認為我在台灣及美國的面識廣，可以幫他這一方面的忙。

我最初想到的是哈利·溫斯頓(Harry Winston)珠寶店，因為該店的老闆溫斯頓先生曾提供研究基金給哈佛大學研究愛滋病病毒。但溫斯頓先生是一個猶太人，而文樹德是德國人，情理上我不知如何開口。

有一天，吳東進先生於他在台北101附近所蓋的信義傑士堡開了一個餐會，在那會中第一次經

吳先生介紹，見到了吳先生在美國留學剛回台、專攻分子生物學的女兒，吳先生並說他近期將帶著女兒訪問慕尼黑等語。我問吳先生他在慕尼黑有無朋友，他說沒有。我於是跟他提起文樹德教授，告訴他我可以介紹，吳先生說好。吳先生和文樹德教授的友誼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吳先生把我介紹朋友給他的事當作一回事，我從她的秘書陳小姐處獲悉，吳先生還買了禮物去看文教授而成了好朋友。吳先生回台後，文教授被吳先生所經營的基金會邀請，與夫人一起訪問了台灣，住在信義傑士堡。信義傑士堡是設備齊全而很豪華的旅館，有種種設備是台灣的豪宅裡沒有的，譬如裡頭的游泳池是又乾淨、溫度調節又恰到好處，是台北罕見的泳池，所以文樹德教授伉儷在台有如國王一般。時在一〇〇六年八月，我已不需再做任何牽線工作。

文教授後來捎來電子郵件，說與吳先生有關的發展不太如意，但因一〇〇六年他受邀在台灣各地演講，又因為接受國立政治大學客座教授的聘書，於是於一〇〇八年三月十八日第二次來台。這已使他雀躍不已，因為我能為他打開了一條新路。文教授現已遷到柏林去了，所計畫的全國性中國醫學研究院士也有進展。

文教授來台的滿意度也可以從馬汀·費雪狄斯考教授 (Professor Martin Fischer-Dieskau) 最近的

一件事情看得出來，原來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任命其為準音樂總監，如果這一年的表現滿意，明年將被任命為正式的音樂總監，指揮該交響樂團。他因聽到文教授住在信義傑士堡的待遇，又聞吳先生喜歡歌劇，故提出住在信義傑士堡的要求。我向他解釋了文教授與吳先生的關係特殊，與他的案子並不能相提並論而回絕了他。

## —哈利·溫斯頓—

聽過哈利·溫斯頓 (Harry Winston) 這名字嗎？有一天在日內瓦，從車窗遠眺看到對岸建築有 Harry Winston 兩個白字，勾起了多年前和溫士頓公司接觸的記憶。溫斯頓氏是一八九六年生於紐約的猶太人，具有鑑識珠寶的過人天分；他父親十二歲時就曾在當舖以兩毛五美元買下鑲有寶石的戒指，兩天後以八百美元賣出，原來除了他，沒人看出戒指上鑲的是翡翠。他在十五歲時，父親舉家移往洛杉磯，在該市的比佛利開了珠寶店，並以他的名字取名哈利·溫斯頓，後來成為世界頂級的珠寶公司。電影鐵達尼號的女主角在故事的結尾拋入大海的那條寶石項鍊，就是哈利·溫士頓公司

設計的。現在日內瓦、倫敦、好萊塢比佛利、紐約、及東京銀座設有分店。溫斯頓氏現已逝世，公司由兒子羅奈德·溫斯頓接手，遠來台南看我的就是他。

他是一位風度翩翩，專攻過礦物學的學者模樣的人。他跋涉來到台南的原因是評估在台灣拓展市場的機會，彙整資料時，有人告訴他到台灣找黃某一定可以解決問題。我和內人在臺南新闢的環華俱樂部和溫斯頓氏見了面，時在當年七月。當晚溫斯頓對環華的裝潢與氣派甚為滿意，向環華的愛爾蘭人經理提出了一些舉行活動的條件，約定九月間有日本分店的店長來臺南商洽細節，後來十月舉行的活動，我相信是臺南空前的一件歷史性盛舉。

溫斯頓氏連同展示櫃運來了上億美元的珠寶，有的鑽石項鍊一串價值三千多萬美元，也有名牌錶款多種，全由他們的保全人員守護。展示一共三天，第一天有晚宴，宴請十桌臺南名富；我因為是這事的牽線人，所以成了主賓。邀請函裡規定男上一律著深色西裝，而女士們著晚禮服，晚宴盛餚不必說，在宴會中途過後，燈光切換成品味甚高的照明，更有不知從哪裡找來身高一百七十公分以上、極為整齊的窈窕模特兒六、七人，把他們帶來的珠寶配戴在身，配上悅耳的音樂，周旋各桌展示給來賓，像是一場服裝秀，而有意購買的人，再與溫士頓氏進行隱密的私下交易。

我萬萬也沒有想到回台主持成大醫學院之餘，會成為哈利·溫斯頓展覽的推手，可能我感興趣的是他的經歷表列有提供哈佛大學研究愛滋病的經費。後來曾受慕尼黑大學研究中醫藥的德國學者文樹德博士之託向溫氏爭取經費，但因時地未宜而沒成功，只成記憶裡的一道遺痕。

我本來沒有從成大退休後到國家衛生研究院（簡稱國衛院）的計畫，但一九九八年夏天，該院的院外研究業務處處長張仲明教授及吳成文院長，曾經先後單獨或聯袂一起來到臺南的環華俱樂部找我，敦促我接受國衛院的職位，為該院之中醫研究開創一條新的路。經幾番邀請，我有點心動，決定搬往台北。這時台北有一家我在幫忙的私人企業叫實健公司，老闆李先生是我的朋友，由他安排我們安頓在台北某地方的公寓，住在該所至今。

在到國衛院以前，發生了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台灣醫學教育評鑑的問題，使我的工作增添了一些新的因素。在十一月底赴美答辯回台後，我向教育部提出有關醫學院評鑑的建議書裡，決定初期將評鑑單位暫置於國衛院內，其原因何在當在下文一一解釋清楚。

國衛院當時也正在永久院址及工作內容上做調整與起步，我挾以建造成大的經驗到國衛院，對國衛院來說等於是如虎添翼，是個好消息，但中國醫學的研究卻觸了礁。原來，我不是文樹德教授，無法接受中醫那樣的哲學。

我為中醫研究開創了一條路，去見了不少人，舉例而言，有長庚醫院的某醫師（簡稱長庚中醫）及中華醫院的中醫兩個人。

我與長庚中醫先生在敦化北路與長春路交叉口的宏國餐廳見面，和他討論他的工作內容，他話中透露他的老師教他如何按脈，按脈可以分辨三十六種病症，包括有無懷孕等等。我聽到他口中說出這消息，馬上說我願出研究經費，看看能不能測試按脈能否決定男女性別之間題。我建議我們去找一批十來歲、皮膚細嫩、都是未成年的五十位男生及五十位女生，從皮膚的粗細摸出男女之分；測試房間則用厚布隔開，厚布只開一個洞以便一手可以伸到厚布的另一邊，長庚中醫坐在布簾的這邊，被測的男女生則不按順序坐於布簾的另一邊，目的在看長庚中醫按脈猜中的機率是多少。但我這建議立即被長庚中醫拒絕，拒絕的原因是：他的功夫還未到那地步。這理由聽起來很耳熟，是常常拿來為中醫解套各種困局的方法。

中華的中醫和我談到關於感染症的問題，話題逐漸轉到香港腳的議題，當談到香港腳的根治方法時，那位中醫師鄭重地向我宣布：「在傳統的中醫裡沒有細菌這種東西！所以香港腳談不上根治黴菌。」這使我又更不懂中醫了，我想起兩件事，一是在慕尼黑文樹德教授處遇到的那位中國大陸來的鄭金生先生講的話（請參照第二三七頁），另一個則是何曼德院士在《康健》雜誌記者會時提起的問題。

何院士在一次代表衛生署參加《康健》雜誌社舉辦的記者會時提出了一個問題，會上有位張姓中醫師，據說他有一份民意調查的結果，這份民意調查是眾中醫師運用中醫治療最拿手的「病症」種類表。何院士聽了，馬上請張先生給他看那三十種病是什麼病，結果何院士一看，馬上說：「這三十種不是病，是症狀！」原來那表上列的是咳嗽、頭痛、經痛等，都是症候。何院士再追問，病人咳嗽最重要的問題在他是否感冒或肺癌，如果不追究原因的話，就算症狀好了也只是暫時的。

中醫的研究，我覺得愈是坎坷，並不是退休的人做的，何況我本來的興趣不在中醫，所以我深覺這是走不下去的一條路。我照實地說給何曼德院士聽，何院士當時是臨床研究組的主任，他說我可以選擇任何題目做。我把我放棄中醫研究的事也告訴了吳成文院長，也經過了他的同意。

## 國衛院的建築設計

我在國衛院的另一個任務是設計與建造其永久設施，這項計畫經過我主持的會議，選了許常吉建築師與美國NBBJ的團隊來負責。NBBJ是本部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 Ohio)的一家建築商，在台灣因為曾蓋過和信等醫院而出名。

我們給NBBJ的安德遜先生(Mr. Anderson)的設計原則是這樣的：第一、國衛院的建築物應成為該地區的地標，不必再標任何字，就像美國西岸的沙克研究院(Salk Institute)一樣，以設計取勝。第二、國衛院的研究題目涵蓋很廣，所以設計外型應代表將來性、科學性、國際性及人文性。第三、國衛院應稍有本土化的象徵。除此之外，期間的過程我完全任憑NBBJ的建築品味及特色自由發揮，NBBJ過去的作品創意不少，而尤其對許常吉來講，NBBJ的參與無疑地將帶給許先生事務所新的突破。

我爲了這個計畫的成功，曾親自前往俄亥俄州哥倫布市一趟，看了該公司的產品。其中他們帶我看他們爲保險公司(Nationwide)所蓋的巨蛋，那真是嘆爲觀止的一座建築物，我們台北的小巨蛋

蛋只能說是該建築物的袖珍版。在俄亥俄州的巨蛋不可大可小，並有二個滑冰的設備，只是不能舉行棒球比賽而已。

但我必須強調，設計歸設計，施工又是另外一回事，台灣的公家機關尤其容易受這個害，這和採購方法以及底價壓低有重要關係，成大的經驗是活生生的例子。我上文已經說過，在此不再陳述。

我雖然每次都與遠道從美國來的NBBJ在國衛院開會討論，而這些會議都是由我主持，但事實上我沒經手的部分也蠻多的。這要歸功於當時國衛院的主任秘書于重元先生以及全體的工務室人員，因為建築物牽涉的實在太廣了。

國衛院現已建築完成且已搬遷完畢，當年提出的重點大約都能遵守而實現，第一、國衛院的造型的確能為苗栗縣的地標，它雖不是沙克研究院的翻版，但充分利用了建地的地勢，國衛院面對的是一個平原，與沙克研究所面對的太平洋東岸有所不同。第二、國衛院的建築物的確涵蓋了我們所提出的條件，即將來性、科學性、國際性及人文性等，尤其是將來性與科學性最能滿足我們的要求。第三、NBBJ以不同顏色的迴廊來強調該院周遭的客家味，發揮了其設計時的本土化的經濟。

國衛院的另一個明顯的弱點是它的院徽（LOGO），不曉得為什麼，台灣人提到有關醫學機關，只能在綠色或不同顏色的十字打轉。我要的國衛院院徽是國際性的，而且象徵性很強，避免通俗，字則愈少愈好。這時我想到的是以台北為中心的奧美識別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的謝禎舜先生，奧美的前身是英國的公司，據我的瞭解，該公司似曾設計過可口可樂、凱悅、美國運通公司的標誌，是國際聞名的公司，不是隨便的。我與謝先生已在設計實健的標誌時，經實健的李先生引薦而有過面識。

## —國衛院的院徽—

國衛院院徽註解如下：

國家衛生研究院是國家專門從事醫學及衛生的最高研究機構，除了必須具備專業的技術能力及豐富的學識，更需要有積極入世的熱情及愛心。

國衛院的識別基石——組織標章即是以「知識」與「熱情」為核心概念，火焰代表知識和它帶來的力量，枝葉代表的是生生不息的愛心；樹葉的形狀採用銀杏，銀杏原產中國，而且自古就是代表中藥的一劑或健康，用以隱含東方的醫學精神。火和銀杏葉的背景是NHRI的縮寫，凸顯於深藍的底色，深藍色象徵著深厚的根柢及嚴謹的態度，整體的造型是一個盾牌的形狀，有衛護人民健康之意。



於是經過吳院長的同意，請了謝先生來當時還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院內的國衛院，謝先生與他的同事兩個人一起來院，仔細地傾聽了一個標誌公司，他答應回公司後做幾件事：第一是要仔細地研究國衛院的使命及目標；第二是他要親自面談幾位國衛院的領導者；第三是他下次來國衛院時對院徽就會有所建議。至於價錢，我出面請謝先生盡量殺價，殺到國衛院不必使用正式採購的方法，那就是五十萬元以下。謝先生本來開價一百萬元，結果幾經折衝與交涉，最後以四十九萬元成交，我不諱言，這是我的功勞。

奧美公司不愧有它的專業性，他們經過兩次接觸後便能建議不錯的草圖，這是使人佩服的事。

這建議案經過何曼德院士及幾個國衛院領導圈子的人查驗以後，再經奧美的修正，遂成了現在的國衛院正式的院徽標誌，這是使我很高興的一件事。

最近國衛院除了它的附屬單位，即疫苗製造中心以外，關於最後的裝修工作及公共藝術品的建造工作，我又被請去擔任這招標小組的召集人。老實說，我的意思是蓋在竹南的國衛院建築物本身既已成了苗栗的地標，就不必太多的公共藝術品來強調它的美，只要在大廳前及國際會議廳的走廊前稍再修飾即可，並不必絞盡心思去花大錢購置藝術品。但這仍舊是我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國衛院的立場。

何曼德院士幾乎可說是美國人，但他卻是道地的華人，我於一九六〇年代就因研究路線相似而略有認識，再次深入地認識他是我去找國衛院當他的幕僚的時候。他的父親名叫何鳳山，是我國早期

## —何曼德院士—

的外交官，曾經擔任過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駐埃及全權公使及大使、駐墨西哥大使、駐玻利維亞及哥倫比亞大使等公職。他厚厚的一本回憶錄已經「自序」提過。

何曼德院士因此在奧國及柏林生活過數年，現在還能操德文，以德文做學術演講，德文比他差勁的我，還會與他交換過韓素英的書及數本德文書而互相學習過。根據他經驗得到的理論：小孩子學外語學得快但也忘得快，成人學外語較慢，但一旦學會就難忘掉。他小時候能講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語，但現在已經忘光了，是一個見證。我自己的客家話難道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

何院士在其回憶錄《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說，他在清華一年後，因為父親何鳳山接受了駐外的公職，問他要不要也到美國念書，因此，何院士就此到了美國哈佛大學的大學部就讀，念完了大學部也念完了哈佛的醫學院。醫學院畢業之後，他經由幾位科學界有名的人士帶領而進入了醫學領域的研究，以Monto Ho之英文名而出名，在三十五歲前就成功地得到了美國臨床醫學研究會會員的頭銜。

我一九六三年初到美國，常常在科學期刊上見到Monto Ho這名字，可見在一九六〇年代他已經研究有成。之後在國際干擾素會上常常遇到他，但他已經淡忘了我，因為我走入了不同的研究路

線，這次到國衛院算是重新認識了何院士。

對何院士來講，任何事都可探究而研究，在台灣期間，他對台灣的細菌對抗生素的抵抗力特別關心，另有引起他注意的是腸病毒的真相。何院士這些注意後來都受到監察院與衛生署的重視，他們因而都採取了一些行動。

何院士和我常在我及他的辦公室談天，對他來說倫理道德觀是很重要的，二〇〇四年總統大選我在電視上對兩位候選人所發問的教養問題，也是我在何院上辦公室談過的倫理問題，我們倆都嗟嘆在實際戰場的政治人物是如何地不知政治、教育的道德觀念。

何院士現在已經從國衛院退休，長居匹茲堡，我會到匹茲堡看過他。他的退休住所位於匹茲堡友誼谷(Friendship Village)的地方，裡面的設備相當好，但住進裡面的單位不能買斷，除了一筆不少的保證金外，不管住的是獨棟的房子還是公寓式的住所，另每月還得繳管理費數千美元，進駐時唯一的條件是住者能走路進去。管理費中一切生活的細工都包辦，包括換床單及清潔等，可謂退休生活極為舒適而容易。

我一再地向她說明，我們的問題是屬於醫學教育評鑑的問題，不是屬於政治問題，但她的反應卻是：「這就是政治問題。」

### 一聲電話鈴響，台灣醫學教育品質的監測翻開了新的一頁。

這一通電話是教育部高教司當時的司長黃碧端教授，以陣前授命的方式，於一九九八年九月底打給已從成大醫學院院長卸任的我。電話內容是叫我率領兩人於當年的十月八日，代表台灣出席美國教育部在華府二十三街一家旅館舉行的外國醫學教育及評鑑委員會（NCFMA）的公聽會，並為該會所做對台灣醫學院評鑑制度的不利評價做一番答辯。這個使命交下來給我，連帶丟給我一些非先回答不可的問題：第一、美國教育部設立這麼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各國醫學教育評鑑的原意何在？第二、如果答辯對我國仍舊不利，對我國醫學教育會有什麼後遺症？第三、我們已向該會提送的文件包括哪些？

可惜，教育部同仁似乎對這些問題瞭解不太徹底，對問題的焦點掌握不夠，更想不出有效的對策。這種問題的關鍵出在教育部裡懂得醫學教育的人著實不多，而懂得醫學教育又能冷眼觀察國際動態且能予正確分析的人少之又少。我於是去電紐約央求美國在華醫療協進局的主席杜魯諾（Gerry Turino）博士代為蒐集有關情報，供我做惡補的參考。另一方面，我北上謁見黃司長，好讓黃司長能面授我機宜，並找出她所謂的兩位團員是何許英才。這第一個目的立即有了答案，她認為我應該帶慈濟醫學院當時的校長李明亮，以及台大醫院剛上任的李源德院長。

等了兩、三天後，杜魯諾博士有了消息，原來美國子弟想念醫學的太多，美國現有一百二十六所醫學院（美國所謂的醫學院只指醫學系，不像我們把有關醫、牙、護各系皆放在一個醫學院的屋簷下），容納不下所有這些子弟，名落孫山的子弟只好向國外另覓學醫的機會。於是在海外學醫的美國子弟遍佈全球，簡直是無孔不入，這和我們台灣有數千子弟在大陸學中、西醫的情況相差不遠。這些往海外求發展的美國子弟與在美國國內學醫的子弟一樣，都享有申請美國政府助學貸款的資格，但往國外跑的學生或因天資較差或其他未明原因，學成回國後考不取國考，因而拿不到執照的學生在比例上比國內學醫的美國畢業生高。學醫畢業卻考不過國考，國家就收不回助學貸款的國

庫支出，美國政府因此損失的金額一年約有兩千萬美元。這筆呆帳被美國國會逮住，要求教育部設立機制調查美國子弟所前往學醫的各國的醫學教育品質。這調查令一下，美國教育部就組織了 NCFMA 請世界主要各國，包括台灣，向 NCFMA 提出資料，說明各該國的評鑑制度。評審結果分為兩種，一為該國的評鑑制度「與美國制度相比」，另一為「無法與美國制度相比」，換言之，前者是及格，後者是不及格，如果一個國家的評鑑制度被判為不及格，則前往該國學醫的美國學生將無資格申請助學貸款。

台灣有沒有美國的子弟來學醫？答案是肯定的，這些學生絕大多數是移民美國的第二代台灣人，我主持成大醫學院就有過藍姓及黃姓兩位同學來自洛杉磯及蒙特婁學醫的例子。

## —答辯會上的挫敗—

瞭解答辯會的緣起到此，心裡的準備就有了頭緒，我們二人於當年十月七日晨抵達華府，台灣的答辯排在十月八日的早上約十點鐘，我事先約了李校長及李院長共進早餐，惜李源德院長住的旅館遠在郊外，久候不見人，故只好我和李校長共謀說詞與推敲對策。答辯會是公聽會，所以有許多空位讓聽眾旁聽，委員會是各地醫學院的教育家，一共有十三名之多，主席是阿拉巴馬伯明罕校區的醫學院院長威廉·第爾博士。我代表台灣上答辯席之前是波蘭的代表，只見他回答了委員們幾個簡單的問題後，就有委員舉手提出動議，波蘭被判為有與美國相比的評鑑制度，波蘭代表於是滿面春風地步出會場，接著我就被請上發言席而交鋒開始。

一開始，就有一位委員問說：「台灣到底有九所還是十所醫學系？」按當時輔仁大學的醫學系尚未成立，故正確答案是十個醫學系。但這一問馬上揭露了國內這問題出在教育部送給美方的文件參夾一些會議或活動記錄，國防醫學院因不受教育部管轄常礙於這些文件中，這會使審查委員摸不出頭緒。最大的敗筆在有些教育部的活動因為經費來源不同而不包括屬於國防大學的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所以文件中有的紀錄有九所醫學系代表參加，有的則有十所參加，使不熟悉台灣內情的人有不少困惑。我常說我們判斷一個人的修養程度與做事的嚴謹度只能由其言行評斷，我國向美國提出的文件既然如此雜亂而前後矛盾，想到這會給聯邦教育部審查委員帶來怎樣的初步印象，我就一陣寒慄。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坐在那裡發言，幾乎是受一群虎頭蜂攻擊似的，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尤其是與國家政策有關的問題使我不得不連哄帶騙。試問當別人問你：「你們以一試定江山的方式收進醫學系學生，卻沒經過面談，怎麼斷定他能做一個良醫？」請問讀者我該怎麼回答？我只能說我們已經認識了這一點，政府已經有甄試這一個管道，讓學生通過面談才能進入醫學系，這種學生的比例會逐年增加。我對委員們對我國沒有常設獨立而公正的醫學系評鑑機構則無法招架，另外一個我幾乎無言以對的棘手問題是「我國怎麼不以國考的通過率做評鑑一所學校的指標？」我國國考題庫裡的題目品質我是瞭如指掌的，醫學教育的理念應是在解決醫療現場的問題，但國內的考題卻只著重在哲理上的探究，這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此點上文也已經觸及，不再贅述。這一個問題，教我如何辯解？我正坐在那裡發言與委員們舌戰，只見一位委員舉手向主席提一動議，判定台灣的醫學系評鑑制度與美國無法相比，換言之，是不及格。因另有人立即附議，主席就接受這動議，付委員會投票，以全票通過讓我們鎩羽。

回國後我立即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告，分析了這趟答辯敗陣的原因，除了黃司長外，不知教育部有誰仔細地評估過教育部交給我的這使命得失？我自己的心底是有萬分不甘，我素來很少打事先就

知道打不贏的仗，非我能力所及的事，我也不會輕諾，因為我的座右銘是「不想走完不起程」（Go all the way, or don't go at all.），因此這次是徹底地鎩羽而歸，頹喪的心，讀者當可瞭解。但事到一敗塗地的時候，人愈需冷靜地思考，免得影響邏輯演繹；我國被美國否定了評鑑制度，後果嚴重嗎？從表面來看，直接的後果是不嚴重的，頂多是美國籍的子弟來台灣學醫拿不到美國的獎助學金而已，那是他人的事，我們沒有任何損失。但把眼光再放遠，如果長期被國際上認為台灣醫學教育沒有良好的監測制度，就會改進不力，可能影響到國際間認為我國醫學教育不夠國際水準的可能性會愈大，甚至會大到影響我國醫學生或醫師欲往美國深造、修業、遊學都會受抵制的地步。說來說去美國還是世界醫學的王國，類似上述的抵制，將會使我的醫學瞠乎其後，這會不符台灣居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值得省思的是台灣的醫學教育已保守許久，許多醫學教育的理念與措施已經幾乎落後美國至少二十年，而一試定江山式的醫學生招募方式更是利多於弊（請參閱拙著《生死關頭見詔達》），光是這一點，就值得我們重新省思與評估。故乘此次鎩羽之恥，在國內掀起一陣醫學評鑑與改革的風潮，也不失為造福病人的莫大良機，塞翁失馬，就是借刀殺親，也在所不惜。

## 起跑

我的上述最後一個結論並非憑空構思，而是有我個人的觀察基礎：第一、國人拭不去遠來的和尙會唸經的媚外惡習，老外說我們好，我們就借題發揮，老外說我們不行，國內就風吹草動。我們這個心理這次必須予以善加利用，嘉惠我們國人。第二、我國近來一直受中共各方的打壓而外交舞台漸漸縮小，由醫學教育切入打開一片舞台與諸國代表為伍，是一個新鮮的開拓工作。第三、醫學教育的改進應該不忘把廣大的病人羣視為受益者。第四是疾病無國界，我們的醫學教育應該面對整個地球村，而不侷限於本土的小格局。

當年十一月底前，我寫了一詳細的醫學系評鑑制度建議書（以下簡稱醫評會），目的在設立一中立而公正，且永續性的評鑑制度。這建議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成立規劃委員會進行規劃階段，舉凡組織規程、經費來源、評鑑程序、評鑑結果之報告和判定，以及醫評會與教育部之關係皆有詳細之考量。該計畫書提出後，教育部於該年十一月十六日召集全國醫學院之代表開了一討論會，並經該會一致通過本人所撰寫之計畫。規劃經費共二十多萬，由教育部提供，規劃委員會由我

作召集人，經由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吳成文同意，初期將醫評會暫厝於該院。規劃委員中有台大的黃伯超、謝博生、陽明的曾志朗、成大的王乃二、國衛院的張仲明諸教授，以及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罕校區的醫學院院長詹姆士·彼得曼（James Pittman）等。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則因為經費的手續延後到翌年七月一日方起步。

在規劃委員還未開始工作前，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參加了台大舉辦的一次醫學教育評鑑會，會中有位澳洲醫學評鑑會（即Australian Medical Council）名為賴金（Larkin）的主席來當特別來賓，料想台大是想藉此取一些評鑑的經。我因為性急，雖然陰錯陽差，沒能見到他本人，但立即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給他，問他能不能發函邀請我參加下一次澳洲的醫學院評鑑。賴金博士立即回信說我可以國際觀察員身分參加一九九九年六月廿五日起一連五天，對於澳洲西部城市柏斯的西澳大學醫學院評鑑活動。澳洲評鑑醫學院的工作是由半官方的澳洲醫學委員會負責推行的，該次訪視係由東部昆士蘭大學醫學院的心理學教授賴瑞·蓋芬（Laurie Geffen）帶隊。我雖然毛遂自薦自邀參加，但該會給了我所有參與該國團員同等的禮遇，給了我不少的學習機會，對該會來說該次評鑑是首次有國際觀察員參與的創舉。除了我之外，另有台大黃伯超及成大王乃二兩位院長亦遠赴美國訪問了不少醫

學院的評鑑，蒐集了不少資料。

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可以長話短說，我日以繼夜地寫完了評鑑手冊，這手冊裡包括醫評會的組織規程、評鑑程序、冗長的評鑑目的以及判斷標準。評鑑標準要顧及本國文化、社會體制，又要顧及世界潮流，並不容易的事，我是借鏡美國與衣鉢英國系統的澳洲做為範本所加以修正寫完付梓的，因此台灣醫學評鑑目的是美、澳、台灣醫學教育求卓越的大雜燴。我為了寫這些文件，惹出太太的怨言，她認為我主持成大計畫都沒這樣忙過，從成大退下來到台北搞醫評會這一計畫怎忙得談幾句話的時間都沒有了？但因我投下了心血，規劃委員也慷慨協助，規劃的工作如期完成，其中包括第二階段的實施計畫。我也親自與當時的教育部長楊朝祥開會，對未來的願景做了一次詳細的說明報告。

台灣的醫評會（T MAC）於是於二〇〇〇年的八月一日起跑，開始的一段工作由我的秘書王晶玉小姐及臨床研究組的李純恬小姐幫忙，而醫評會原本的組員艾宇凡小姐及朱宥樺先生則遲至當年九月才到任，醫評會訪視委員人才庫也迅速地膨脹到大約八十個名字，包括國外的知名醫學教授。



TMAC規劃委員會的工作團隊（左起依序王晶玉小姐、朱宥樺先生、艾宇凡小姐）。

我相信自台灣醫評會之成立，  
為台灣所有既有的醫學系在教學的  
改進方面打了一劑強心針，世界衛  
生組織說健康是基本人權，所有支  
持醫評會的人都應以捍衛國民之基  
本人權者自任，醫評會也成了台灣  
高等教育評鑑制度試探的濫觴，許  
多不同學域的領導者皆紛紛來醫評  
會取經，教育部也仿醫評會的例子  
來提升各領域的教育活動的可能  
性。教育部在曾志朗部長任內製作  
的白皮書中，也把高等教育之評鑑

## —重返答辯—

二〇〇一年年底，我仔細地蒐集了台灣進行醫學評鑑的經過，除了詳細的敘述以外，配以廿一件附件，其中附件第十二為台大醫學系之評鑑報告，一併送到美國教育部那會讓我初嚥敗績的委員會，要求該委員會重新評估台灣的新制度。該委員會把台灣案列在二〇〇二年三月廿日在華府公聽會上予以討論，這次我是有備而來的，我特請醫評委員之一的何曼德院士同行前往華府答辯，結果台灣案就像一九九八年我目睹的波蘭案子一般，輕易地過了關。台灣醫評的經過於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五日再由該會追蹤，委員會對我和同行的賴其萬教授如何厚待，讀者可參閱以下我於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刊登於中國時報的文章。這次台灣案審查的氣氛已完全吹走了一九九八年十月八日的楣氣。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九日，世界衛生組織的外國組織世界醫學教育聯盟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我在該會發表演說，分析了台灣醫評會初步成功的重要因素：第一、台灣有一批真正為台灣醫學獻身的醫界人士；第二、醫評會的規劃委員引進了外國醫學教育的優點並予以本土化；第三、國

家衛生研究院的慷慨協助使醫評會初期有了家，以保獨立於教育部的形象，並且借用了國家衛生研究院多年來建立的學術專業性與公正性；第四、依照醫評會規劃，訪視小組必有國外專家兩人參與；第五、訪視結果與校方申訴皆原文不動地上網供全國國民參考，為考生選校考慮之用；第六、批評一所學校必須根據確切的事實與數據。

回過頭一看，我為台灣醫學教育評鑑催生的仗並沒完全打輸，而且經過這次驚濤駭浪，我們已贏得了美國教育部以及世界醫學聯盟的不少朋友。

教育部原本即計畫，TMAC若能順利成功，即開始積極推動籌劃設立獨立之高等教育評鑑專責機構，將TMAC的評鑑制度及經驗推廣至非醫學系之所有大專院校，賴以全面健全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提升國內高等教育品質。因此，有鑑於TMAC的成功經驗，教育部已於二〇〇六年一月一日成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為獨立之評鑑專職機構，TMAC於該年乃脫離國衛院，正式遷入成為該中心之一部分，但仍維持其獨立運作之特性。



第四部

# 與寫作結緣

我不一樣的人生

|黃崑巖自傳|

## 龍應台與陳之藩

龍應台的名字很響亮，是我所尊敬的文學作家之一，她是成大出身，但我和她相識，另有原因。龍應台的兄弟姊妹也不少，高雄就有一位她的弟弟叫龍佛衛，是位精神科醫師，但也懂得如何運用針灸；他的夫人是成大醫學院護理系的老師，名叫徐畢卿，現任成大的學務長。

我很羨慕龍應台等人瀟灑的文章，這種文章只有分析能力特別犀利且知識豐富，尤其是國學基礎雄厚的人才寫得出來，我遠遠地落後在這一票人的後面。有人反駁我說我想說的和她（他）們想說的內容不同，但如果我能寫一手流利而瀟灑的文章，則效果會如虎添翼。

我會受她的青睞與邀請，到過清華漫談，與學生對話，龍應台命名此項節目曰：清華思想沙龍，而我當天的題目是：「如果重做大學生」。事後她也諸多讚賞，但我知道這是高尚的抬舉。有

一次她跟我說，我的名字已和教養連在一起了，表示我對教養的看法獨特又觸到了台灣現時社會問題的核心。

陳之藩先生也是我很尊敬的作家之一，他是道地的科學人，但人文素養很高。他不但寫漂亮的散文，他的作品，像龍應台的文章一般，言之有物，而且這「物」很多，不然他的文章不會在高中課本上出現。我之所言，與所欲言，比起他之所言是差多了，像是患了貧血症。

有一次他來成大醫學中心演講，題目觸及薛丁格 (Schrodinger) 一事，薛丁格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而他的書《什麼是生命？》(What is Life?) 是他的代表作，據稱華生 (Watson) 和克立克 (Crick) 兩人也受了這本書的影響。

他曾經寫信給我，提起為什麼楊振寧與李政道兩人拿到了諾貝爾獎以後反目的問題，要我分析，我卻不敢回他的這封信，因為我覺得我無法和他對談，他的程度太高了。他與夫人童元方女士現在都住香港。

## 開始寫作

我寫書的動機，來自遠近兩因，但我作夢也沒想到在生涯的末期會有寫書的決心。

原來，《中華日報》有一位記者，在他有事沒事就找我麻煩前，我就寫了不少報告教育部及各報有關固定題目的短文。這些文章都經過了內人及我的幫手李美穎小姐的檢視，她們平常就常異口同聲地說我的點子不少，文章的重點也掌握得住，故經常鼓勵我寫文章。但我自己的感覺是我的文學基礎頗差，寫文章是免談了。龍應台、陳之藩、李敖等人的文章都比我瀟灑，如果比起他們的文章，我是在魚目混珠，最近的清華學苑的構想就是好例子。

話說台南的《中華日報》本來是全國性報紙，現在已經緊縮成地方報紙。《中華日報》我很少過目，不過在台南的發行量是相當可觀的，該報社有一記者對成大的進展特別關心，報導頗多，這

種行為本身並無可厚非，但其內容則語多扭曲。後來有一天，我秘書告訴我，曾眼見這位記者趁我不在辦公室，翻閱我桌上的文書，這我就火大了！因為我在回台南先前就和夏校長當面講過，我是回來做事的，媒體就由他來應付，所以記者與報導員我是很少見面的。這位記者的行為嚴重地違背了新聞道德與我的原則，而且這位記者的意見已有擴散到各大報地方版之勢。

有一次我請來這位記者與李茂雄教授，會中我正面與記者衝突，使得李教授覺得有點局面無可收拾的感覺，這也歸因於我在台灣的經驗不太夠的關係，但壓倒這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到來。那時附設醫院於該月十二日先行運轉，我與內人晚上到六樓病房看看。六樓居然有一條寵物狗泰若自然地走來走去，料想是住院病人帶來的。我立即請了六樓的護理人員向病人及家屬說明這是不許可的現象，必須加以糾正。等這事情解決了之後，我就與內人到了急診處，急診處靠近入口的地方有長椅一張，我與內人坐下稍做休息，突然入口走進了上文提到的記者。

她看見我們馬上就問：「你們在此幹什麼？」我們說我們來看附設醫院的運轉情形，我內人反問她：「那妳呢？」她一臉驚訝的表情回說：「我也是啊，難道我不能進來嗎？」我內人心直口快，因為平常就常耳聞新聞記者的種種，在她工作的奇美醫院尤常成爲話題，故說：「妳不能進

來，這裡是狗與記者不能進來的地方！」這台詞有點類似上海的黃浦公園入口處的標示，該標示明明白白地說此公園中國人與狗勿進，這時我知道禍已臨頭了！

回家不到半個鐘頭，夏校長出現在我家，說我們需要到該記者的家中道歉。我催促我內人前去，但我不去，因爲話不是我說的，更因爲這樣道歉會把我反對她的立場轉弱。但最後看在她立場難堪，故終究前往該記者家裡。從此她對我的事的報導有變本加厲的情況，凡是我的收入、我的座車，皆在她的報導事項之內，更遑論成醫工程的褒與貶。

後來有一天，《中華日報》副刊的總編輯吳涵碧突然打電話過來，邀請我替《中華日報》寫專欄。我與內人及李美穎商討，認爲上述記者已經找我麻煩夠久，這次中華副刊特別邀請，表示我在《中華日報》並未被打倒，故接受這個邀請。於是我就打了電話給吳涵碧小姐，表示我願意爲該報開闢一個專欄，名爲「岫盧集」，這是我寫作的開始。我感謝內人的鼓勵之外，也感謝李秘書的從旁加油，以及《中華日報》吳小姐盛情邀約。

「岫盧集」一共寫了十年，一直到報社緊縮爲止，中途匯集了六十篇左右，出版了一本書叫《莫札特與凱子外交》，這本書是《中華日報》出版的，出版日期是民國八十七年二月。到目前爲

止，我會寫了《中華日報》的專欄，因而又替《康健》雜誌及《聯合報》寫了專欄，並且出了約十本書，其中《黃崑巖談教養》及《給青年學生的十封信》二書特別受到讀者的歡迎。

## 談教養

30

《黃崑巖談教養》這一本書的出版是自己沒有料到的事：二〇〇四年二月十四日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據籌備那場辯論會的機關相傳，我的名字被舉為可能代表教育界向辯論的兩人發問時，沒有人反對，故輕易通過。這也難怪，因為沒有人能指我而標以藍或綠。那時台灣對辯論還是生疏，發問人有兩輪機會各向兩候選人發問，每次發問有四十秒鐘的時間，在舞台的底部有一電子鐘在控制，觀眾是看不見的。發問人中除我代表教育界以外，另有代表經濟界、法律界、政治界等四個人，這些人要問什麼問題有充分的自由，而且每一個發問人之間並無互通之事，到了上台前十五分鐘才打開問題。我記得我要問教養的問題，代表經濟界的朱敬一院士就說：「今天最難的問題就是黃教授提出的有關教養的問題。」辯論的結果，有關教養的問題連戰似乎佔



了上風，但兩個人答得不完整。

過了兩天，聯經出版公司前發行人劉國瑞先生、發行人林載爵先生、擔任主編的林芳瑜小姐，來找我吃飯，並說教養的問題是我們社會的問題，兩位候選人都對這個問題答得不好，問我能不能寫一本書來解釋？經一陣折衝之後，我一口答應下來，並兩個月就把它完成。我在序當中是這樣說的：

「柏林大學的創辦人洪保德（Wilhelm von Humboldt）是極端重視教養的人。哥德一八三二年逝世被認為是德國古典時代的終結，而洪保德大約也是和哥德同期的人，僅晚逝前者三年，這兩個人對德國人的教育與社會之重視教養，發揮了很遠的影響。我很尊敬的朋友何曼德，曾追隨著外交官的父親待過不少地方，也受過不同文化的薰陶，對德國文化有獨特的閱歷。他認為德國人是個人教養境界很高的民族，講到教養，就非提德國不可。依洪保德的看法，教養是值得我們傾力追逐具備在身的資產，是精神內涵很高的境界。追逐的自然結果是個人的提昇，個人的提昇會導致社會的優質化，因為社會是由人所組成的共同體。」

在過去封建的社會裡，兒子多半繼承父業，平均壽命也不長，一般人很少有考慮一輩子要過何

種工作或過何種目的為主軸的生活的餘暇與空間。但現在不同了，社會比以前多元複雜了不知多少，活在人間的時間也增長了許多。雖然傳統繼承家業的觀念或許未被拭盡，個人為主的思維方式已儼然成了生活的中心目標，幾乎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過何種生活、追尋何種目標，抱何種人生觀，並為這目標打下基礎，作深入思考與探究的機會。這被認為是追尋教養的起源。

教育如果辦得好，可以增強個人思維的能力，點出思考的正確方向。如果教育成功、內涵又正確，它會為社會上增加能辨識是非，讓理智與道理控制行為的人，社會就會更合乎人性，和諧與安祥。如果教育沉淪到只偏重就業，甚且走極端的學以致用而講求生存的競爭力，忽略了藏在生活基座的文化面，或失去改善生活的功能，逐漸成為訓練技能的工具，那麼教養的價值在社會也會全面滑落，人成為錢財與情緒的奴隸而為非作歹，談不上國民所企求的安居與樂業。

教養卻是難予捉摸的概念，值得大家的省思，它具有許多面具，會在我們不經意時露面讓你恍然它的用處。本書的目的就是在探究教養的這些不同面具，如果它有助於讀者了解教養無形的影響以及它在做人方面的必要性，我們的社會會有不同的明天。」

出版一本書的經驗是很特殊的，但不管我如何成功地出版了一本書，國學基礎的缺乏，我認為

還是我的要害。《黃崑巖談教養》是當年的十月一日問市的，事後才知道當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有一位作者寫了一本《教養主義的沒落》，我向我的朋友打開心窗講，如果我事前知道日本要出這一本書，我就不出我的教養書了，因為人家的書幾乎每一页都有數字，而我的書一個數據也沒有。這是我的第二個通病。

不過左右搖擺，我居然被捧為作家之一，在我來講是奇蹟一則，能與陳芝藩教授與龍應台女士並列作者之名，使我受寵若驚。

出版我的書的書商一共有八家，包括中華日報社、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康健雜誌社、九歌的健行文化，以及聯經出版公司等。

很多人，尤其是學生或年輕人，都常問我如何規劃一生。這個問話使我憶起杜聰明先生曾在全球一周的旅行中，在華府我家住兩個晚上。杜先生時已高齡將近九十，還是每日游泳及寫書法自樂。當我內人問他能高齡而這麼健康，是否是研究藥學的他發明了一種長生不老之藥不公開而秘密地服用它。結果他卻說，他雖研究藥學，但以不吃藥為原則。

我是沒有計畫過我的生涯的，俗語說「船到橋頭自然直」，人的路程隨時變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偶到人間一遊的人，只能跟著這個動態而改變自己的步伐去適應。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談到科學研究時曾經說過“opportunity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我譯為「機會屬於有心人」；孟子也講過：「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

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巴、孟兩人無外乎在勸人平常不知客觀局勢會因何改變，但能不能發現機會是很多人智慧的累積，而知識的累積要靠求學，尤其是治學的方法，這才是真正的教育。何謂教育？教育是情緒管理與做人道理的方法傳授，絕不是學以致用的表面功夫，這經濟齊格斯 (Ziegels) 分析在先。福澤諭吉在他的《自傳》（中文版由楊永良先生翻譯）的一一七頁說：「當今的書生一邊求學一邊思考自己的前途，我認為這樣是不能求得真正的學問的。話說回來，只是泛泛地看書也是不對的。雖然不對，但若只考慮自己的前途、考慮要如何才能出人頭地、要如何才能賺大錢、住豪宅、要如何才能吃美食、穿漂亮的衣服，如果心裡一直想這些而奮力讀書，我認為是不能求得真正的學問的。學子求學，首要在於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他這話的標題叫「無求學問、寧靜致遠」。

我對同學上述的問話答覆也是如此，我只是覺得一九八二年正面地接受夏漢民校長之邀到台南設立成大醫學中心是一生的轉捩點而已。換言之，是一個機會。但我在成大醫學中心的回憶錄裡也提過，從來沒想過做完成大計畫後要做 T MAC，成醫與 T MAC 都只是從我眼前走過的機會而已。

如果綜合上面的話，我第一要感謝的是我出生的家庭，它給我對人生的嚴肅看法與態度，雖然父親過了一個不得志的晚年，但我的大哥及二哥是我重要的典範，家裡沒有這樣的父母賜給我這樣的典範，我就沒有努力的具體目標。第二，我也得感謝我的內人及女兒們，如果她們不大方地放我走，一九八二年的成大計畫最後由誰主導，以及以後的台灣醫療局勢要如何演變，更不得而知。當然成大醫學中心因為歷任的主管不同而與它開創時的形象會有不同，這也是夏校長辭掉成大校長之職，北上入閣主掌國科會時到我們寒舍所講的話：「如果當時隨便找一個人來主持成大醫學中心，是很有可能撈一筆而去的。」現在想起夏校長的這一番話，真是語重心長，因為成大醫學中心是我回台灣的主要誘因，而且它所牽涉的層面頗廣，無法容納在這本自傳中，只好另成一本（《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我因為看出成大醫學中心的設立是個機會而回台，這難免有大男人主意的自私心態作祟，這點我要對持家的內人以及成長中的女兒們說一聲抱歉，但她們的慧眼、她們的容忍，不可諱言地，何嘗不是成大醫學中心的一個重要成功因素。

是！成大醫學中心是一個機會，我為此意志集中使出了渾身解數，但也學了很多，這些所學的建築常識及它們的適時應用，對成大的成功以及以後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設計及建造發生了很大的

作用。在過程中，我內人也成了建築的專家。要知道，成大醫學中心的計畫形成時，以臺南與嘉義（又稱嘉南地區）為目標，要服務三百萬人，<sup>估計</sup>人口的四分之三，會看病一次，這數字也說出嘉南地區的醫療需求之殷切。尤其根據真實的數據，嘉南地區無論在醫師的數目及需求數方面，皆只有台灣其他地區的三分之一，後權度頗為明顯。當初在成大設立醫學中心是慧眼識破這個缺失的結果。現在這種現象已經解除，這並不是邀功，而是事實，我要順便向當時寫計畫的諸兄表示敬意而已。

T M A C 的組成也是巴斯德的話的應證，我覺得 T M A C 已經完成了初步的階段性使命。何謂 T M A C 的初期使命？一、建立這個組織，它必須獨立而中立，這似乎已經完成。二、得到美國教育部的認證，扳回先前不及格的裁定，這也已完成。三、使台灣的十一所醫學院都能推行醫學教育改革；根據我個人的觀察，這一項除了一、兩所醫學中心以外，皆已達成，是可喜的現象。但 T M A C 在這重要的時刻需要脫胎換骨，我在這裡只能寄望 T M A C 將來的主持人繼續向前邁進，而醫學教育能趕上時代，走出院、私權、權威化濫用的陰霾。可喜的是台灣的醫療環境已經改變了許多，而且據某國際機關的評估，從醫療服務的可使用性及方便性來講，台灣佔全世界的第二

位。這我也不能邀功，但我能躬逢盛舉，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設立及完成新院徽也是我引以為榮的事，這之中也有不少人參與，我只是把事情的過程寫下而已。

我要強調，這一生影響我最大的恐怕是我內人惠美及三個女兒，尤其是惠美，她的任勞任怨，是我的偶像與典範。她現在還在某地上班，但只限於一週兩個下午。一眨眼，她與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了，時光易逝這句話在我們倆的生活體會最多，我們有倆人一致的看法：一寸光陰一寸金，人是偶到人間一遊的，再珍惜它也不夠，而珍惜它的方法，與家庭的庭訓以及家庭的氣氛有關，在此我就不多贅述。

在成大建設期間，對我打擊頗大的一樁事是高玲君的去世。她答應回到成大是她患乳癌治癒以後的事，但她卻敗在再發的乳癌之手。我們替她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而合唱團則以我最喜歡的歌謠為主體唱了下面的一首歌，這是本土作家作的曲子，作曲者郭子究先生最近才辭世於台東，這首歌的歌名叫做「回憶」：

春朝一去花亂飛，又是佳節人不歸，

記得當年楊柳青，長征別離時，

連珠淚和鍼黹繡征衣，繡出同心花一朵，忘了問歸期。

思歸期，憶歸期，往事多少盡在春閨夢裡，

往事多少，往事多少在春閨夢裡，

幾度花飛楊柳青，征人何時歸？

其他在我身上發生了不少事，不能一一詳述，只希望讀者能好好地細讀。如果有錯誤，並非故意扭曲，並非有意。如果讀者能從我的成敗而有所學習，我就覺得寫這自傳的目的就達到了。



「回憶」的曲譜。

1. *Time to Heal* · Kenneth M. Ludmerer · 一九九九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あゝて英語公用語論》 · 船橋洋一 · 一〇〇一 · 文春新書 · 二二一。
3. 《自傳》 · 福澤諭吉 · 岩波文庫。中文譯本《頑童》 · 楊永良譯 · 一〇〇五 · 麥田出版。
4. 《黃昆巖談教養》 · 黃昆巖 · 一〇〇三 · 聰經出版公司。
5. *Bedside Manners* · Edward Shorter · 一九八五 · Rockefeller Center。
6. 《花の男シーポルト》 · 大場秀章 · 一〇〇一 · 文春新書 · 一五。シーポルト先生全二卷。
7. 《教養主義の没落》 · 竹内洋 · 一〇〇二 · 中公新書。

8. *Several Worlds* - Monto Ho - 1100五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Singapore。
9. 《合唱大師蘇森墉的音樂人生》 - 交通大學浩然典藏工作室 - 1100五 - 交大出版社。
10. 《蘇森墉作曲集》 - 竹軒文化 - 110011。
11. *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 - John Pomfret - 1100七 -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Y.
12. *History of American Bureau for Advancement of Medical in China* - John Watt. (to be published)。
13. *An American Transplant* - Bullock, Mary Brown - 一九八一 - California Univ. Press。
14. *An Autobiography* - Flexner, A - 一九六〇 - Simon & Shuster。
15. 《河燭》 - 蘇曉康、王魯湘 - 一九九〇 - 風雲時代、金楓及聯合出版。
16. 《柏楊回憶錄》 - 柏楊 - 一九九六 - 遠流出版社。
17. 《我的教育、我的醫學之路》 - 何曼德 - 110011 - 新新聞出版。
18. *Der Grosse Traum* (英文版書名 *The Crippled Tree*) - Hans, Suyin - 一九八五 - Goldmann。
19. *The Origin of Species* - Darwin, Charles - 一八五九 - Penguin Classics。
- 
20. 《武士道解題》 - 李登輝 - 110011 - 株式會社小學館。
21. 《竹軒文獻新誌》四十期 - 1100七年十一月 - 新竹市政府編印。
22. *Doctors, the Biography of Medicine* - Sherwin B. Nuland - 一九八八 - Rahdom House。
23. *What is Life?: with "Mind and Matter" and "Autobiographical Sketches"* - Erwin Schrodinger - 一九九一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2008年6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2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黃 崑 巖  
發 行 人 林 輽 爾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編輯部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02)27634300轉5048

發行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02)29133656

台北忠孝門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電話：(04)22371234ext.5

高雄門市：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211234ext.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摺電話：27683708

印刷者 文鴻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林 芳 瑞

賴 郁 婷

封面設計 蔡 婕 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78-957-08-3286-0 (軟皮精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mailto:linking@udngroup.com)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黃崑巖著，初版，臺北市，聯經。

2008年（民97），304頁，14.8x21公分。

ISBN 978-957-08-3286-0（軟皮精裝）

1 黃崑巖 2 台灣傳記

783.3886

97009902